

应天  
文

化季刊

Yingtian  
Culture Quarterly

秋之卷  
2022



# 应天文化季刊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吴金山 郭文佳

副主任 高建立（常务） 陈晓明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媛媛 王立 王琰 于志刚

冯志伟 卢忠雷 刘万华 刘海洲

孙佳 吴金山 陈晓明 李卫军

张松林 张富林 李相中 李瑞华

郭文佳 高建立 常丽洁 薛立芳

总编辑 吴金山 郭文佳

主编 高建立 陈晓明

## 目 录

### 应天史话

明崇祯末年归德府政局概况述略（兰一龙·1）

### 人文往事

往事回眸：难忘师专19年（王增文·10）

光影流年：我的大学生活（韦举强·16）

### 文学沙龙

#### “走出去”系列

荷兰国家档案馆的中国记忆——荷兰随笔之一（易彬·20）/  
寺田老师（陈言·27）/波兰旅居印象（张治·29）/埃及印  
象二三事（李雪峰·31）/土耳其旅居漫谈（张敏·34）/摩  
国一年（高媛·37）

肩膀上的戏台（张振军·39）/归去来兮——贡嘎徒步转山（丁  
玉琳·41）/犹忆当年神农架（王琰·46）/随想（刘乡音·49）

### 学术论坛

论王泽题画诗（陈功文·50）



总编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章学诚与汪中交恶始末探析 （张富林·58）

论陶渊明诗文的“清”美 （张甲子·64）

## 学子文苑

徐渭的畸变人生及其女性书写的原型理论解析

——以《雌木兰》和《女状元》为中心 （张诗芳·70）

类义词“巫、覡、灵巫、祝”辨析订补 （冯淑雅·76）

“争千秋，不争一时”——刘绍唐与《传记文学》 （张欣怡·79）

## 艺术空间

李 林书法作品 （李 林·90）

张新根摄影作品 （张新根·90）

任梦洁摄影作品 （任梦洁·91）

史永辉摄影作品 （史永辉·91）

## 学术动态

我院三位教师获批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63）

/ 我院张甲子博士获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69）/

我院张长彬博士在国家一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8）

## ● 应天史话 ●

## 明崇祯末年归德府政局概况述略

□ 兰一龙 指导教师：薛立芳

## 一、治乱之间：崇祯十五年前夕归德府地区的基本情况

自崇祯六年（1633）农民军开始入豫，包括归德地区在内的河南诸地大多饱受战争的困扰。但与此同时，自然灾害亦未尝停缓，反而越来越频繁，其破坏力也越来越强。以至于出现“河南、北数千里白骨纵横，民父子相食”<sup>[1]</sup>的局面。又（崇祯）九年、十二年、十三年河南多地又在自然灾害的作用下出现大范围的饥荒，百姓饥不择食开始食土而餐<sup>[2]</sup>。就归德地区而言，至崇祯十三年其地灾荒尤为严重，当时“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sup>[3]</sup>。连年的灾荒又使社会更加动荡，一些失去生计的人开始四散出逃，亦有辍一地而招纳亡命之徒者，小规模割据团体层出不穷，一时间“河南土贼啸聚数千人”<sup>[4]</sup>，局面异常混乱。如睢州一带便几近陷入失控状态，崇祯十一年（1638）左右“流贼寇睢州浑子集、野鸡岗一带，杀掠最甚”<sup>[5]</sup>，如此则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时政府对于这一区域的管控程度已极为有限。

此间尤为可论者，还有城池一事。如归德之府城，在嘉靖年间曾被大水所冲毁，地方官员遂决定加固城外之堤坝，即达到以堤防水、以堤护城之效，故“堤四面环郭门，周十有六里，厚倍之，上树之柳，不数月而竣工，遂成巨障云”<sup>[6]</sup>，最终达成的效果

为“池距城丈余，阔五丈二尺，深二丈。城堤距城一里许，围一十六里，阔二丈，址阔六丈一尺”<sup>[7]</sup>。崇祯年间，由于战乱频发的缘故，府城附近的百

姓多入城避难，为此又扩大防务空间，“遂因堤筑城，以砖砌之，外圆内方，堪舆家所谓钱形金戈之象也”<sup>[8]</sup>。又如睢州城，其城在嘉靖年间亦曾遭大水破坏，后于旧址南建一新城，“其长十有二里，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围之步积而数之三千八百有奇”<sup>[9]</sup>。但此后旧城也并未废弃，睢州遂有新旧二城，两者相聚形成一“凸”字形状。崇祯年间，又重新修缮着重加固旧城，使“门楼、敌台、女墙、羊马墙、屹然一新。可谓金汤之固也”<sup>[10]</sup>。再如鹿邑县城，于崇祯七年在县令韩友范的指挥下也有“濬隍堑（广五丈深二尺）、筑女墙”<sup>[11]</sup>的行动。

除了官方主持的城池修缮外，也不乏地方贤达士绅主动承担此类事项。如万历年间居乡之吕坤，便深感旧城为一土城，其与堤过近且高度相差无几，



认为“亟宜展城就堤，增堤为城，固以砖石，凿其隍，高深再倍于旧。郊关环筑新堤，用防河患，洵百世至计也”<sup>[12]</sup>。尽管面对种种苦难与阻挠，吕坤依旧按照原定计划向朝廷不断上疏，最终得到朝廷的支持，使宁陵县城“周围拓为六里有奇，高三丈有余，全用包砖，门制桥梁，焕然改观”<sup>[13]</sup>。又如柘城有名刘心乾者，崇祯时深感局势之动荡，乃费一千五百余金而筑一小城，其“周围三里许，堞高四丈许”<sup>[14]</sup>，使附近许多百姓得以在战乱时前来避难。再如虞城地区，在范良彦、杨春育、范志完等人的资助下也对县城进行了易土为砖、创修瓮城的举措以加固城防<sup>[15]</sup>。

除此之外，归德府辖境内的其他地区也大多在崇祯年间由当地官员负责进行了局部修缮，如夏邑、永城二地知县皆在原有城池的基础上扩修防御建筑，考城则重修城池以砖易土<sup>[16]</sup>。

由此而观之，至崇祯十五年前夕，虽然明廷对于基层区域社会的控制力度已经大幅度减弱，但仍掌握着对各个地区的主导控制权。且如归德地区所辖之各州县而言，其城池防备受皆经过多年的经营，还具备着相当之防御能力。

## 二、攻守之间：崇祯十五年前后归德府地区的战况

崇祯末年，中原地区之民变又再次掀起高潮。而这也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起直接作用的当属自然灾害之严重，时人郑廉后来感慨道：“按明季之灾异多矣，而（崇祯）十三年为甚。”<sup>[17]</sup>连年的灾荒使河南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时河南大饥，饥民所在为盗”<sup>[18]</sup>，亦涌现出如李如贤、孙学礼、李际遇等聚万余人且割据某地的武装力量<sup>[19]</sup>。这种灾乱民变的大动乱环境也是李自成部得以重新起势的重要原因。

崇祯十四年（1641），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诸部席卷河南各地，仅在此年便连克洛阳、南阳等地，且两次大举发兵围攻开封，其兵势“虽张、许之守睢阳不如也”<sup>[20]</sup>。尤其需注意的，则是此时农民军、明廷两者的实力正在发生着本质性的改变。规模越来越浩大的民变起事对明廷而言已经成为“固俨然敌国之势，而非平贼之局也”<sup>[21]</sup>的局面。特别是攻克洛阳后，李自成部“得珍宝无算，其势

益丈”<sup>[22]</sup>，整个战局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逆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战争局势的发展，归德府日渐成为农民军与明廷两者之间产生交战的重要地区。崇祯十五年（1642）初，由于屡攻开封而不克，李自成遂改变策略选择以开封地区为中心的外围地带为进攻目标，遂开始将紧临开封的归德作为出兵地区。盖归德其“郡之形势与徐、汴相表里”<sup>[23]</sup>，是为农民军此时必得之域。

此时就归德地区的状况而言，尤可说之事项有城池、军队、乡兵三者。如城池一事，前文已述，自崇祯年间开始，随着战乱的扩展，归德部分地区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城池修缮，如崇祯十二年（1639）礼科给事中毛文炳在奏疏中便提到土城改砖一事称“有功成不朽者杞县、陈留等县也；有旦晚将竣者睢州、光山等处也”<sup>[24]</sup>。再如军队一事，则明廷当时在归德地区的防御力量却较为薄弱，“归德者，向为州，后因乱，故独无藩封，不置兵”<sup>[25]</sup>。正因为归德地区并无明室宗藩的缘故，明廷在战乱时往往对其所投入的关注度不及一些分封有宗室的地区，在遣派军队助力解围的行动效率方面也较低。如崇祯五年（1632）部分游动在山西地区的农民军有南下趋势，便出现“上念藩封，急命兵部檄发昌平兵二千二百人，以副将左良玉将之，救怀庆”<sup>[26]</sup>的情况。又如崇祯十四年（1641）农民军开始大举围攻开封，因此为周王封地所在的缘故，明廷便调兵遣将努力进行营救。这些现象却在崇祯十五年（1642）农民军出击归德之时没有出现，从始至终皆呈现出“归德无兵，民自为守”<sup>[27]</sup>的局面。在官府没有进行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归德府地区便需要当地居民自身加强防卫来维护地区稳定。其中的重要举措便是加强乡兵之建设，但就此而言，无论是当朝官员抑或是本地士绅皆行事谨慎，即注重乡兵的招募与选拔，如若不然，则一些地皮无赖无业游民等成分不佳者一旦混入，会对地区社会的稳定增加隐患，从而造成“未受兵之利，先受兵之害”<sup>[28]</sup>的局面，故各地之防卫多依赖本地的乡民来进行有限的治安管控。由此可大致了解农民军出击归德前后者内部的一些状况。

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李自成部在攻克陈州后率军北进，入归德。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为归

德府城，为此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发亦需经睢州、宁陵二地。就睢州而论，其“俯徐淮而扼汴洛，控陈亳而距大河……又称睢阳江淮之保障，此则为睢阳右藩，诚为中原之望郡也”<sup>[29]</sup>，距离归德府城一百一十里。就其地势而言则无甚险要之处，即“睢无形势，所恃以为固者，城池而已”<sup>[30]</sup>。如前所述，睢州城在此前曾多次修缮，崇祯时期亦曾加固。但当农民军于三月二十二日到达睢州时，因睢州官员逃奔，又无军队救援之故，城池几乎未经交战便已易手。当时刚从朝中罢官返乡的前给事中李梦辰本想组织城内力量挽救局势，其“聚其族告曰：‘吾宗世受国恩，义当与城同存亡，有遁城者，吾必手刃之。’于是州人感其义，有不去者”<sup>[31]</sup>，然而不久便城陷被俘，继而自杀身亡。由睢州之事亦可观其时归德地区之混乱局势，在农民军不断的攻势下明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近于瓦解，官员四散逃去，又无军队前来救援，所以才有这类未经大战便城池易手的情况发生。随后李自成、罗汝才等人继续东进，“过宁陵，城陷，垣堞拆毁”<sup>[32]</sup>，兵锋直指归德府城。

此时归德府城内部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就官员留守情况而言，其未出现类似于如睢州城内官员逃阙的状况，“贼乃悉众攻归德。推官王世琇迁工部主事，将行，僚属邀共守，慨然曰：‘久官于此，临难而去之，非义也。’遂与副使蔡凤、佾事吴汝琦、同知颜则孔、经历徐一源、商丘知县梁以樟、教谕夏世英、里居尚书周士朴等誓众坚守”<sup>[33]</sup>。众多地方官员的留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城内的基本秩序，并在农民军大部进至归德府城之前的短暂时间内组织相应的防卫工作。但与此同时，城内又存在着各类矛盾。其中最为致命的便是前文所述的本地官员与士绅之间的矛盾，如有“胥吏与青衿殴，太守大怒，左袒其胥吏，一日而褫六青衿。阖郡之士遂大譁，数百人哭于庙，群奉先师之主号咷而置诸府署，声徹数里。推官王世琇婉解之。太守不得已大创其胥吏，乃得释。青衿自是亦横矣。识者谓其不详，而知城之必不能守也”<sup>[34]</sup>。此外，在组织城内防卫工作时双方又不时发生矛盾，如当时的商丘县令梁以樟被众人推举统领府城内的战备事宜，其详细地规划了具体的城防要务，自己更是亲历亲

为日夜巡视，“凡在城者无贵贱皆守职，官守门驻戍楼……其未仕而有威望者守角楼或敌台……以樟都统于其上，谓之总理，而巡稽之，如睢阳故事”。为了严肃纪律他还专门制订了对玩忽职守者的惩罚标准，“其有怀安不任职而擅离所守者，不论贵贱，罚弓刀火药等物，为战所用；再则加一等；三则移其家属于城外”<sup>[35]</sup>。

梁以樟以严格的要求来审查诸城防事宜，但部分士绅却玩忽职守从而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按照郑廉的记载，事件的发展大概如下：

时乡宦宋权守南门，偶离次，以樟谓其失伍也，欲置诸法。权曲谢，不能释，乃大怒，阴结诸生薛凤举、侯方域等盟于孝廉吴伯裔家，谋以三月望日谒庙时大闾。既而以樟偶疾，不谒庙，不得法。于是官衿俨如敌国矣。会陈州警至，以樟诣府计事。诸生百余人，遂围诸府署。推官数谕之，不能释。日且暮，以樟之党侯性、司马亮等数十骑擐甲彀弓，自县驰于府，矢如雨下，诸生中伤者累累也。而何广者，矢著其额，遂毙。众大奔，围乃解。以樟扃舆还署，夜开城北门，遣性等走开封，申报院司。是所谓官衿相仇者也。明日，议恤何生之家，而以樟造宋权之庐谢罪焉，乃释。<sup>[36]</sup>

梁以樟的严格约束使偶然离守的宋权在请求宽恕无果后大发怒气，遂与归德本地的众多学子联合共同闹事。他们聚众围堵政府官署，不顾局势的危机大搞内斗。在混乱的局面下甚至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最终这一事件以梁以樟主动前去向宋权谢罪而得以告终。这充分体现了归德地区士绅群体势大骄横的现实局面，以至于地方官员已经很难良好而又有效地进行基层管制。在大敌当前的危机关头，归德府内却大行内斗，官员与青衿水火不容，内部矛盾异常激烈，这也是后来归德最终难以抵御农民军进攻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部于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归德府城附近，且阵势凶猛，“围归德三匝，凭城望之，贼账被野，黄霾中骑步杂沓，往来如蜂蚁然，弥望莫测其边际”<sup>[37]</sup>。农民军和归德守军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双方的炮火不断以至于城内“无敢当巷行者”。而农民军在攻城时依旧采取了其一贯擅长的“拆墙炸

城”法，但归德的城墙不比开封，在屡经农民军的拆、炸后“城辄坏数仞”，城防已经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归德城内的顽强抵抗更是让农民军怒不可遏并加紧了攻势，势必要拿下此城，“贼怒，尽锐攻，务必拔，竟夜砲声不绝”<sup>[38]</sup>，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城内的防御渐渐不支。“丙申（二十七日）食时，天忽雨，城上砲不鸣，士卒皆疲馁不任战”，农民军趁机架云梯从西北角以及城南蜂拥而上。同时，城内更是出现部分叛卒并最终导致守城之势彻底不支，如“李好所将卒，皆反著甲衣，与贼同号而杀人，且大呼曰：‘城陷矣。’城遂陷。”<sup>[39]</sup>

归德府城的失陷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从军事实力上来讲归德属于“无藩无兵”的状态，所有的城防事宜全部都是由当地官员以及在乡民众独立承担。在本就不利的情况下其内部又并不团结统一，即便是在临战前官员和士绅群体还冲突不断，若非有像县令梁以樟为代表的以大局为重的地方官员甘愿主动谢罪以平息事端，情况恐怕只会更差。在开战后农民军则是主力汇集全力攻城，而归德守军则是孤立作战，无论是补给还是弹药均出现短缺。此时其内部不一的情况则表现得极为突出，不仅有将士临阵倒戈，个别青衿在此时更是急于逃窜使本就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如总督侯恂之子侯方夏认为局势不利便急于率领族人逃窜，以至于“率家众斩关出，伤守者”<sup>[40]</sup>，在关键时刻急于维护本族利益而置全城而不顾，无怪乎后来有朝臣在弹劾侯恂时指出此事，发出“恂家郡城，城破，其家何以独全”<sup>[41]</sup>的指斥。相比之下，部分留守的地方官员则大多死于此战，如“同知颜则孔、推官王世琇死之”<sup>[42]</sup>。又如县令梁以樟虽幸免于难，但“梁氏共焚死三十六人”<sup>[43]</sup>。再如前文所述，士绅群体与基层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所谓的“共生”关系，故当基层社会原有秩序被破坏时，其自身利益亦必会受到损害。如此时闲居家乡的前工部尚书周士朴在城池失守后死于此战，其“妻曹氏、妾张氏、子举人业熙、子妇沈氏俱自缢”<sup>[44]</sup>。哪怕是成功携一定亲属出逃撤离的侯方夏也未能救出全部族人，“侯氏一门死二十余人”<sup>[45]</sup>，亦可谓伤亡惨重。

事实上，归德府城作为当时明廷在归德地区为

数不多还保留有一定基层控制力的核心区域，在其被农民军攻破后，除永城之外，明廷已基本丧失对该地区其他州县的有效掌控。在攻克府城后，农民军又分遣部分军队继续出击归德府辖境内的其他治所，如“发贼三千至虞，拆成、焚杀”<sup>[46]</sup>。其他如鹿邑、考城也皆为农民军所破。由于此时农民军依旧以流动型作战的方式与政府对抗，故在攻克每一地区后大多会采取毁坏城池的做法，如其军在进兵鹿邑后便“坠城而去”<sup>[47]</sup>，以免在退兵后其地再次为官军所占并有效利用。农民军在三四月间基本达到了其先前作战目标，以武力方式抢夺了明廷在归德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从而对战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归德府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存亡得失对开封之战局有着重要的作用。归德既失，明廷便失去了一个可以在战略上策应、支援开封的重要支点。农民军拿下了归德，便可切断开封之“右臂”，有了可以支援围攻开封城池之友军的后援补给区，后者得以一改前期猛攻开封的方式，而转变为采用长期困守的策略，从而达到对开封的孤立封锁，使其难以支撑，即所谓“贼既破归德、穿井储粮，作困汴计”<sup>[48]</sup>。整个战局继续发生着颠覆性的转变，亦为同年开封在两者之间的易手奠定了基础。

### 三、叛顺之间：崇祯十五年未所发生的永城之乱

农民军在崇祯十五年三月攻克归德后即率大军重新展开对开封的第三次进攻，其兵锋未至于归德府境内东端的永城。然而永城却在没有遭受到来自于农民军的攻击的情况下陷入到一场因自身内部矛盾所引发的变乱之中。从时代背景来看，这首先与当时豫东群盗迭起的情况有着密切联系，“是时，梁、宋间新罹兵革，百姓率千百为群，团结相保聚，其不逞者，遂窃弄。西则有李际遇、王彦宾、郭黄脸、张长腿等；东则有房文雨、徐显环、戚念梧、程肖瑀等，凭栅树砦者，不可胜数，然恐时平而有司或绳之以法也，乃自诩于有力者以为窟穴。有力者亦竞相招纳，引为羽翼以自雄。所在皆然，而永城特甚”<sup>[49]</sup>。由于河南战事的日益扩大，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也随之下降。此时在豫东地区涌现出了数量庞大的游离于体制外占山为王的盗寇群体。在政



府既无力对其进行一一整治，而后者又担心自己在社会秩序回复平稳后难逃政府法网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众多零散武装头目依附有势力者以求自保的现象。而在永城地区，群盗所依附的对象主要是当时身在永城的总兵刘超。

如前文所述，此时归德府各地域间内部皆存在着一定内部矛盾，即在局势日趋混乱的大背景士绅群体对地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乃至和明廷在当地的官员不时发生冲突。“永城之乱”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爆发。刘超为永城浑河镇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河南武榜第一，在天启年间曾追随时任贵州巡抚的王三善参与平定西南土司叛乱的战事，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崇祯八年（1635），鉴于战事日趋激烈且城中防御力量薄弱，便“仓卒为守御记，而超移家入城，身任其事，由是与荐绅先生游处”<sup>[50]</sup>。刘超本人招揽了一些地方武装后具备一定的武装力量，且在崇祯十五年（1642）为同乡范志完举荐为保定总兵，同年亦曾“以家丁援汴……复召剧盗张廷玺为军锋，与袁时中战于夏邑，胜之，顿兵不前”<sup>[51]</sup>。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战事之中。刘超移其部众入城，本应是永城地方士绅的意愿，但前者所辖之兵士有许多皆是为求自保而投入其门下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便使城中部分士绅对其产生相当的疑虑，再加上其在被朝廷任命为保定总兵后依旧留驻在永城迟迟未赴任，便更使部分士绅对其敌意倍增。随着这种不信任感的与日俱增，双方的矛盾也愈发激烈并最终导致双方大打出手从而引发兵乱。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闲居城内的前御史魏景琦、举人乔明楷为刘超部下兵卒所杀，兵乱正式爆发。事实上，这一看似偶然的突然性事件源自长期以来双方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如在城防事务方面刘超行事严厉，期间有乔姓族人缒城而逃，刘超欲行军法以立威。但遭到魏景琦、乔明楷等人的反对，双方最终不欢而散，“自是超与魏、乔等有隙，聚党相仇如敌国然”<sup>[52]</sup>。后魏景琦又“见超日与土寇相往来，未尝与自成一战，诋为通贼”<sup>[53]</sup>，乔明楷又告知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好友方士亮，后者亦上疏弹劾刘超逗留不前、观望使任，致使刘超惧怒交

加遂起杀意，又有记载称此事件的经过为“故御史魏景琦仓头与家人争蔬而鬩。超见景琦谢过，语次，家丁抽刃杀景琦，屠其全家，势不自制，并杀贡士乔明楷，据城反”<sup>[54]</sup>，无论直接原因到底是哪种，其根源皆在于双方长期所形成的矛盾所致，非一朝一夕之事可言之，这种判断应当是大致符合当时情况的。

但就此事而言还需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魏、乔等人是否是在刘超本人的主使下被其兵士所杀？大多记载多认为是刘超怒而率兵杀人继而直接叛乱，唯有前引谈迁的记载中称此事不为刘超意愿，乃是其手下兵卒所为。以笔者看来，谈迁之论或许更为接近事实。原因便在于事发之后，刘超并未立刻据城反叛，而是找到当时在城中的前陕西巡抚练国事、总督丁魁楚，请求他们文书魏、乔之罪，以求脱罪，随后则“使其党闭门守，而自率众西，将以白当事者。至归德，闻王抚军（河南巡抚王汉）自将而东矣，遂还据永城以叛”<sup>[55]</sup>，刘超在事变后还一度想要亲自去向朝廷澄清事实，说明魏、乔等人的不法行为，但在路途中却听闻朝廷已经发兵东来，便不得不撤军据守永城。但在据城期间，他又表现出左右游离、飘忽不定、欲战欲降的状态，其重用本地以练国事、丁魁楚这样士绅，想以此来获得与朝廷协商缓和的机会。这样既战既和的举动也使之后的战局经常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局面。

王汉的到来，使这一突发性兵乱本可以得到及时的控制，其“抵永城，声言招抚”<sup>[56]</sup>。并带兵驻扎在永城东，此时身居城内的丁魁楚看到朝廷军队前来后便在夜晚开启北门，然而这却惊动了刘超门下的部分军队，在混乱中明军遂与后者发生交战，巡抚王汉“俄而兵为贼掩袭，大溃，汉竟殁于乱军”<sup>[57]</sup>。然而，巡抚王汉之死似乎又是一个和先前魏、乔等人被杀一样，是一超乎刘超本人想象的突发事件，后来在给马士英的书言中其亦称“前魏乔之死出于激变，而王府军之死出于鼓噪，是虽有杀人之事，而职非有杀之心也”<sup>[58]</sup>，之后又不断解释称王汉初达永城时两人便计划相约，未果后“仍约于次日围棋小酌。岂知夜班乃夺门而入，乃两军误战”，认为“抚军未至城内，而职兵未出城外，则抚军之死，

如何归罪于职耶？”<sup>[59]</sup>，面对刘超的辩解，连马士英也不得不承认“该镇虽拒捕，想未必即有杀抚臣之心，不幸而有杀抚臣之事”<sup>[60]</sup>。一些城内士绅后来亦言其“日夜望有明旨洞达……不料两月以来，明旨总未见，而攻围之兵声言踵至。夫大将军原非叛逆，何以伐为？”<sup>[61]</sup>足见此事多半是一偶然事件。

但王汉的意外被杀终究使局面彻底失控。如果说先前明廷尚抱以调和方式解决此事变之想法，则王汉之死彻底改变了官方对此事件性质的认定，即认为刘超“杀两乡官一巡抚，以真为叛逆”<sup>[62]</sup>，遂决定大举发兵以武力平叛的方式解决此事。起初，当河南巡抚王汉还未遇害时，时任凤阳总督马士英就预感到永城局势的恶劣，因此密令参将屠师贤“诛毫、宿土贼，芟其株蔓”<sup>[63]</sup>，尽量控制住周边地区的局势。他在听闻王汉遇害后，便上疏请求讨伐刘超，河南总兵陈永福亦“一日夜疾驰四百里，薄永城。环濠筑墙，以防冲突”<sup>[64]</sup>。但当时正逢左良玉于开封溃败之后退至武昌，并有扬言率领军队至南京就粮的举动。一时间江南地区人心惶惶，明廷又不得不加强对南直隶地区的守卫。身为凤阳总督的马士英不得不赶往江南，仅令部下率领宿、毫一带三千兵马包围永城伺机而动。然而“贼据城，炮甚烈，毙者甚重”<sup>[65]</sup>，明军除围困永城外别无他法。在此期间马士英曾传达给刘超一封书信，劝其束身归阙、诛贼自效、安顺守常，并“以是非听之公论，以生死听之皇上”<sup>[66]</sup>。但此时刘超的态度却较为复杂，一方面，当河南巡抚王汉死后，朝廷已将其完全定性为叛逆。刘超本人“益自分无生理，日与群贼谋为固守计，听其下屠掠，无复敛戢”<sup>[67]</sup>，同时“其党又皆故永城群盗，不肯去乡里，弟越庸材无远识，皆以为据城缮守备，官军无如我何，稍缓，大臣为奏请，可无事矣，遂据永城不出”<sup>[68]</sup>。从中可见刘超及其党徒多是鲁莽武夫之辈，一方面自恃城池守备，认为其完全可以阻挡城外明军的攻势，同时又认为还可以通过上疏向朝廷申明情况而自赎，殊不知自身的行为已经无疑会被认定会叛逆，其下场也可想而知。

双方僵持的局面一直维持至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四月初，马士英便奉诏偕总兵官黄得功、刘

良佐、杜文焕各路军队齐聚永城，战场的形势开始发生转变。四月初五，马士英向城内的刘超发出一道措辞严厉的檄文，称对方于法可死、于寿可死、于良心亦可死，并且劝其尽早开城投降<sup>[69]</sup>，更宣称其“共率马步三万，合力围攻，城破自在旦夕”<sup>[70]</sup>。但仅仅十几日之后，马士英便下令其部下停止攻城，甚至于不顾诸将之反对又开始与城中刘超等人通过书信展开对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之大的态度转变，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永城城池坚固且战略物资充沛，“城中先以御敌故，屯粮、积刍、制火礮，至是尽为超有”<sup>[71]</sup>，固无论是长期围困或短时间的猛攻皆无法立刻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明军作战力不高，如殉难不久的河南巡抚王汉当时便曾评价认为“国家养兵不为不厚，平日糜饷则有兵，沿途淫掠则有兵，及至大敌当前则无兵矣。兵之谋谏，非一人，亦非一日”<sup>[72]</sup>，足见当时明军之普遍状况，故其作战多败也不无道理。如此战来看，明军合数万人众围攻永城十余日却没有太多进展，亦是其军队能力水平之体现。再者，从主观角度来看，刘超依旧有强烈的乞降意愿。且因为其与马士英有旧交，即“超官贵州时，与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sup>[73]</sup>，使马士英决定在猛攻不成的情况下转变策略采取假意招抚的招式来解决此事。最后，此举会得到城内部分士绅的积极支持，在马士英停止攻城重新开始双方的书信往来后，“城中诸绅皆喜，乃有乞降之议”<sup>[74]</sup>。这些皆是促成马士英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选择转变策略的重要因素。

自四月十七日起，马士英便开始以书信的方式企图招抚刘超，他通过城中有威望之士绅与后者不断进行联络，并许诺其事后可随自己至寿春共事而不会被绳之以法，使刘超产生事后可以逃避处置的幻觉，同时又强调朝廷大军数万，并非难以攻城，只是顾念民情想要尽快了事，并要求刘超尽快出城前来会面。但就这类要求而言，刘超即便再如何急于请降也会保持警惕。而城内之士绅更是十分紧张，认为若是刘超就此一去而不复返，其兵士必然会在城内大开杀戒，于是便呼求马士英一定要言而有信，强调一旦“过申时不至，则腹将生疑，甲士环刃，

弟辈全家危矣”<sup>[75]</sup>。至二十四日，刘超应约而至，其部下果然“置诸绅城头，约超不还，即刃如道府”<sup>[76]</sup>。马士英权衡再三并未趁此机会立刻动手，而是如约让刘超安全返城。第二日更是派遣部分官员入城相谈，至二十六日刘超再次同城内士绅练国事一同出城相见。几次会面最终使刘超误判形势，认为马士英果真是真心招抚，其遂在二十七日带领本部人马从东门出城，至二十八日，刘超门下诸多兵卒尽数而出。然而实际上事件的进程是“练国事、丁魁楚达士英意，阳为超请命，士英许诺”<sup>[77]</sup>，双方早已达成共识，只是心照不宣等待着刘超做出最终接受“招抚”的决定。如丁魁楚便“计款之，阴遣子弟兵四面布置”<sup>[78]</sup>，在城内策应。而城外亦布置妥当，故当刘超门下所有人员率军出城后，明军便按预定计划快速地逮捕各个首领，将其押送京师进行处决。

对于此事，时人谈迁认为“刘超非叛者。所收降盗为廝养卒，其弟越又亡赖，披猖不戒。一旦失图，受其劫胁，俛首乞命，冀以自白，故力全丁启睿练国事等”<sup>[79]</sup>，又有豫人言“超知书，好交结东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时自负其材，以永城人不许令就文试，故俛而从武。往往与同里不合。王抚军汉字子房，其遇害也，超为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谋，均何轻身失算，误为乱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sup>[80]</sup>。对于刘超起事行为的判断可谓一语中的。

综合来看，永城之乱的发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从根本上讲，伴随着局势的恶化，归德府辖区内的各主要地区普遍呈现出一种明廷地方官员与士绅群体之间矛盾频发的现象。而永城地区的情况则更为特殊，在地方官员空缺的情况下，本地士绅基本充当了维护区域稳定的主要力量，而永城之乱本质上则是地方士绅与地方武装之间冲突的结果。就刘超而言，其不断招降大量的盗寇团体，这便使得当地的士绅对其之排斥感愈发强烈。而刘超在被众人共推为分管城防的主要负责人后，其与当地士绅之间的矛盾便被进一步激化，进而被后者所排挤、弹劾，从而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从事情发展进程来看，刘超本人亦始终无法控制局面，这与其门下诸军成分复杂、帮派林立的情况密不可

分。起初魏景琦、乔明楷的被杀他本人无法控制，其后巡抚王汉的遇害他也无法制止。在事变后他屡屡想要寻求机会接受朝廷的招抚，不断上疏自白但同时又据城自守，行为举动让人难以理解。刘超本人无法驾驭前来投靠之徒，其自身又因混乱之局势而不得不倚重这些军士而自保，故而这种在行为上叛逆而在精神上又欲归顺的双重行为便是合乎情理的表现。

永城之乱从崇祯十五年（1642）末爆发，至次年四月方才平定。整体看来，从崇祯十五年（1642）开始，睢州、宁陵、归德府城、永城这些明廷在豫东地区的重要治所，或被农民军攻取、或是自身内部倾轧发生变乱，皆使官方几乎丧失了对其的管控。归德府内地域社会的混乱局面也反映出当时明廷在中原战场的被动态势，而这也不可不谓后者最终在河南战场上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兰一龙，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2022届毕业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 参考文献：

- [1] 吴伟业. 绥寇纪略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43.
- [2]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11.
- [3]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58.
- [4] 谈迁. 国榷 [M]. 北京：中华书局，1958:5886.
- [5] 睢州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506.
- [6] (光绪) 商丘县志，卷十五，艺文志·护城堤记 [M].
- [7] 归德府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391-392.
- [8] (光绪) 商丘县志，卷一，城池 [M].
- [9] 睢州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356.
- [10] 睢州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1.
- [11] (乾隆) 鹿邑县志，卷三，建置略·城池 [M].
- [12] 孟养浩. 吕司寇颂德碑记. 宁陵县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407.
- [13] 宁陵县志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4.
- [14]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36.

- [15] 虞城县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46.
- [16] 归德府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395-398.
- [17]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67.
- [18]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1310.
- [19] 戴笠、吴旻. 怀陵流寇始终录 [M]. 沈阳: 辽沈书社, 1993:279.
- [20]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03.
- [21] 郑廉. 自序四.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2.
- [22] 夏允彝. 幸存录 [M]. // 续修四库全书第 44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551.
- [23]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2340.
- [24]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53.
- [25] 吴伟业. 绥寇纪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238.
- [26] 彭孙贻. 流寇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13.
- [27]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1315.
- [28]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54.
- [29] 归德府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384.
- [30] (顺治) 睢州志, 卷二, 城池志 [M].
- [31]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3.
- [32] 宁陵县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516.
- [33] 夏燮. 明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456.
- [34]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2.
- [35]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5.
- [36]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3. 按: 笔者对这一记载中所谓“(梁)以樟之党侯性”一句有疑。侯性其人各种史籍之中信息较少, 且文字模糊。清人徐鼐直接写道: “侯性, 不知何处人”, (见徐鼐. 小腆纪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379.) 王夫之对他的身份则有略微记叙, 认为“侯性, 河南归德人。兄恂、恪”, (见王夫之. 永历实录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2:208.) 钱海岳先生对侯性的记载则更为具体, 认为“侯性, 字若孩, 商丘人。太常卿执蒲从子”, (见钱海岳. 南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3129.) 这一记载使侯性的基本身份信息得到确认, 但所谓从子一说, 还是并未明确其在商丘侯氏家族中的具体身份。《商丘县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 其对侯性的记载为“侯性, 字若孩。邑人侯执介之养子, 执介妻田通政珍女, 田无子, 少育性为子”。由此可以大致判断侯性当为侯氏家族一个旁系远支的后嗣, 被侯执蒲的同辈兄弟侯执介领为养子。他与侯恂、侯恪应当为族内从兄关系, 亦是本地士绅。既如此, 再阅郑廉此记载, 则侯性能与前来本地任官不久的梁以樟结为所谓“死党”, 进而发生与有本族亲属在内的青衿相斗之行为便很不合理, 实在是有些违事逻辑。
- [37]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5-116.
- [38]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6.
- [39]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16.
- [40] 夏燮. 明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456. 按: 此条时间误, 夏燮于考异中言明史本纪中记此事于三月, 但据列传(亦未言何人之传)及《绥寇纪略》所载当为二月二十七, 却不知后者记载亦有误。郑廉《豫变纪略》认为农民军于三月二十六日至府城, 二十七日破城的记载较为准确。理由如下: 首先, 其作者郑廉本人当年身在归德, 后被俘入罗汝才军营之中, 对时事有亲身经历, 记忆当更接近于事实。其次, 相关史料之记载与其相切合。如《商丘县志》便有“十五年春三月二十六日, 贼以百万逼宋, 攻一昼夜。西南门溃, 贼遂入, 杀戮官吏士民近二十万人”, (见(光绪) 商丘县志, 卷一, 城池 [M].) 又如《睢州志》记其于三月二十二日为农民军所破, 后者在此地停留三日遂继续进发。则其离开日为此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 之后又途经宁陵, 破其城。则于宁陵停留一日或破城即过, 至二十六日中午到达归德府城, 较为合理。(见睢州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506.)
- [41] 戴笠、吴旻. 怀陵流寇始终录 [M]. 沈阳: 辽沈书社, 1993:274.

- [42] 归德府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854.
- [43] 计六奇. 明季北略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322.
- [44] 徐秉义. 明末忠烈纪实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15. 关于周士朴的死, 多以城破自缢为主。惟谈迁记其为农民军所杀, 其文曰“寇陷归德, 执周尚书士朴。责数之, 答以布袍革履不预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势肆虐乎?’ 辞以不闻。曰: ‘尔瘞金十三窖, 何来?’ 不能答, 被磔。” (见谈迁. 枣林杂俎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88.) 这条记载或许可以从侧面反应出其时周氏族人借周士朴在朝为官之故, 在地方狐假虎威的拙劣行径。
- [45] 王树林、吴玲. 侯朝宗年谱新编. // 侯方域、王树林. 侯方域全集校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1236.
- [46] 归德府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854.
- [47] (乾隆) 鹿邑县志, 卷三, 建置略·城池 [M].
- [48] 戴笠、吴旻. 怀陵流寇始终录 [M]. 沈阳: 辽沈书社, 1993:266.
- [49]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51-152.
- [50]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83.
- [51] 彭孙貽. 流寇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94.
- [52]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52.
- [53] 夏燮. 明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469.
- [54] 谈迁. 国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5946.
- [55]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52.
- [56] 徐秉义. 明末忠烈纪实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8.
- [57]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83.
- [58]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70.
- [59]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74.
- [60]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74.
- [61]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8. 当然, 这期间永城士绅发给城外明军的书信内容不能过于深信, 因为其时刘超据有城池, 城内居民之安危全倚他手, 所写内容也必定经刘超等人阅览才可送出。虽如此, 但其时刘超仍欲以此而求和, 亦能反映出王汉被害之事却非其意。
- [62]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8.
- [63] 马士英. 永城纪略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1.
- [64]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84.
- [65] 马士英. 永城纪略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1.
- [66]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5.
- [67]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84.
- [68] 郑廉. 豫变纪略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153.
- [69]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6.
- [70]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7.
- [71] 夏燮. 明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470.
- [72] 徐秉义. 明末忠烈纪实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8.
- [73]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7939.
- [74] 马士英. 永城纪略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2.
- [75]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81.
- [76] 马士英. 永城纪略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62.
- [77] 马士英. 永戾 [M]. // 黔南丛书第十一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85.
- [78] 计六奇. 明季南略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340.
- [79] 谈迁. 国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5980.
- [80] 吴伟业. 绥寇纪略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480-481.

## ● 人文往事 ●

## 往事回眸：难忘师专 19 年

□ 王增文



从 1982 年元月我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商丘师专工作，到 2000 年 5 月商丘师专与商丘教育学院、商丘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商丘师范学院，我在商丘师专整整工作了 19 年。这 19 年，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我艰苦奋斗，能时时体会到温暖、激励的一段生命历程，它将让我永志难忘。



## 1. 初到师专，就让我体会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 1977 级学生，因是 1978 年 3 月初入学，所以到 1982 年元月毕业。毕业分配时原则上是回本地区工作，但当时河南大学中文系先按历年考试成绩排出前 30 名，说要分配到省直高校工作，我侥幸名列其中，又因为家乡周口地区当时还没有省属高校（周口师专几个月后才成立），所以被分配到临近地区商丘师专工作。拿到派遣证的第二天，记得大约是元月 10 日左右，我就和王树林一同乘火车来到商丘师专报到。学校领导特别热情，但由于我们报到较早，宿舍尚未打扫，故安排我们先到文化路口的红卫旅舍住下。两天后，来自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大的毕业生大约是 26 人，都陆续报到啦，学校为我们都安排了宿舍，学校和部门领导都陆续到宿舍来看望我们，一时好不热闹。当时商丘师专才刚刚成立不到半年，校领导还是商丘师范大专班的领导，校长是张兆坤，副校长是王业振和戴鑫。我自然是被分到中文专业任教，当时还叫语文组，组长是李明若和赵德润老师。语文组的老教师有葛润林、徐立、孟庆伦、谢其禄、范尚信、姜明德、马玉山、郝蜀山、李正平，还有一位是从鹤壁师范大专班 77 级毕业的青年教师张力群，他比我们早来 1 年。和我一同分到语文组的新教师除王树林外，还有陈华光和谢景和，我们 4 人都是河南大学中文系 77 级同学，被分配到一间有 30 多平米的大房间中。老教师轮流到我们的宿舍中探望，嘘寒问暖，介绍学校情况，特别亲切热情。

到了 2 月份，商丘师专领导班子成立啦，党委

书记由商丘地委宣传部长常俊英兼任，副书记是刘济生，校长由商丘行署副专员张静文兼任，副校长是王业振和孙廷俊。语文组成了中文科，李明若、赵德润老师为负责人，唐志献为文科（含中文科、英语科）党总支书记。到1983年9月，师专领导班子又作调整，刘济生为顾问，许登文任党委书记，王瑞雨任副书记，王业振任校长，赵德润、孙廷俊任副校长，李明若为中文科副主任（后任主任）主



在初到师专的一两年内，有一件让我特别温暖的事。1982年7月，我爱人从河南农学院牧医系毕业，师专领导为解决我的后顾之忧，特意与河南农学院联系，要求把我爱人分到商丘来。我爱人被分到商丘地区后，当时学校组织处许登文处长多次到地区人事局交涉，但因意外原因，地区人事局却将我爱人分到商丘县，商丘县又将她分到张阁乡。学校领导很关心这件事，就派曾经担任过商丘县教育局局长的戴鑫校长到商丘县协商，将我爱人改派到商丘县城关一中，并商定1年转正后调往师专。1983年秋，校领导果然把我爱人调到师专来。因当时大家专业观念都很强，我爱人在师专没有对口专业工作，不久又在校领导帮助下调到商丘教育学院生物系任教。这件事前后拉扯两三年，让我深深感到了领导的关心和组织的温暖。

当然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领导和老教师的关怀，年青同事之间的关心帮助，也无处不在。

当时我们语文组和中文科的两位领导，都特别关心我们，分课时耐心征求我们的意见，刚开始时因工作需要让我教现代汉语，1年后根据我的专业爱好，又让我改教中国古代文学。李明若和赵德润两位老师，作风都很民主，记得当时每年都要给每位教师写工作鉴定意见，他们两位领导将鉴定意见写好后，亲自到每位教师家中宣读，问可以不可以，直到每位教师都满意为止。

葛润林老师是建国前扛过枪渡过江的老党员，又是北京大学1960届毕业生，但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逢年过节总是偷偷往我家厨房里送点儿好吃的东西。一位青年教师打球时塑料凉鞋带子跑断啦扔在球场边，他就偷偷拿回家在煤火炉子上用铁片烤烤粘粘再拿回来。徐立老师见我爱人分配工作不顺利，就主动领着我到地委宣传部长常俊英家中反映情况，常部长当时兼任师专书记，也是特别热情关心。我深深感到当时的老领导老教师都特别纯朴善良和真诚。

至于我们这些刚到师专的青年教师，更是情同手足，无话不谈。比我们早到1年的张力群老师性格豪爽，经常组织大家小聚，几盘小菜和几瓶白酒，就让大家热血沸腾，找到了亲兄弟一般的感觉。

## 2. 师专时条件艰苦，但校风教风学风特别好

我刚到师专时，学校只有1栋教学楼，2栋家属楼，学生有七八百人，教职工100人左右。平时教师都在宿舍里备课办公，周五下午政治学习时集中在学生餐厅里开会，各人搬着各人的椅子。记得教室紧张，1983级学生是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上课。我们77级毕业生刚来时两人1间宿舍，虽然简陋，还算是正规房子，到78级毕业生分来时，学校只好在西院墙边搭建一溜简易房子安置他们。

到1989年以后，条件逐渐改善，多数教师搬进了家属楼，各科都改为系，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办公桌，几张木连椅，围着两张乒乓球案子开会。校领导都集中在两排由旧教室改造的平房里办公。



师专时条件虽差，但校风教风学风一直都特别好。

说当时校风好，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好。

当时领导干部人数较少，学校领导只有5个人，书记、校长抓全局，副书记抓学生工作，两名副校长1位抓教学，1位抓后勤。当时领导干部都很廉洁，工作很敬业，王瑞雨书记就是一位典型代表。他抓学生工作，几乎叫得出全校每个学生的名字，与每届学生都相处融洽，真正关心爱护他们。他家里孩子多，生活一直很困难，但他却特别廉洁。他曾经负责招生工作，也曾有人给他送礼，但他一概拒收，硬送到家里的，晚上给人家送回去，离得远的实在送不回，就折成现金给人家寄回去，买一些不当用的东西，只能使他更加困难。虽然困难，但他精气神儿十足，人格风范就足以感动很多人。

赵德润老师刚开始时是我们语文组和中文科的负责人，主抓学生工作。当时学生每天都要出早操，赵老师住在地区人民医院，离学校有10多里。他每天早晨5:00就起床往学校赶，骑个破自行车，冬天连个手套都没有，但他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跟学生一起跑步，检查出勤人数。

1995年，学校主要领导做了调整，商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政文到我校任党委书记，周口师专副校长王新民到我校任校长。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已大为改观，但两位领导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

的作风。王政文书记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工作能力特别强，对教师特别尊重，每次见到我总是以老弟相称，握手致意，关怀备至。王新民校长谦逊务实，作风民主。两位一把手相处和谐，艰苦创业，最后终于完成了学校专升本的宏愿，可以说是学校发展的最大功臣。

师专的教师也都很敬业，师德师风和教风特别好。葛润林老师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亚非研究所工作，但他后来响应国家号召，自觉来到河南商丘任教。师专成立时，缺现代汉语课教师，他虽然是江苏淮阴人，乡音较重，但仍然主动承担起现代汉语和普通话的教学任务。后来现代汉语课有人教了，逻辑课没人教，他又改教逻辑课。我刚到师专时教现代汉语课，经常听他的课，也经常到他家里去，看到他办公桌前的破藤椅上放着一个大棉垫儿，他整天坐在那里学习，就像高僧打坐一样。他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每年都有学生因逻辑课多次考试不及格而毕不了业。有一次，我到葛老师家里为一位学生求情，他非常真诚地跟我说：“增文呀，他考试不及格，我硬给他及格，这不是害他吗？”他那认真而诚挚的眼神让我立即汗颜。记得1987年要评职称，老教师晋升职称可以免试外语，但他强烈要求考外语，这在老教师中是独一位。后来他退休后，我还经常去家里看望他，见他80多岁时还坚持读英语书。2014年，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炯教授来商丘师院文学院讲学，张炯教授给我说葛润林老师是他北大的老同学，我即将将葛老师请来与他相见，共进晚宴，他们相谈甚欢。葛老师的老同学有不少是国家学界和政界名人，葛老师当年若是不主动离开京城，其事业成就肯定也会更高，我既为他惋惜，又被他感动。今年春天葛老师不幸去世了，因疫情原因丧事简办，他家人和单位都没有通知我，过后多日才有人告诉我，我十分悲痛。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同葛老师的所有行事，但我非常敬重他。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纯粹而高尚的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能仰而望之。





至于师专教师的讲课认真，我想举赵德润、刁克昌两位老师的例子。赵德润老师当年给学生讲王勃《滕王阁序》，全文及注释都能背诵下来，声音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让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刁克昌老师教历史课，后来担任历史系主任。我曾听过刁老师为中文专业学生讲中国古代史，全堂脱稿讲授，很多人名、地名、数字都烂熟于心，板书自如，整整一堂课，我没有见到他看一眼教材和教案，当时就让我十分惊叹。这样敬业的老师，怎么能教不好课，怎么能不受学生尊敬呢？

师专学生的学风更好。当时招生人数少，能考上大学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当时的师专生其文化程度绝不亚于现在 211 大学的本科生。因当时学生少，中文专业每年只招一两个班，所以教师对学生管理的特别细特别严，学生早晨和晚上都要集中在教室上自习，辅导员和班主任要跟班检查。平时上课都要点名，学生听课要认真记笔记，考试时监考特别严，特别是学校的巡考人员是真抓真管。当时我们还埋怨这是中学式管理，但就是这种中学式管理管出了良好的学风。我后来改本科生的试卷，感到其答题水平还远不及当时的专科生。

正因为当时校风、教风、学风好，所以师专 19 年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许多往届毕业生多年后见到我非常骄傲地跟我说，他们当地的许多重点高中校长、教学名师都是我们师专毕业的。据

我所知，永城一高原校长梁珍，柘城二高原校长付永清，睢县一高原校长刘广运，他们都是在省内很知名的高中校长；河南农大附中王子亮老师，商丘一高竟霞老师，是中原名师；商丘六中副校长陈侠老师，商丘回中马庆强老师，年龄不过 40 岁左右，都已是正高级职称；他们都是我们商丘师专中文系毕业的校友。洛阳师范学院副校长赵海彦，商丘师范学院原副校长程印学，还有我们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不少教师，都是我们师专中文系毕业的，他们后来又读了本科、硕士、博士，现在都成了知名的专家教授。当然还有不少师专校友，毕业后担任了地方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还有不少成为了著名的作家、记者、文化学者和企业家，这里不再一一罗列。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 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师专中文系教师队伍中走出很多名人

前面已经写到，我刚到师专时，中文专业有 11 位老教师，5 位 77 级新教师。之后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从 1982 年 7 月到 2000 年 5 月，先后到师专中文系工作的教师有：宋立民（1982）、马传卿（1982）、张来民（1983）、寿静心（1983）、孙宏亮（1983）、贾占平（1984）、殷莲英（1984）、贾庆阁（1984）、郭跃峰（1984）、耿占春（1985）、彭国栋（1985）、左怀建（1985）、胡继领（1986）、孙海芳（1986）、刘洪生（1986）、郭德民（1986）、杨剑（1986）、牛兴（1986）、刘殿显（1989）、乔俊杰（1989）、张凤刚（1989）、吕文凯（1990）、朱向群（1990）、庞可慧（1991）、何学军（1992）、魏少华（1993）、张清民（1993）、许锦云（1994）、乔广礼（1994）、李铁（1995）、刘培育（1995）、杨春风（1997）、周引莉（1997）、李艳丽（1998）、邹琨（1999）、宁智锋（1999）、吕少萱（1999）、张大红（1999）、谢书民（2000）。前后在商丘师专中文系工作过的教师大约有 54 人，这其中有不少教师先后调出，师专中文系教师最多时也没有超

过 25 人。



在师专中文系任职过的教师中，后来有不少成为国内名人。

耿占春老师在师专中文系工作时间最短，1985 年从商丘县调入，1986 年即调入河南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他的名气却最大。他是全国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等。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

张来民老师在师专中文系工作时间也不长，1983 年从河南大学毕业分到师专来，1986 年即考入河南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不久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中国教育报社编辑记者，中国改革报社副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副社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兼线装书局副总经理、副总编辑、中国出版年鉴社社长、执行主编，中国企业报社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中国企业新闻网创始人、首任董事长，现为美国美中时报总编辑。他是我国出版界和报界一大名人。

寿静心老师 1995 年调入中华女子学院，后任该校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教授，2006 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迷旒花园》《活着，为自己快乐》《大家小事》《大沙河畔》等，成为一名著名小说家。

王树林老师在师专中文系工作时已是著名教授，商丘文史研究专家，在侯方域文集整理研究方

面卓有建树，曾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师专校长助理兼图书馆馆长。2001 年调入南通大学文学院工作，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其《侯方域全集校笺》（全三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他可称得上是全国最著名的侯方域研究专家。

宋立民老师在师专工作时已是远近闻名的风流才子，他是一位天才演说家，其杂文写作、书法、乒乓球都堪称一绝，是最受学生追捧的明星教授。2002 年调入岭南师范学院工作，任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学报主编。其杂文《清明祭》获全国“我最喜欢的 20 篇杂文”奖，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杂文百年经典》。

张清民老师 1999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不久调入河南大学文学院，现任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2 项，学术专著有《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与秩序——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形态研究》《艺术解释的向度》等，其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发表在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张清民是商丘师专中文系 1987 届毕业生，也是后来师专教师队伍中学习最勤奋、研究成果最丰硕的著名学者。

魏少华老师 2006 年任商丘师院新闻系副主任，2011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调入上海体育学院工作，现任该校传媒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交媒体话题功能及其热点话题扩散研究”，著作《社交媒体“话题”功能研究：基于对话理论的视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魏少华教授可以称得上是国内体育新闻界一位很有灵气的学术才女。

当然在商丘师专中文系工作过的这 50 多位教师，个个都很优秀，都是我的亲密同事，他们各优

其优，各美其美，特别是有不少教师虽然取得了教授职称、博士学位，仍然坚守岗位，努力奉献，更是令人敬佩。他们都是我心目中最敬爱的名人。

#### 4. 感谢师专给了我成长发展的平台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上好课。感谢师专良好的教风、学风滋养了我，让我日日与良师相伴，耳濡目染，自然能够收获成长，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老教师和新同事的影响和帮助。其次要感谢师专为我提供了传播知识的讲堂，感谢同学们听课时关注的目光、激动的表情、愉快的互动和鼓励的掌声，正是课堂上学生们的鼓励，让我很快站稳了讲台，能够经常享受传道授业解惑的幸福和教书育人的光荣。

作为高校教师还要做好学问，成为一个研究学术的人。这方面我首先要感谢师专为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师专19年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师专图书馆虽然藏书不多，但四库全书，二十六史，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国内主要的学术期刊，已足以滋养我的心灵，扶持我走向学术之路。感谢样本书库和教师阅览室的王敬敏、刘大伦、李东林等老师，他们对我格外开恩，允许我借阅各种图书资料，甚至有时把我锁在书库里。

感谢师专从1985年起办了一本学报，让我的文章不断变成铅字，这对我的激励作用怎是一个“大”字了得。学报的文科编辑从李正华老师、郝蜀山老师，到赵长征、徐志辉、郭德民、高建立等老朋友，都成了我最亲近的人。师专时写学术文章的人并不多，所以学报允许我每年发表两篇论文，我从来都没有中断过。文章水平虽然很低，但经常练习，总会不断提高。

感谢李正华老师和王树林老同学对我学术上的帮助。李正华老师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老教师，曾任图书馆馆长和学报编辑，对我特别关心照顾。他退休后因住处相近经常找我聊天，经常向我提供地方文史资料，有时还要求我与他合作撰写文章。树林是我的老同学，他是商丘本地人，熟悉商丘文史，

特别是对侯方域研究搞得有声有色。受李正华老师和王树林老同学的影响，让我逐渐爱上了地方文史，逐渐找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于是陆续写了几十篇有关商丘古代文学和历史文化的研究论文。

感谢赵德润校长给了我第一次参与编写教材的机会。1988年，中南5省教委组织编写师专中国古代文学教材，每省派两位专家参与编写，我校副校长赵德润副教授应邀参与。赵校长工作忙，就委托我去参加，当时我才33岁，还是青年讲师，既受宠若惊又勉为其难，两次赴湖南参加编务会议，分工撰写第二编秦汉文学。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编写高校教材，给我以后编写教材提供了经验。该教材1989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感谢师专党委组织部王鹤廷老师在1990年推荐我给商丘地委老干部大学讲课的机会。当时地委组织部要我为老干部大学讲孔子和孟子，正是这次讲课，让我认真阅读了匡亚明主编的《孔子评传》，了解了孔子乃宋国后裔的史实，因而撰写了《孔子祖籍在商丘》的一篇短文，发表在《中州今古》杂志上，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1月2日第八版全文转载，从而引发了商丘学界对孔子祖籍文化研究的热潮。

感谢师专世行贷款办公室给我机会，让我于1996年成功申报了原国家教委下达的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师专中文专业趣味教学研究”，这是我第一次承担省部级研究课题，并获得2000美元资助，帮助我发表了不少论文。

感谢师专科研处为我提供平台，让我在1999年成功申报了一项全国高校古委会2000年度直接资助项目《潘黄门集校注》，让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得以在中州古籍出版社顺利出版。

感谢师专校系领导以及同事们的推荐，让我在1992年顺利晋升副教授，1997年顺利晋升教授，1999年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被商丘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商丘市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没有师专这个平台，我的这

一段人生之路怎能走得如此顺畅？



2000年元月，中文系老主任李明若老师光荣

退休，师专党委任命我为中文系主任。我和胡继领书记，以及左怀建、彭国栋副主任，和谐共事，顺利完成了中文专业首批升本的光荣使命。

回眸往事，难忘师专，感恩师专，师专19年永远在我心间。

作者简介：王增文，教授，原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 光影流年：我的大学生活

□ 韦举强

今年母校举办了第十一届“十佳应天学子”的颁奖典礼，学校团委发来信息请我录制一段云祝福视频，作为首届“十佳应天学子”，感慨万千。

时光如梭，看着镜中已过而立的自己，惊觉大学毕业已九个春秋，而商师四年的欢笑哀愁，恍若眼前。回忆如同涟漪，从毕业前那段日子，一圈一圈荡漾开去……

### （一）结缘商师

很多人好奇我为什么从遥远的广西来到商丘读书，为什么会坐30多个小时火车来到这个不算发达的城市求学。我常用家乡的土语回答他们说是“命带的”。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当身边的同学大多已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还在老家弄居屯的柚子树下劈柴，因为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心里充满了焦虑、懊丧和不安，别的同学在县城等待录取结果的时候，我选择了回老家，



把时间消磨在力所能及的农活上。

那是个炎热的下午，柚子树下还剩最后几根没有劈的柴，我早已满头大汗，正要转身回家喝点水时，家里的电话响起，拎起听筒凑到耳边，村里的信号不是很稳定。

“举强，……读吗？”

我听出来是在首府工作的叔叔的声音：“叔叔，这次考得不是很好。”

“我是问你，预科班你愿不愿意去读？在河南。”

“河南……额……。”我当时很犹豫，觉得好远。

“过长江，跨黄河，上少数民族预科班，本科！”

我顿时打起精神来：“哇，本科啊！好呀，好呀！”

“赶紧回县城，登陆志愿填报系统尝试报一报河南商丘师范学院的少数民族预科班……”

来到县城，我把爷爷那本厚厚的全国城市交通地图拿出来，通过检索页码找到河南省部分，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商丘这个城市的轮廓。城市不大，但却是五省通衢，交通发达，然后，通过百度搜索，我又了解到这个曾叫做“归德”的地方有着古城墙，还是《桃花扇》男主角侯方域故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这个遥远的古城，燃起了无限向往。



经过在河南师范大学一年预科班的学习，2009年8月，乘着南宁至青岛的绿皮列车，历经30多个小时，我终于在商丘南站下了车，即将开启我在商丘师范学院四个春秋的求学、求知、求发展的大学生活。是的，那个初秋，我身着短袖短裤，穿着白色回力帆布鞋，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两个学姐把我引到文学院（那时文学院和历史学院尚未合并）的报名点，在行政楼前的梧桐树下，我按次序把所有入学手续依次办完。从此，开始了我最美好的黄金时代。

### （二）球队历练

办入学手续的时候有件事是比较难忘的，且对我的大学生活影响甚大：在我领过宿舍钥匙准备后，有个高高瘦瘦的学长走到我身边问了我是不是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我说是的，比较喜欢打篮球。我还反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看到我的小腿比较细，弹跳力应该不错，还让我记得关注院里篮球队的新队员选拔通知，他会收我进队训练。



我是小学五年级开始接触篮球的。自从会打篮球，我几乎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和班里的男生打到天黑才回家；初中的时候曾跟班里的男生组建成队；高中学习虽然紧张，但是也总是在每周日中午放学之后顾不上吃饭就拿着篮球到球场与别的班级打比赛……总之，那时候篮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刚入学就因篮球被学长选中，我倍感高兴，像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就这样，刚进大学不久，我就参加了文学院篮球队的训练，在自信和期待中揭开了大学历程的第一个篇章。

在队里，教练的安排就是“圣旨”，我绝对服从教练的安排，比如教练安排早上五点半到球场热身，练习投篮等，不管天气如何恶劣（雨雪天除外），我都会按时到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那些不守纪律的队员起到一个正面的表率作用。文学院三年篮球队生涯，我一直没成为主力，一直是场下为队友呐喊的那个人，总共上场时间不到半小时，但我却从不后悔，因为通过那三年的历练，我学会了坚持，也学会了支持他人、欣赏他人。

### （三）致敬“莫夕”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莫夕话剧社的那段日子，也是我极其难忘的人生经历。与莫夕话剧结缘，是因为2009年学校举办的校园剧大赛，莫夕话剧社准备排练一场与校园诚信相关的短剧参加比赛，正在大一新生中物色合适的演员，或许是因为我土里土气的外表符合剧中人物形象，于是，我被选中在剧中演一个贫苦的诚信的大学生。这场演出对我影响很大，诚信，也成为我在后来的大学生活中恪守的一个准则。



后来，话剧社的社长因为要集中精力考研，话剧社换届选举，我当选了新一任社长，我们一起排《西厢记·长亭送别》，一起到食堂给职工们演出哑剧拉赞助……一批社员在话剧社里丰富了自己的大学生生活。

如今，翻开以前的QQ日志，还能看到当年有一篇记录了当时莫夕话剧社剧目在学校周末文化广场活动之“梁园会”出演的前后过程，那时我已卸

任社长，但依然热心投入话剧社的每一场活动。

4月26号日志：

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很激动，我从化妆店一路跑回寝室，装好道具，又一路跑到行政楼的临时换装室。排练差不多一个月的，由我和王明辉根据电影剧本《桃花扇》改编而成的话剧《桃花扇》就要在文学院的周末文化广场之“梁园会”上演了。这是莫夕话剧社本学期的第一枪，我怎能不激动。

但是，但是，开场舞刚开跳的时候，豆大的雨滴竟然在这个时候光顾商丘师院！场面没有变得混乱，有跑去躲雨的，有回寝室拿伞的，有披盖音响设备的……一切有条不紊。商量对策后，我们决定继续演出：

向冒雨演出的《庄子》剧组致敬！

向冒雨工作的、演出的各位同仁致敬！

值得庆幸的是，《桃花扇》演出的时候雨停下了，但是风很大，也向我们的剧组致敬！

### （四）社团实践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令自己变得成熟与稳重的，还有在商丘师范学院学生会历练的那三年。

从在校内抬音箱举办周末舞会，到外出走进门店拉赞助；从爬树挂好横幅，到撰写方案举办晚会；从为福利院孤儿募捐，到走进养老院和老人谈心；从准备下乡物资，到志愿服务乡村……我和学生会的成员们齐心协力在各种活动中成长。

2012年11月5日，终于要与学生会告别了，我在QQ空间里发了一条说说，以此纪念在学生会三年：

真恨自己没在今天学生会新老干部联谊会上哭，搞得现在还没睡着，可能那时候哭出来了感情就可以更好地宣泄了吧。退了，因为我已经没有另外可以再为之付出的三年了。在学生会获得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坚持，责任心，自信，良师益友……

### （五）师恩难忘

虽然大学那会儿我并没有意识到学习专业知识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但现在我发现，凡是我印象深刻的那些科目，以及我多次请教的那些老师，对我

后来的从教生涯都影响至巨。

王少栋老师是我们的写作课老师。记得第一次上他的写作课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就给在广西的朋友打电话说：“我们的写作课老师很搞笑，他会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他说他当过和尚……他还要给我们传授写作的终极秘籍。”朋友在那头笑个不停。

我也曾经给我班上的学生讲过王老师教我们写作的故事：“课前，王老师会抽查上次课给我们留的写作任务，然后会请别的学生念，他一边听就一边点评。”

“他好厉害，还可以直接点评的！”班里的一个学生眨着眼睛赞叹。

“知道最让我们的激动的是哪个环节吗？”当时我们脑海已经再次浮现在组团楼上写作课的情景来，“其实最让我们激动是他随机抽查的那个时候，大家既期待被他抽中，又担心自己写得不好，心情十分复杂。”

后来，我还告诉我们班的学生说，其实，上写作课的那个几个学期，班里每个人的文章都在班里分享点评过。学生们听后，似乎都知道我要怎么上他们的习作课了。

对外汉语班的同学一直和我们汉语言文学班的同学争宠，总是要和我们“抢”李瑞华老师，各自都认为自己是李老师最偏爱的学生。毕业前的那段日子，李瑞华老师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合影对象，就像她的现代文学课一样。

李老师总能从细微处看到我们的闪光点，适当鼓励和肯定，很多场景我都如在眼前，或许，就是那些简单的对话交流，那些看似不经意间的夸奖，让我后来总能以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

毕业这么多年，我一直关注她的QQ空间，她发的每条说说、每篇文章、每张图片，以及空间里的每条评论和点赞，我都细细品味，也逐渐明白，并非我们这届学生才认为自己是李老师的得意门生，原来有那么多校友都有同感，毕竟如果浑浑噩噩不求上进，应该是不好意思在老师面前抛头露面

的吧。

师恩难忘，可惜无法一一回忆和诉说。

### （六）流年光影

毕业的学子们大概都会记得宿舍区24号楼与25号楼间的那过道边上，每年四月盛开的一树一树的樱花，樱花不艳却香，也只是淡淡的香，但我却很喜欢这样的香，也喜欢这样的花。



几个刚下课的高个男生走在樱花树下，结群的几个女生跟在后边，看见男生伸手摘花的姿势，一个甜美的声音喊道：“帮我摘几枝花吧？”男生畅快回答：“好！我把整棵樱花树都送给你！”然后就笑着跑远了。

我骑着单车，很快超过他们，在想，接下来不知道会怎么样，或许他们后来成为情侣了？

再见我的商师，愿我亲爱的母校，如我视频里所说的那样：光泽桃李，志明高远，满园芬芳。

作者简介：韦举强，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3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现在广西南宁市凤翔路小学任科研室主任，一级教师。

## ● 文学沙龙 ●

※

## 荷兰国家档案馆的中国记忆

## ——荷兰随笔之一

□ 易彬

一

荷兰国家档案馆(Nationaal Archief of the Netherlands)位于海牙市威廉·亚历山大霍夫王子街(Prins Willem Alexanderhof)20号,位置非常方便,紧挨着海牙中央车站。

平日里,我们根本就没有从“档案馆”的角度去打量它——“档案”这个词实在是太过正式、严肃。其网络主页宣称:荷兰国家档案馆是荷兰的“国家记忆”,藏有来自中央政府和重要组织、人士的文件、照片和地图,数量多达125千米(kilometre)。不知何以用这个量词——这是2017年的数据,最新数据又有增加,且分类更明确,为137公里的文件、1500万张照片、近30万幅历史地图和绘图以及800兆字节的数字文件。我们当时没想过要去查阅或利用其中的档案,不过就是经常从它的门口走过,而它又适用于博物馆年卡,可以随时参观。荷兰遍地都是博物馆,很多都是在原有的老建筑上兴建的,而这里看起来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现代博物馆,和它相连的建筑里边,还有一家图书馆和一家博物馆。

档案馆的参观空间大致可分为两大块,在前台办好手续之后,从右侧进入,可以看到一个显得有些空旷的大厅——其实也不是空间有多大,而是现场观众够少。有成排的书架,上面照例摆满了各种图书。

通过右侧大厅的电脑进入荷兰国家档案馆的官

方网页,可以看到档案、照片、地图、索引等栏目。前两者可供查阅的内容数量非常庞大,分别达到了500多万和近百万,后两者的数量较少。以“China”、“Chinese”为主题词,也可以检索出比较多的信



息,而且,每一个文件都有简要的说明,便于认知。

打开照片检索网页,当时分别可得到3982个、2755个结果,不过因主题词意思相近,照片有一定的重合——最新数据分别为3146、2588个,不知何故减少了。其中有大量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照片,将领(未见国家领袖,也少有高级将领)、士兵、俘虏、民众(难民)以及相关外国人员、战场、刑场、医院等,各种形态的都有。新中国的、特别是1960-1970年代的照片也有不少,这里出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其他各时段的照片就显得有些零散了,其中有些可明确辨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大使馆的主体建筑、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在一位中国女子的帮助下阅读《金山时报》



(1931)等。哈罗德·劳埃德是美国喜剧电影明星，当年与查理·卓别林齐名，他的喜剧电影在1920年代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更多的是无名者，比如变形的脚（一双因缠足而极度变形的脚部特写），未署姓名的古代汉语教师的肖像（1934）等。拍摄者也是无名人士。

档案、地图、索引等栏目在2017年的时候都未检索过。这次打开档案检索网页，可分别得到4744和1761个结果，其中有荷兰驻华大使馆档案清单（北京、重庆、南京，1872-1954）、荷兰驻华使馆档案清单（1955-1974）、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档案清单（1877-1951）、荷兰驻天津领事馆档案清单（1899-1951）等。其中，“驻华大使馆的档案包含1872-1954年期间与该组织有关的信件和文件。还有关于义和团、国际定居点和法院、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事务的文章；关于中国血统的荷兰国民、条约和（海关）协议、中国的水利工程和港口工程、铁路、航运和航空以及鸦片问题的文件；关于招募劳工和其他印中事务的文件（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总调查局的月度报告）、印度支那和远东地区的政治事务以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文件（包括关于日本战争罪行）；一份关于德国（和奥匈帝国）宣传的档案、一份秘密档案、文件（包括一些地图）和存放在重庆的军事武官的档案。”

打开地图网页，相关信息就比较少了，分别只有17和1个结果，且非直接关联。不过，前者之中有两种为印刷物，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航海官绘制，旨在展示东印度群岛的海岸、岛屿、港口以及气候、航行方式等方面的情况，两者都超过了150页，足可见当初工作的细致、翔实。随后在左侧大厅，看到了大量的厚册地图。荷兰曾经是海上霸主，地图的批量出现显然与此有关。其中的一些册页上面也有中国的身影，比如，标识为东印度群岛、按照1:2500000的比例绘制而成的地图上，左上端的大片区域为中国南海（ZUID CHINEESCHE ZEE）。

打开索引网页，数据分别是25和16组，每组里边还有次一级目录，少则1个，多则将近七千个，足可见信息量之大。不过，观其内容，跟中国关联

度更紧密的似只有“苏里南：来自中国的契约工人（1853-1930）”，内有2017个华工的信息——每一个名字之下，有抵达年份、抵达前的家庭详细信息、出生国家、性别、年龄、宗教、编号、出发日期、出发地点、抵达日期、抵达地点、合同代码、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种植园、种植者（雇主）等信息。苏里南如今是南美洲最小的国家，旧称荷属圭亚那，即荷兰在南美洲的殖民遗迹。1853年，第一批18位华人以契约劳工的形式从荷属爪哇岛出发前往荷属圭亚那。不过，尽管有契约在身（年限一般在10-20年），华人劳工的权益还是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资料显示，1880年代，中国驻外使馆“多次向清廷报告海外所传苏里南虐待华工的消息，于是总理衙门命令中国驻美使馆派人赴苏里南调查”，后确也进行了调查，但据说是草草了事，并未深入进行，相关说法又不一致，且“苏里南地方偏僻，远离中国”，政府在拒绝荷兰方面的招工要求之后，“再也没有过问远在苏里南的华工”。而当时外交官的文字如张荫桓的《三洲日记》，虽也偶有记载（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刘文龙、赵长华、黄洋撰：《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第10典：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1-264页），但信息量很有限。以此来看，荷兰国家档案馆所藏文献，能为了解当年的华人移民历史提供更多、更确切的指引。实际上，其效应已经彰显——已有学者参考该馆的索引文献，将上述1858-1878间被招募去荷属圭亚那的2017名华工的信息整理为“苏里南契约华工名录”，并称苏里南国家档案馆有契约华工的详细档案，且苏里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手相关公司，“正在着手建立契约华工资料数据库”（徐晓东编译：《荷兰文苏里南粤籍华侨史料编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已是一个引起较多关注的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煌煌巨著《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中国与世界格局发展的大框架”，其中多次论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英属圭亚那（今圭亚

那，华人移民至此的时间稍早，但也是在1853年的情形，荷属圭亚那似未进入其视野，可见此段历史的微渺。

再回到档案馆。大厅尽头朝左，有一条摆放着厚册书籍的走道。书册厚达数十厘米，一般是竖行整齐摆放的，从书脊上所标记的年份看，是18世纪的物品。也有几种是平摊开的，可以看到里边像印刷体一样的手写体文字。如此厚度的书册，在其他的荷兰博物馆里经常也可以看到。有一两次，还赶上其他的博物馆在卖旧书，看上去有几百年的历史的书，大小不一，几十到一百欧元不等。

穿过这条走道，可以达到另一个主题空间。

## 二

荷兰很多博物馆在不同时段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展出。2016年下半年我们抵达荷兰的时候，荷兰国家档案馆那个主题空间的展览主题是照片——荷兰和其他国家的摄影家在世界各地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在荷兰印制出版的相关图册。

有一处展出了一艘在中国的某条河流上行进的小船只，近景是几位士兵和抽着长烟杆的艄公，背景是陡峭的悬崖。旁边的展板列出了在华殉职的荷兰水利专家蒲得利·弗朗西斯（François Bourdrez, 1901-1939）的信息。据荷兰驻华大使馆以及相关的报道，“1930年前后，当时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发起一项方案，派遣技术专家到中国工作，以协助新的南京国民政府改善中国的生活条件。他们派遣了不同领域的外国专家，如农业、卫生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水利强国荷兰派遣了当时32岁的水利专家蒲得利担任联合国对中国政府的特别顾问，于1933年来到中国。“1939年5月11日，蒲得利乘坐的勘测船被卷入急流，撞上水下的岩石，蒲得利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瞬间就被水卷走，不幸遇难。蒲得利的遗体于几星期后在140公里之外的小村庄中被找到，从死者身上一个编号为72的中国交通部徽章，和左手上的结婚戒指，人们才得以确认他的身份。”“1939年6月24日，云南各界人士为蒲得利先生举行追悼会，龙云主持追悼会并首先致辞。”龙云是当时的云南省主席。2015年，蒲得利的后人“应邀前往中国，

参加在南京水科院的特别纪念仪式”（据荷乐网，2015年5月28日）。

有一个展台并放着一本名为《中国人民》（*China Populaire*, 1963）的书的封面和一页英文打印稿。前者为法文，作者Alain LE GUEN暂检索不到。后者为英文，不知是否即前书的内容，其中写到：“我已经到达北京机场。我是来看看、闻闻和拍照的，如果可能的话，也是来了解这个新中国的。我们知道它对我们和整个世界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一个胜利、悲剧和失败的奇怪混合。我们读过关于灾难、歉收和饥饿、人民公社失败、大跃进的报道。然而，这个中国现在觉得已强大到足以挑战其老大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会不会是哪里出错了？中国是已经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了，还是高估了自己？”

有一个展板的信息题为“竹幕背后：摄影师在中国”。这里使用了“竹幕”（Bamboo Curtain）这样一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名词，其中写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封闭和难以进入的国家，由于审查制度，外国记者的旅行和工作非常困难。那些被允许去中国旅行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贫穷或饥饿，没有失业或盗窃的国家，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愿意维护的形象。然而，尽管存在种种限制，摄影师还是试图尽可能多地捕捉平凡的生活。”有三位摄影家到达新中国的年份和信息被明确标记。

第一位不是来自荷兰，而是来自法国的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1958年，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和蒙古，同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动了名为大跃进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列松“想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和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活动来记录新中国。”所展出的照片有北京十三陵水库堤坝的修建，相关说明文字又涉及蒲得利，“早在1930年代，荷兰工程师就中国如何应对干旱和洪水问题提出了建议”，如今，十三陵水库“将在五个月内完工”。这张照片标注选自“大跃进”系列（*serie The Great Leap Forward*），同一系列的还有煤工

厂（福州）、英国货船在上海港（上海）等。其他的照片则还有公园里的游客（上海），途中的恶劣天气（江上的一艘工作船被拖到安全的地方，北京）、大字报（一位成人在贴满大字报的围墙下行走，大字报的内容多是抗议英国入侵约旦，围墙上端是“英国军队从约旦滚出去”的字样），等等。

第二位是奥托·范·诺本（Otto van Noppen, 1924-2014），1963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他与一小群西方记者一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旅行。“范·诺本是第一位报道毛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荷兰摄影家。他在旅途中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回国之后，他的报道引起了荷兰和其他国家的极大兴趣。”看起来，这些外国记者在三周的旅行中到达了中国的不少省市，所展出的照片有街边的书摊（一个穿裙子女孩从街边书摊和埋头看书的读者面前走过，上海）、长城的门楼（北京居庸关）、人民公社中的小型工厂（杭州）、滑轮溜冰场（南京），等等。

第三位为道夫·杜桑（Dolf Toussaint, 1924-），他到上海已是30年之后，1992-1993年间（从所展示的护照看，确切的时间为1993年6月6日至26日），基于激进的城市更新和改造项目的背景，一次在鹿特丹执行任务之后，道夫·杜桑前往上海，“他感觉他所看到的很快就会消失。”“与之前中国报道的不同之处显而易见。看起来，他少了一些限制，能更好地与人们接触。杜桑向我们展示了比范·诺本或卡蒂埃-布列松更为个人化的中国形象。”实际展出的是多是无名的人物、日常的画面，比如街边剃头的人群、摆着成堆蔬菜的摊位（辣椒、姜、蒜等）和在下面睡觉的男人、弹棉花的人和两个小孩、修高架桥的工人们，等等。

布列松1948年第一次来中国，“在近一年时间里，除了拍摄了北平和平解放、上海金融风暴等巨变时刻之外”，“还将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平民百姓”。随后，结集为《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法文版，1954；英文版，1956），共有114幅照片。1958年6月中旬，布列松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等，并向中国的摄影同行专题介绍了自己的摄影理念”，所拍摄的一批作品以“走

进新中国”为题，刊载在1959年1月的美国《生活》杂志（赵刚：《世界摄影美学简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101页）。相较而言，后两位摄影师在中国并不知名，很难查到相关中文信息。也因为这个缘故，也无从确定1963年与范·诺本一起来中国的“一小群西方记者”之中，是否有《中国人民》一书的作者。

不过，对比范·诺本和道夫·杜桑的照片，可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前者多是背影、侧影，标识着摄影者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亦或是未经打扰的拍摄状态（很可能是偷拍），人物与镜头缺乏交流——也可能对镜头并不友好，有一张为三位女子在机器前工作（流水线工作？）的照片，正对着镜头的那位女子圆瞪着眼睛，看上去紧张，也不欢迎陌生的拍摄者。女孩背后的墙上，是一幅武松打虎图，两者似乎有着微妙的应和。后者多有正面的镜头，人物在注视着镜头，巷子里的大爷镜头感十足，朝着镜头打招呼，挥手、开口大笑；蔬菜摊前有三位姿态各异的年轻男子，举着冰棍的，吃着什么的（烧饼？），捋起背心但什么也没干的，都朝着镜头微笑（也许，是在谈论那个大白天在菜摊下睡觉的、穿着白色衬衣的男子，一个好笑的话题？），唯有右侧远端坐在“修理电动剃须刀”招牌下、手里夹着烟的大爷一幅落寞的表情；在高架桥下面挖坑的工人们，近端的四位，有一位继续挥起铁锹，其他三位撑着工具停在那里，或侧立着望向前方，或微低着头抽烟，或微笑着摆好姿势，都在等待着按下镜头的时刻。看上去，这些新时代的中国人在国外镜头面前很放松，又或者摄影者与人物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让那些生活或工作中的瞬间以鲜活的态度呈现出来。这样的比较明显的差异，大抵也即时代变化的表征吧。

这些照片让我想起前些年的一项巨大的照片工程：两万多张中缅印战场照片，被章东磐等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以《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名义出版两册（2010，2012），一时之间引起热议。

当年中缅印战场影像，由盟军照相兵所拍摄，仅有极少数曾经公之于众，绝大多数则是自1946

年被归档之后，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堆积如山。而归档于荷兰国家档案馆的和现场展示的中国影像，绝大部分应该也没有在中国国内公布过，其数量没有那么庞大，但终归也会有国家记忆、时代鳞爪与人生故事，等待谁去发掘。

### 三

原先照片展的空间，后来一次的展出主题是“探索 VOC 的世界”，下设三个专题：“No Business, Without Battle”“Geen Speculaas, Zonder Speculeren”以及“No Delf, Without China”。展出时间是从2017年2月24日至2018年1月7日。矗立在门口的大幅海报上的“China”字眼和青花瓷瓶，又一次吸引我们进入荷兰国家档案馆。

VOC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为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英文为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简称，1602-1798 年间，统治印度洋达两个世纪。展览主题看起来有点拗口，大致说的是因为战争、贸易以及其他因素，两种对象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性。以“*No Delf, Without China*”为例，“China”的字面意思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则是陶瓷。代尔夫特当年是 VOC 在荷兰的 6 个据点之一，由中国进口的瓷器广受欢迎，一时之间，代尔夫特兴建了大批陶瓷工厂，始建于 1653 年的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是至今仅存的一家。工厂所出产的一种蓝白相间的彩釉瓷器，仿照中国的青花瓷，不仅深受皇室喜爱，风行欧洲，也给了很多艺术家以灵感，来自于代尔夫特的荷兰最伟大的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非常喜爱它，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运用了代尔夫特蓝（Delfts Blauw）。因此，没有“China”，就没有代尔夫特，更不会有今天的这番模样。如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是有名的旅游景点，荷兰很多商店和场所也都有“中国蓝”的身影。

展品中，第 203 号名为“被茶叶保护的瓷器”，来自于大约 1750 年的戈德马森（Geldermalsen）号沉船，“尽管这件骨瓷（bone china）沉入海底已经两百多年，但它仍然完好无损。戈德马森号这艘失事船上的易碎瓷器怎么可能还几乎完好无损？”

这是因为茶的缘故。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在瓷器上覆盖了一层保护层，从而保存了釉面。”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戈德马森号的沉船故事早已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叙及海上丝绸之路时一再被提起，据称，“1752 年（乾隆十七年）冬，装载着 23.9 万件瓷器、68.7 万磅茶叶、147 件金条或金元宝及一些纺织品、漆器、苏木、沉香木驶离中国前往阿姆斯特丹，16 天后在中国南海区域触礁沉没”。1984 年，这艘沉船被打捞出水（杨桂梅、张润平：《中国瓷器简明读本》，新华出版社 2016 版，第 202-203 页）。1986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进行了拍卖，获利颇丰，但戈德马森号被毁坏的行为也引起争议（参见 [英] 理查德·A. 古尔德主编：《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张威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1-263 页）。

“China”既是主题之一，其他的展品自然也有不少与中国相关的。这里略选几种说明下。比如第 186 号为“与郑芝龙的合约”（1630）。说明文字为：“中国海军将领郑芝龙设法获得了对荷兰的贸易垄断。只有他可以代表中国皇帝与 VOC 进行交易。在这份合约中，他同意 VOC 的台湾长官汉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用丝绸换取胡椒粉。”郑芝龙（1604-1661，精通日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为郑成功（1624-1662）之父，父子俩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抗荷英雄。第 187 号展品也与此相关，题为“坚不可摧的城堡？”内容为：“热兰遮堡（Fort Zeelandia）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它位于海湾的入口处，位置优越，隐蔽。然而，VOC 还是在郑成功指挥的压倒性军事力量围攻数月之后失守。1662 年热兰遮堡的陷落标志着 VOC 对台湾统治的最终结束。”或可一提的是，这两处文字中还保留了一些特定的称谓，比如，称郑成功为“Coxinga”，称台湾为“Formosa”，等等。

第 197 号名为“愿望清单”：“每一年，the Heren Zeventien 都会起草一份‘要求’，一份他们希望在下一年的贸易中从中国获得的货物清单。1755 年，他们特别希望拥有丝绸和其他纺织品。52 种颜色样品表明了所需要的颜色和图案。”所展示的图片为“1755 年 10 月 16 日中国丝绸和其他织物

的颜色样本”。

第199号也跟贸易相关，名为“一个贸易代表团”：“VOC试图通过派遣代表团在中国南部沿海建立贸易联系。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执行了一些贸易任务，并撰写了一份关于航行和中国北京宫廷的综合报告。他所描述的不仅是‘使馆的成就’，还有‘旅途中发生的所有好奇和值得讲述的事情’。此外，他的书中收录了150多幅‘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中国带来’的绘画作品。尼霍夫的书实际上是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约翰·尼霍夫是一位在中荷——实际上，完全也可以说是在中外文化史上有特别的重要意义的人物，所展示的图片即出自约翰·尼霍夫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臣朝见鞑靼大汗——当代中国的皇帝》（阿姆斯特丹，1693）一书。资料记载，旅行家约翰·尼霍夫（1618-1672）“于1655年至1657年间参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的使团。使团行由广州登陆，经江西、南京后沿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朝见了顺治皇帝，后获得赏赐返回。约翰·尼霍夫是使团管事，对使团沿途的见闻做了详细的记录，还画下了大量的人物和风景素描，这是关于当时中国情况的非常有价值的材料。1658年夏，约翰·尼霍夫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份带有插图的报告交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局。1665年，约翰·尼霍夫的哥哥亨利·尼霍夫根据弟弟托付给他的材料，再加上一些取自于其他作者的文字，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臣朝见鞑靼大汗——当代中国的皇帝》（又名《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本书为荷兰文，被学者公认为是欧洲17世纪关于中国最重要的和可靠的知识来源之一，在欧洲风靡一时。本书将中国疆域图、鸟瞰图、各种物产图片、写意文字图示以及顺治皇帝像和城市的写生图等以铜版画的形式反馈回欧洲。1666年德文版出版，1668年拉丁文版出版，1669年英文版出版。”（葛桂录：《中英文学交流系年·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页。）而这本书的插画所绘制的中国形象也是一个别有意味的话题。约翰·尼霍夫笔下的建筑、物件还大致符合中国的实际，但人物形象与中国人就相差比较大，不熟悉背景的人或许很难看出

它来自中国。而竖着一根辫子的发型、留着两撮小胡子的男人等造型在日后很长时间内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而日后在那些痴迷中国风、又对古老的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艺术家笔下，更是充斥着与实际中国大相径庭的形象。如今，在荷兰以及欧陆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也会以中国风的名义展出类似的变异风格的绘画、瓷器画、壁毯等艺术品和装饰品，既让你觉得熟悉，又觉得陌生、魔幻。

#### 四

展厅里的各种巨型书册则让我想起2011年荷兰的第一部3D电影《新地岛》（Nova Zembla）。到荷兰之前，看过的荷兰电影不多，印象深的似乎只有《黑皮书》（Black Book）。在荷兰生活期间，在网上看了N多部荷兰电影，《新地岛》之外，印象深的还有《乌鸦男孩》（Kauwboy），在荷兰，乌鸦并非不吉祥的鸟，在草地上，经常可以看到它。

《新地岛》是根据十六世纪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 1550-1597）最后一次远航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电影展现的不是新航线或者新大陆的成功发现，而是一次失败的探险经历，探险队的船只在北冰洋撞上冰山、受困于新地岛，而不得不与酷寒和北极熊相搏斗，这成就了欧洲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欧洲人第一次在北极过冬。有意味的是，航海家巴伦支在电影中并非第一主角，他让位于一个没有任何航海经验的文弱小子格瑞特（Gerrit de Veer），他铤而走险不过是想借此出名发财，并得到议会元老的女儿——来自荷兰的维密超模杜晨·科洛斯（Doutzen Kroes）饰演的这个角色占据了当时娱乐新闻的头条，这也是她首次出演电影。格瑞特的全部本领就是识字、记日记、编故事，这在电影中是引起过嘲笑、争议和敌意的行为，但他最终成功了——不仅从航海灾难中活了过来，而且，他的航海日记也成为了畅销书。

电影是艺术化的表演，与史实终归是有差别的。展出中的书册的基本功能应该就是记录航海途中的各类事项。书册里的文字，所见多半都是手写体，也有部分是印刷体。航海一般都有数月乃至数年之久，书册的厚度和硬度是必须的——比照展出的实

物，电影中格瑞特的记事本和散页实在是显得太过单薄和轻浮。据说，巴伦支当年的航行不仅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沿途还绘制了准确的海图，这些都为后来的海上探险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春天的时候，巴伦支的航海船只终于又可以重新起航了，但他本人已经病入膏肓。临死之前，他写了3封信，一封藏在新地岛上越冬住房的烟囱里，另两封则分开交给同伴，以便有文字能存留于世。1597年6月20日，37岁的巴伦支死于一块漂浮的冰块。差不多两个多世纪之后，1871年，一个挪威航海家来到巴伦支当年越冬的地方，并且，从烟囱里找出了那封信。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北欧以北巴伦支航行过的部分海域称之为巴伦支海。诡异的是，这等故事在电影《新地岛》中居然全不见踪影——电影中的这种历史叙述的错位，不知是否也会影响到欧洲的观众？

从工作人员处领取一个阅读器，可以看到不同展品的介绍——荷兰博物馆一般都没有吵吵嚷嚷的现场导游，阅读器或解说耳机很重要，一般需要收费，5-10欧不等，不过，此处的阅读器是免费的。语种一般是荷兰语和英语，大型博物馆则有更多的语言种类，如荷兰国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就都有中文解说。使用阅读器或解说耳机，加之良好的现场秩序，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享有一个独立的、不太受干扰的观看空间。

不过，国家档案馆的这次展出，信息量足够大——阅读器上有两三百条介绍信息，反倒显得展出空间过于局促，晦暗的灯光之下，三大专题似乎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我们这些海外客有太多的历史底细无从察知，只能浮光掠影地看过去。

航海远征，主要目的自然是殖民和商业利益，但如展现图片所示，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瓷器自不待说，所展出的服装中，就有一件中国古代的戏服。当初出于科学的目的而精心绘制的动植物图像，如今看起来更像是艺术品。而有些记载则已成为历史的遗迹——展出的图片中有一只根据历史资料而重新构造的鸟，名叫渡渡（dodo），“渡渡鸟是第一种因为人类的干预而灭绝的动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对这种动物感兴趣的原因：我们只能从17世纪的故事和绘画中知道它的行为和的外观。

渡渡鸟最终在那个世纪末灭亡。”据说，已经灭绝的渡渡鸟原产于毛里求斯及邻近的岛屿，不会飞，也被比喻为笨蛋或落后于时代的、守旧的人。

也有不变的事物，比如有一处建筑的两张图片，时间跨度为几百年，河道变成了马路，但几百年下来，建筑还是原样，连窗户的样式都没有变化。这让我想起先前在海牙历史博物馆（Historical Museum）——距离荷兰国家档案馆不远处，荷兰国会大厦旁边的一幢宏伟的17世纪建筑——看到的一幅17世纪的油画，画中的国会大厦、水池、马路、远景中的建筑，跟今日的现实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有一种连堤边的绿树都没变过的错觉，只是行人的装束变了，马车换作了汽车。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看到这番似乎静止了的画面，不免心生感慨。

## 五

最末了，还想再说说荷兰博物馆的参与和陪伴。

荷兰的很多博物馆都为游客设置了聆听和参与的场所：会有专门的视频区域，重复播放展出的主题；也会有些设施，让观众参与体验展出的某些环节。比如在荷兰国家档案馆的“探索VOC的世界”的展出现场，即有两个带有VOC标志的木质长方体，可以进去体验船只在海上航行的感受。

这种一般性的参与可能平淡无奇，但也可能会有特别的体验——前一次，在参观完照片展之后，我家女儿看到走道里边一台红色机器上有操作盘和耳机，就自己动手操作了几次，没能成功。小姑娘当时八岁，对这些充满好奇。两位先后经过的工作人员停下来帮忙，反复调试，期间，他们还跟另一个同事通电话询问，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工作人员向小姑娘解释一番，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能成功，又欢迎她以后有时间再来。

我们又在馆内转了一会。就在小姑娘悻悻然在大厅翻完书、且准备离开之际，工作人员找到我们说，“It works now！”他们邀请小姑娘再去机器上试试，帮助她戴好装备——按照女儿的描述，画面里有音乐，有一个声音在解说，而她好像随着画面在飞动，最后飞到了一个满是照片和书的世界里……

在小姑娘操作体验的过程中，那位女工作人员先离开了，但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一直站在她的身后，直到全部的画面结束——直到他确定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要求，方才离去。

不仅仅是荷兰国家档案馆，在其他几家博物馆参与活动或者询问事项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感受，只是持续的过程没有如此之长而已。博物馆是人类历史与记忆的绝佳载体——借助旧物的陈列而通向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这种参与和陪伴无疑也将构成一种特殊的记忆存留在观众的心里。

而这，也是写下这篇博物馆记更为主要的理由。

2017年4月17日初作，2022年4月重写

作者简介：易彬，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等方面的研究。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为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

## 寺田老师

□ 陈言



寺田德子老师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国际交流中心教授日语。外国留学生一入学就要首先进行日语测试，然后根据听、读、写的成绩分班。测试的结果，我的读、写成绩是优，听最差，并且后来我的日语水平一直遵循着这样的结构。寺田老师把我安排在

阅读的高级班，上第一节课时，我就傻眼了，听不懂，也看不懂。第一节课的小测验，我稀里糊涂地交了卷。我下课后就告诉她自己跟不上。她说，努力一下，你就能赶上来。从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测验成绩总是在D上徘徊。接下来，在不能一口吃成胖子、看不懂或者听不懂一天天里，我就望着窗外的银杏。我是10月初入学，11月、12月是东大银杏最美的季节，东大的银杏美得如此有名，银杏也成了东大的校徽（黄蓝两片银杏叶平铺，两个半圆的叶柄构成一个圆）。我所在的教室的窗户正好对着东大那条最有名的银杏路。每每测试，我做完会的部分，就完全无视她的眼神，看着银杏会出神到忘记课堂的程度。她也并不生气，似乎是一副放弃我的样子。可是，每次批改作业，她都很认真，指出错在哪里，还会写鼓励的话。不知不觉间，小测验的成绩由D上升到了C。轮到作文课，她的批改更严苛：每篇作文返还到我的手里，满纸都是红笔。她要求学生按照她修改的再誊写一遍交上去。没想到过几天，她又会把誊写的作文拿过来，告诉我还有修改得不到位的地方，让我根据她的意见再誊写一遍。又过了些日子，她又把此前交上去的稿子拿到我面前，说，这个地方如果用这个词，是不是更表现力更强？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着。我的记忆中，一篇作文“折腾”最甚的，高达七次。在她的训练下，学生会感觉不进步、不努力有一种罪恶感。她尽力地修改每一篇作业，之后却很少听她评价某人的成绩好或是不好，她只在乎交流的过程。

她也并非那种跟学生有亲近感的老师，甚至有些冷酷无情。不少学生就因为她“冷”而不喜欢她。在我眼里，她只是不会用日常的语言、特别是日本人惯用的寒暄语言去跟学生交流。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不带有现代人维持体面的虚浮物，眼里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能使人动情的不实之辞都没有。学生到了她的办公室，一切该办的事情、该说的结束了，她旋即躲进自己的里屋，任凭来者还没有说谢谢、道别，就在那里尴尬地站着。而我所感兴趣的，就是她那能直落而下的透明而深邃的空间。

很奇怪我跟她通过眼神交流就能达到相互领会的程度。虽然对她我一向执弟子之礼，她对我却常

常是女人对女人的方式，有时我会稍感不适。有一次写的一篇作文发下来，我诚惶诚恐地看着那满纸的红字，等到看到后面的评语，我忍不住直想乐。评语说：“在脑海里描绘着陈桑的日本生活。如果哪一天能在陈桑的家里做客也是不错的事儿啊。”当时我为了节省上下学乘坐电车的时间，就在东大的池之端门对面租了公寓，房间又暗又小，白天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必须开灯，否则啥也看不见。直到离开东大，我都没有勇气邀请她到家里做客。每到过年，她都会邀请留学生到她家做客。一想起她，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她家书桌上摆放着的穿着和服吹笛子的照片，婉约、优雅，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做客那天趁她不注意用相机拍了下来。在我眼里，她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感情，不随俗而已。她不用手机，夏天不用空调，很少看电视，最大可能地过着接近原始的、自然的生活。但她的爱美之心一般女人难及，你可以听到她说“嗯，穿得很有女人味儿”，“很有情趣”。

有一天，我收到寺田老师的短信，说“旧古河庭园正办玫瑰展，再叫办公室的冈本，还有尼古拉（我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同学），周五一起吃午饭，然后去赏花，好吗？”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午饭的地点让人惊喜：在根津站旁边的一个巷子里，深蓝色的门帘上印着“根津之谷”，天花板是竹子做成的乐谱，桌椅是原木色，很少的客人或边看着书、边吃着饭，或在轻声交谈。桌子上写着：请不要使用手机，菜谱上全是糙米呀之类的自然食品。我一坐下来，由不得不淑女。寺田老师仔细讲解料理的名称，等大家吃得不剩下一滴米粒时，她迅速跑到款台结账。说，不按日本人的习惯，她请客。然而转过身，她却收下了冈本的那一份。

我们的目的地旧古河庭园是明治元勋陆奥宗光的宅邸，后来由成为古河财阀养子的宗光的次子继承，后来为国家所有。不过陆奥宗光时代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保存了。与东京的六义园、清澄庭园滨离宫恩赐庭园、旧芝离宫恩赐庭园相比，它的特点是日西合璧。我喜欢这种风格。纯粹的日本庭园乍看起来精致、内敛，很容易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但呆得久了，会觉得很压抑，而那原本妍丽都会失

去色彩。那西洋的建筑则显得飘逸、灵动，让我们想到天，想到遥远的彼岸。寺田老师说它的设计者、英国人约翰·昆德鲁博士在日本的作品还有旧岩崎邸庭园洋馆、鹿鸣馆等。她还说鹿鸣馆跟日本近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以此来观察近代日本西化的问题，可以有很大的讨论空间。那个季节的游客是冲着玫瑰去的，但若是没有了玫瑰，庭园的美依然可以独立存在。心字池是日本庭园中常见的设计，但池中的石头颇为讲究，据说用的是罕见的鞍马平石和伊予青石。垂到水面的是柔嫩得让人心软的绿色枫叶。池的周围有各式各样的灯笼、瀑布和枯瀑布（即不使用水来表现的山水景观）、茶室等。我直呼茶室里茶的价格太高。寺田老师说，那是体验茶道的价格，算起来也不能说贵。我说，反正我穷，不体验，寺田老师咧嘴一笑。

2007年7月25日，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酷暑，寺田老师的集中讲义。内容是日本的宪法。早在头一年4月的读解课上，她已经花了好几节课讲同样的内容。4月的那天，她朗诵起宪法9条，她朗诵完一句，一个美国学生就接着用英文朗诵。那堂课的全过程至今记忆犹新。7月那天，她的讲解结束，让大家自由发言谈感受，我旁边的一个中国女生说，日本的那场战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灾难，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日本人能严守九条。站在前台的寺田老师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她说：“至于我，当然会严守宪法九条。那场战争让无数中国人受害，就像陈桑在作文里写的那样……”说到这里，她掩面哭泣，走到我的跟前，抱着我的双肩，边哭泣边道歉。我忍不住哭起来，哭泣的还有其它中国学生。

旁边的俄罗斯人不明就里，惊诧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那个中国女生以为是她的话哪里说错了，低声询问。其实，2006年秋，在一篇作文里，我提到自己的爷爷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我的爷爷，而是我的舅姥爷，但同样不注重亲属关系的日语里似乎找不到对应的词。寺田老师在作文的评语中写道：“你爷爷的遭遇，作为日本人，我向你道歉。”时隔十个月，她依然记得我在作文里写到的这件事，旧事重提，她是侵略国的子民，



我是被侵略国的后代，在那个时刻，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后代和解了。

我想，我们学生常常私下里议论寺田老师是个接近于没有生活的人，那只是从她对世俗生活的拒绝的层面上描述的。她不苟言笑，她甚至有时惊慌失措，但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反省能力、具有深厚的历史感的人，她的身上渗透出的是大智慧。随着彼此间越来越熟悉，我特别想跟她交流情感和思想，可是经常找不到熟悉的词。就在我急得抓耳挠腮之际，她就蹦出一个词，对，那个词就是我要的！

我跟她相处的时间只有两年，分别已进入第十四个年头。在这十四年间，她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我生活中的诸多瞬间，每每这时，我都会静下来默默地回想着。这样一个异国中年女人的优雅、风情和岛国国民罕见的胸襟，时时温暖着我，2020年元旦那天，我搜集此前的日记、博客，还有她给我批改的作业，再一次重重地想她。我用笨拙的语言，去遥望把自己裹在自己的语言世界里与外界对视的她。

2022年7月1日

作者简介：陈言，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是沦陷区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民国文人的艺术实践，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 波兰访学印象记

□ 张治

2014年春天，我所就职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周宁院长有意搞一个中南欧方面的研究中心，他

建议我出国访学一年。因学院和波兰几个大学正有联系往来，故提出的方案是让我去波兰南部的弗罗



茨瓦夫大学古典、地中海与东方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Mediterran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rocław）。周院长提出了几个理由：我当时在翻译西方古典学术史，对方研究中心的主任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是位古典学家，正好可以多向他请教；我本来很关注中西文化交通史，该中心又有这个氛围，也很好；最重要的是省事儿，不需要我考雅思托福的英语成绩，一句话就可以拍板，而且可以带家人同去。我当时了解到弗罗茨瓦夫这个城市就是从前的日耳曼古典学重镇布雷斯劳（Breslau），大名鼎鼎的蒙森就是在这里写作了学术巨著《罗马史》，莱辛的《拉奥孔》也动笔于此，于是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周院长的建议。遗憾的是，一年后我回国，周院长已经罹患脑部重症，无法讲话、行动，更不必说视事，此前建立研究中心的计划也就落了空。

经过一个暑假的准备，我和妻儿三人于2014年10月10日中午飞抵华沙肖邦机场，随即转机到达弗罗茨瓦夫的哥白尼机场。承蒙先期来这里的同事及其家人照应，很快租好住处。那是一座位于老城区中心西侧的“党产”老楼，毗邻一个以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命名的小广场。初来时四处走走，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后来看多了欧洲各国的很多小城市，知道老城区多少有点差不多模样：一个大教堂，围几圈五颜六色的房子，周末在广场有民间的私人市集，附近几条清澈的河流，观光客在喷泉附近喂喂鸽子，或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坐在路边喝喝咖啡。横穿弗罗茨瓦夫的主要水道是秀丽明媚的奥得河，

我们时常乘坐有轨电车在桥上经过，后来有朋友从德国来玩，还一起泛舟水上。

在塔西佗或是老普林尼的书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点儿对这一带地方的描述，奥得河沿岸是罗马帝国“琥珀之路”的一部分，而弗罗茨瓦夫是其中最大的城市，周末市集上就常有人推销琥珀加工品。中世纪的这里属于波西米亚王国的西里西亚地区，后来又划归哈布斯堡王朝，十九世纪成为德意志帝国治下的世界顶级工业中心。海涅曾作名篇《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而对于我来说，西里西亚在德语文学史上还有一个辉煌的时刻，就是十七世纪曾有两次巴洛克风格的诗歌运动，出现了一批带有神秘宗思想的诗人，比如钱锺书先生读书笔记里经常提到的马丁·奥皮茨、保尔·弗莱明、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弗里德里希·冯·洛高等等。小说《围城》里引过一段“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就是出自洛高。不过眼前的城市柔和安谧，除了少量大型旧建筑，没有太多历史的痕迹。据闻二战期间，这里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红军争夺得极为惨烈，城市大半在战火中被摧毁。战后该城市割让给波兰，赶走了全部原本的德国人，迁入波兰其他地区民众，才又逐渐恢复和重建起来。这里的中年人对于中国很有感情，记忆里还保有从前接受我们社会主义援助的情形，有人甚至向我们描述了从前吃过的“大白兔奶糖”；年轻一代则认同欧美文化，社区图书馆里受欢迎的也是《哈利波特》和《海贼王》等热门书籍，看我们衣着体面文明，就问是不是从日本来的。知识分子认可意大利法国的文化品味，对于德国人则略含敌意。我们那座楼里住的十几岁小孩儿，有时在墙上满是涂鸦的楼道高大的窗户边聊天，脚边放着伏特加酒瓶，看到我却会立正鞠躬，点头问好。但听同事说，如果去比较偏僻的郊区，有些地方会有孩子冲东方面孔的陌生人丢石头。

我时常和同事乘坐两三站电车去大学历史学院拜访中心的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历史学院就是蒙森著书的所在。这位马教授是典型的语文学家，在牛津出过一部研究古希腊动物的书，通晓好多门古今

语言。他第一次见到我就乐呵呵地拿出当时才公布不久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海底考古的一些材料，图片里有个狮子石像，脚踩一球。他问我中国的狮子滚绣球最早起源何时，与希腊化时期这些形象孰先孰后。我当时略记得有些书籍涉及此话题，便答应帮他收集一下资料。马教授带我参观了一下大学的利奥波德会堂（Aula Leopoldina），是十七世纪时为纪念大学的创始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而建，其内雕梁画栋极为精致，带有强烈巴洛克艺术风格。他给我看墙上所绘的众多历代学者画像，每以某人代表一个学科，比如诗歌的代表就是维吉尔，但历史学的代表居然是罗马史家弗罗鲁斯（Florus），这个话题后来我们还听马教授解释过；很有意思的是，马教授走到“演说术之王”西塞罗（CYCERO PRINCEPS ORATORUM）像前，嘴里嘟囔了几声，充满了厌烦不屑之意（这种动静另一次出现是看到一个德国来的观光团），我顿时猜想他学童时必是受拉丁文课业的困扰而吃了不少西塞罗的苦，至今不能忘怀。大厅里再就是还有多位耶稣会士，我认得出的，比如利玛窦，代表是天文学；而那位写过《中国图说》的基歇尔，被称作最后一位通晓所有知识的人，名号则题作“日耳曼的阿基米德”（KIRCHERUS ARCHIMEDES GERMANIAE），马教授特意让我注意，利玛窦和基歇尔都身穿明代中国士人风格的服装。看过这个大厅，我顿时感到以往对于西方学问体系的认识尚不及这次游览留下的印象深刻。

此后，马教授又约我会谈了几次，商定合作计划，包括联手翻译耶稣会士的拉丁文汉学文献，整理一部西方古典文学的《总目提要》。但不幸值逢他父母染病需要照顾，而我又一直在忙自己手里的工作，就没能开展下去。后半年我时常和家人利用申根签证的便利，经常去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游览，看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也寻访了巴黎、柏林、布拉格等大城市的旧书店，每次回到弗罗茨瓦夫，便觉得这里更为平常和普通了。一次次亲睹各种璀璨文明的古迹文物以及种种近代艺术珍品后的兴奋和激动，需要这种回归日常生活后的休息和镇静才

能更好地回味，不知不觉间我们也习惯了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温馨的归宿。我学着楼下小便利店的普通工人买同样牌子的啤酒、伏特加和奶酪、香肠，那年波兰苹果大丰收，但是俄罗斯对之施行制裁，禁止其出口，老百姓多吃苹果就算爱国。我们学着也每天买大量的苹果汁，大约满满一大纸盒也就相当于人民币一块多钱。城市里的中餐馆极少，我们有时会光顾下一个买炒饭炒面的越南餐馆，有次在那里一位当地市民用英语向我询问中国人比较熟悉哪些波兰的文学家，我因为熟悉近代汉译文学，脱口而出就是显克微支和密茨凯维支的中文译名，他居然大概也听懂了，但是有些失望。我随后补充了几位：米沃什、贡布罗维奇，还有科幻文学大师莱姆，他才觉得有些高兴。这里的人民比较朴实真诚，他们在周末从不工作，所有的商店全部关门。我们楼下旁边有一处工地，干了一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每天中午看见工人乐呵呵地走进便利店去买啤酒和香肠。有次犬子在公车上唱起了他刚在幼儿园里学的一首波兰语儿歌，大概是讲五个手指头的故事，令我惊奇的是很快旁边几个成年人非常快乐地跟着唱了起来。

然而城市实在太小，没有太多可去之处。本地青年往往谢绝英语交流，书店里除了波兰文很少其他书籍，全城的特色主要是遍布街巷角落的两百多个矮人精灵铜像，这很可爱，却没有太多值得欣赏之处。就连妻子想剪个头发，都宁可当天一个来回，自己乘车跨国去柏林的理发馆。短暂的夏天来临后不久，我们想念国内的父母，孩子也需要申请单位的幼儿园入学，于是就结束这段印象深刻的游访之旅回国了。在首都机场清关时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我家犬子不到四岁，生得虎头虎脑，讲话口齿清晰，他坐在行李箱上突然大声和妈妈说了一句：“又看到我们中国人了，真高兴啊！”安检人员粲然一笑，立即放行。

作者简介：张治，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兴趣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并涉及西方古典学术史、翻译文学和中西学术比较，近年从事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

## 埃及印象二三事

□ 李雪峰

经过汉办选拔考试并培训之后，2012年11月3日，怀着对埃及——这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的向往，我和几位被分到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的对外汉语老师搭乘埃航MS956航班从北京



国际机场直飞开罗机场，第一次坐飞机，不免有些忐忑，但登机之后已是晚上，漫长的等待加上大包小包的行礼的折腾让人疲乏不堪，吃过晚餐不久居然沉沉入睡了，不知过了多久，空姐又开始送早餐了，实在吃不下去，就只点了一杯芒果汁。飞机飞了一晚上，我睡了一晚上，倒也没有任何担惊受怕，只是被紧紧地绑在座位上，动弹不得，醒来身体实在不舒服。透过窗户往外面看，此时已是黎明前夕，下面隐隐约约的出现了城市的万家灯火，广播提醒飞机已到开罗上空。还没回过味呢，又该下飞机了，反正还有机会再坐呢，如此一想，也不遗憾了。

我支教的学校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上课对象是中文系的学生，另外还有孔子学院学生，学校所在城市是伊斯梅里亚。伊斯梅里亚市位于埃及东北部，是一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城，苏伊士运河沿岸从北至南分布着三个城市，分别是塞得港、

伊斯梅里亚和苏伊士。伊斯梅里亚居于中间，处于苏伊士运河的西岸，隔河东望，则是埃及的亚洲部分西奈半岛。这是一个依靠运河的水浇灌出来的花园城市，市内到处分布着椰枣树、草地和花园，有很多酒店、旅馆，市容干净整洁，被誉为“埃及最美的城市”、“运河的新娘”。（下图是苏伊士运河大学的校门）最为壮观的是，坐落在这个城市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大楼顶端的控制塔，好比整个运河的中枢神经，有条不紊地调度着一艘艘万吨巨轮，驶过这座美丽的城市。其实，伊斯梅里亚开始只是一个叫做“鳄鱼村”的小渔村，（这点颇象中国的深圳，只是它远没有深圳繁华。）得名于这里一个鳄鱼状的湖泊，至今在市内仍有一个鳄鱼湖。中国驻亚历山大领事曾经在这儿向苏伊士运河大学举行捐书仪式并和孔院老师共进晚餐。



在伊斯梅里亚呆了两年，感受最深的是每天从宣礼塔传来的宣礼声，虽然我不是宗教信徒，但走在伊斯梅里亚街头，耳边传来这种古老的召唤声，那一瞬间也会噤声聆听。每一位穆斯林，不分男女，每天必须做五次礼拜，周五下午的时候要到清真寺做礼拜，到点钟声准时响起，于是身着白色或灰色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就会陆续往清真寺里赶去，仿佛在做一件神圣的事业。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因为总在早上四、五点钟被洪亮又悠扬的宣礼声惊醒，响过一阵之后，周遭归于寂静，便倒头又睡了，后来也渐渐习惯了。埃及人对于宗教的虔诚令人折服，无论穷富，一天几次的礼拜是必须要做的，有时正上着课，有学生站起来示意要出去，大部分情况是要去礼拜了。在他们观念里，礼拜比上课重要，是

万万不能马虎的。

上课之余，趁着节假日也游览了许多著名景点，象金字塔、卢克索神庙、阿斯旺大坝、埃及国家博物馆等，也到过埃及的乡村、集市、田间地头。埃及文化的厚重与神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埃及人生活节奏慢，象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没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挣钱的观念，伊斯梅里亚有许多中企，在中国工厂里上班的埃及人一拿到工资，只要生活可以维持下去了，第二天就不来上班了，什么时候没钱了，又去上班了，弄得中国企业很生气，碰到订单催得紧，偏偏工人又不到岗，有时候不免会责骂他们，可埃及工人不理睬那么多，完全是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最能体现埃及人这种享受生活心态的莫过于满大街的茶馆或咖啡馆，除了斋月不开门，这些茶馆或咖啡馆，天天都营业，且天天爆满，时时刻刻都烟雾缭绕、人声喧哗，客人们络绎不绝。有人一坐一下午，喝着红茶，吸着水烟，聊着新近发生的新闻，看着足球比赛，日子悠悠地过去，这份生命的享受恐怕是现代许多中国人无法拥有的。

我租住的房子就在苏伊士运河岸边，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运河的蜿蜒和平静，可以看到行驶的轮船，可以远眺运河对面的西奈半岛，有几次还看见悬挂五星红旗和中国远洋字样的集装箱货轮，如摩天大楼般从不足 200 米宽的运河中缓缓驶过，心中不免激动一阵，那一刻感觉距离祖国是如此之近。

在伊斯梅里亚大街小巷，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香精小铺，每当走进店铺时，映入眼帘的便是或高或矮，或大或小的形状各异装着香精的瓶子。每个瓶子上的图案都不太一样，凹凸有致，层次分明，画工精细，令人爱不释手。店主会热情地拉住你，向你介绍漂亮的玻璃瓶里装的都是什么宝贝，反正我们也听不太懂，索性问他，什么牌子卖的最多，他手指 Lotus flower 和 Roses flower，并用蹩脚的中文说莲花、玫瑰，看来中国人来的不少，让店主居然学会汉语了。在埃及，经常可以闻到摩肩接踵的男人女人一晃而过留下的隐约香气。一次坐船游览尼罗河，我和我们同行的一位中文系的埃及女教师的男朋友住一个房间，便领教了埃及男人喷洒香

水的肆意与疯狂，小伙子拿着香水瓶对着自己头发，脖子，腋下，前胸后背，胳膊，大腿一阵狂喷，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听说是埃及人体味较重，不得不用香水压下去身上的味道。是不是如此，就不得而知了。

香水之于埃及人，就像早晚要用牙膏刷牙，用洗面奶洗脸，是须臾不可离的存在，已内化为骨子里的一种需求，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而这样的习惯也早已跨越男女界限，甚至影响到孩童。妈妈准备盛装出席派对，举起香水瓶的那一刻，孩子们仰着脖子忽闪着大眼睛央求妈妈喷洒。孩童时期，他们便开始跟随母亲接受各种香气的熏陶，在一排排香水瓶前吸着灵敏的鼻子寻找属于自己的气味。不论是随着岁月远去的古埃及人，还是如今正迸发无限活力的现代埃及人，他们从祈祷、生活、爱情，直到生死的每一天，都逃离不开对这一抹色香的深深迷恋。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讲究礼节礼仪，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好“面子”，课堂上讲授谦辞“哪里哪里”，埃及学生一点就透，对于中国人的好“面子”，也许他们理解得更深刻呢。

香水无疑是装点脸面的重要点缀。有的学生平时穿着非常朴素，但为了参加婚礼就会省吃俭用攒下零花钱去租华丽的礼服，去买迷魂的香水。在婚礼上，伴着聒耳的音乐，礼服、香水和扭动的腰肢成为引人注目的存在。我们中文系的老师曾经有幸参加过学生的婚礼，不同于中国的是吃饭倒居于其次，主要的活动是婚礼舞会，新娘家人，新郎家人，来宾都可以加入其中，伴随高亢激昂的阿拉伯音乐翩翩起舞，一直跳到深夜，好不热闹！

埃及香精从鲜花和草药中萃取精华，古法制作是纯手工完成。据说用布裹上花瓣，两个人不停地绞，将天然花汁挤出、过滤、加工而成。香精既非油类也不含酒精，滴在衣服上不留油渍，涂抹于身体能被皮肤吸收，火柴点不着，开瓶不挥发。埃及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从古墓里出土的上千年的香精，这些香精依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历史上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将香精带回国，法国人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种神奇液体，从此，法国大量进口埃及

香精以制作香水。世界著名香水品牌，如香奈儿、雅诗兰黛等都从埃及购买香精作为香水原料，经过加工、设计、宣传包装之后，摇身一变身价百倍，成为时尚阶层追逐的宠儿。每次回国的时候，使馆的领导以及伊斯梅里亚的中国企业家都会建议我们多买些香精回去送人，我买了几十瓶，除了送人之外，自己还留了几瓶作纪念，偶尔拿出来一打开，香味仍然很浓烈。

许多人谈到埃及，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金字塔，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金字塔以它的雄伟、壮观、神秘和中国长城，印度泰姬陵等一样闻名天下。但我对于埃及神庙更感兴趣，因为金字塔和统治者关系密切，而埃及神庙则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神庙作为人与神的交流中心，极大地影响了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埃及人信奉神，诸如太阳神、爱情神、鹰神、鳄鱼神等。埃及各地都有神庙的踪影，每个城市都建有当地神的庙宇，可以说神庙是古埃及精神的家园。那高高耸立的方尖碑，高大而粗壮的石柱，那巨大端坐而残缺的法老雕塑，那墙壁上色彩绚丽的雕刻画，都让人在震惊之余生出一种深深的迷恋。2013年寒假，我们中文系的几位教师随旅游团游览了埃及南方的神庙，游览顺序现在已记不清，只记得有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神庙。

古埃及神庙都是用石头建成的恢弘建筑，跟我们中国的庙宇多土木结构不同，高高的墙壁如古堡一般有抵御任何破坏的威力，静静伫立的无数廊柱威严耸立，气势非凡，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迷人的金色光芒，在它面前，任何人的伟大抑或渺小都似乎都没有了意义。

卢克索神庙是古埃及史上最风光无限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所建，是祭奉太阳神阿蒙的神庙。徜徉其中，欣赏高耸入云的方尖碑，很难想象它是一块巨石雕刻而成，站在方尖碑脚下，人们必须仰视以观之，从而在众人心里营造一种敬仰之情。在埃及及建筑雕刻中，随处可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可以说，他就是古埃及神奇历史的源头。

卡纳克神庙则是古埃及最壮观的神庙群，其建筑之恢弘神圣无与伦比。它始建于古埃及12王朝，至18王朝才基本完工，历时约700年。导游告诉我们卡纳克神庙是卢克索神庙的十七倍，神庙前的

公羊大道两边，神态各异的石羊横卧两旁，静静地注视来来往往的游人，仿佛要告诉人们埃及神秘的过往。高耸的石林，硕大的巨型石柱，身处其中方感觉人的渺小，最让人震撼的是134根巨型石柱，柱体上布满浮雕，最粗的周长15米，上面可以居然可以站立50人。站在洒满阳光的石柱间，这一刻灵魂都能得到洗礼，俗世的喧嚣与琐屑都不复存在，禁不住为古埃及人的建筑智慧啧啧称赞。望着那一尊尊或严肃、或微笑不语的神像，似乎感觉到阻碍神与人沟通交流的藩篱已经轰然倒塌，冥冥之中，众神就在众人之间，他们的面容就是人类的面容，他们的微笑就是人类的微笑，他们的肌肤就是人类的肌肤，哪怕他们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也与人类的眼神一模一样。历经千年，众神始终以同一种姿势默默打量着芸芸众生，见证世间的繁华与衰落，悲喜与哀愁。这些神庙之于埃及，是其厚重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游客而言，神庙是建筑，是历史，是艺术，更是古埃及文明高度发达的有力见证。



作者简介：李雪峰，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土耳其旅居漫谈

□ 张敏



六年前的七月，怀揣着对伊斯坦布尔旅居生活的向往，踏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那是我第二次去土耳其。第一次去是2014年八月，在伊斯坦布尔境内的小亚细亚半岛西半边进行了为期10天的环线旅行，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沿着爱琴海南下，途经棉花堡，抵达最南端的地中海安塔利亚，然后去了热气球的胜地卡帕多奇亚，接着向北经过首都安卡拉，游览了奥斯曼小镇番红花城，再沿着北部的黑海返回伊斯坦布尔，留下了第一次出国的诸多新奇回忆。这次重新来到土耳其开启常驻生活，是之前从没想过的一件事，可是就这么发生了。

2016年7月，撞大运的我，抵达土耳其刚刚两天，就遇上了七一五政变的爆发，还好埃尔多安总统反应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直播视频，稳住了举国上下的民心，最终这次政变未遂。凌晨发生政变的时候我在睡觉，半夜被朋友的电话震醒，得知政变后，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我，不知所措，只能把护照、钱包、矿泉水和一点面包放进双肩包里面，做一个逃生包。从小到大经历过最大的灾难

就是小时候河南老家预告发洪水，也没有学习过灾难来临时自救的知识，只是凭着本能做了这些准备，然后就惴惴不安地躺在床上不敢起来。第二天，酒店旁边的街道空无一人，远远的传来枪响和直升机的嗡嗡声，一整天没敢踏出房间一步。没想到埃总统非常善于发动民众，号召全部民众都跑到街头反对政变，用人民的力量战胜政变，全部公共交通免费，结果政变后的第三天，全部市民都跑到了街上，朋友也告诉我安全了没事了，我屁颠屁颠地还跑去朋友家做客。就这样，可能造成整个国家混乱危险的政变，被当局总统和全国人民战胜了，对比起2013年埃及政变，也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随后埃尔多安在全国展开了清洗行动，很多和居兰有关系的都被送进监狱，这当然都是后话了，直到现在清洗行动还在慢慢进行。

生活在土耳其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土耳其的货币贬值速度不断加快，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从六年前的1usd=3-4TL，到今年已经1usd=17.5TL，短短不到六年时间，里拉贬值了4倍，尤其是去年夏天1usd=8TL到今年夏天抵达1usd=17.5TL，一年时间贬值了一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这两三年新冠疫情，旅游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赚取外汇的土耳其，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从事旅游行业的航空餐厅酒店行业等都无法维持，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直到今年夏天，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慢慢衰退，才逐渐恢复。持续加速的里拉贬值和极少的工作机会，也让本地年轻人感觉到前途无望，好在土耳其很多高校和欧洲的高校有ERASMUS项目合作，土耳其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去欧洲交换留学的机会，也更容易在那里开启工作，因此土耳其很多年青人以及医生和IT行业的人才移居其他国家的也越来越多。基于里拉对比外汇的弱势地位，很多普通土耳其家庭除了储存够用的里拉，其他的都会兑换成欧元美元外汇或者黄金，最常见的投资方式就是变成房产或者地产，来守住积累的资产。除了存储在银行的黄金，土耳其家庭也有保存实物黄金的传统，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共和国金币，是婚

礼上最常见的赠礼，当土耳其发生大幅里拉贬值的时候，埃总统甚至呼吁民众把藏在枕头下面的黄金换成里拉抵抗持续贬值。总体来说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腾飞，自2015年始土耳其的经济开始面临恐怖袭击、政变、疫情、里拉贬值等一连串的问题，居民财富大幅度缩水，一些人归咎于政府的腐败，一些人也归咎于漂亮国收割发展中国家财富的阴谋。

另一个感受非常真切的是土耳其世俗派居民和传统穆斯林居民的文化差异。去年在奈飞上播出的《相遇伊斯坦布尔》(Bir Başkadır)，可以管窥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群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彼此之间复杂交织。生活在马尔马拉海以及爱琴海地中海沿岸城市省份的居民，世俗观念深入人心，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和其他的地中海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没什么区别，衣着开放，饮酒自由，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几乎没有身处穆斯林国家的感受，除了每到礼拜时间清真寺传来的宣礼呼唤。然而在广袤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以及东南部和黑海深处的城市省份，却非常保守和传统，大部分女士穿长裤长裙包头巾，男士定期做礼拜，周五聚礼日必定参加，禁止酒精，时常诵读古兰经，虔诚祈祷庆祝每一个宗教节日，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两个群体的差异。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差异，也并不影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大学成为好朋友，就这样互相尊重互相融合。土耳其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土耳其是穆斯林世界里面接收各国移民最多的国家，也许因为曾经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也许因为现在旅游产业成了国家的产业支柱，土耳其欢迎世界各国的人来土耳其，且真切地对穆斯林兄弟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比如帮助叙利亚难民等等。东西方的居民和文化在这里交融，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堂，伊斯兰教清真寺为各个国家来的人都提供了精神寄托的场所。土耳其人也非常有同情心和共情力，街上的流浪猫狗都会有爱心人士照料，政府也免费提供疫苗给流浪猫狗，对于贫穷的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也非常热心。也许是宗教的原因，也和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系，很多来过土耳其的人都会提到在

土耳其感受到的热情和帮助。土耳其一年中两个最重要的节日，开斋节，政府或者公益机构会在城市或者乡村的中心广场提供免费的开斋饭给穷人；宰牲节，类似国内的春节，西部城市的人倾向于在这个时间进行度假，大部分的阿纳托利亚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团聚，宰杀牛羊，一头牛或者羊的肉，会分成三份，一份分给亲朋好友，一份分给没有钱宰杀牛羊的穷人，一份留给自己家。这些行为和伊斯兰教义有关，但也因此铸造了土耳其人热心助人的性格基因。

或许是拜地中海气候所赐，土耳其物产丰富，不用特别劳动就有收获，土耳其人基因里也是有些许懒散的。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会时不时找机会在工作间隙到办公室楼下抽烟或者喝茶休息，老板经常说如果他雇佣10个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为他工作，其他的土耳其人都可以解雇了，可见中国员工勤奋之程度。午饭过后，大多数同事都会三三两两找个咖啡馆或者茶馆坐着聊天抽烟再回去继续下午的办公。大多数土耳其人绝对不会错过每年一次的度假机会，即使公司补偿额外的薪水也不愿意放弃年假，如果两个假期中只有一两天的工作日，90%以上的土耳其人都会选择连休。在大城市生活的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很多都会在海边购买夏屋，每年夏天暑假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家人全家在夏屋住一段时间，抛开工作，远离城市的喧嚣，全心陪伴家人，教孩子游泳，陪孩子游戏等等，使全家人的身心在海边的度假屋得到放松，全家也收获满满的亲子回忆。对比国内大多数人忙于事业，疏于陪伴家庭，土耳其人对家庭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是极高的。

大部分土耳其人像很多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归隐田园梦，退休了以后卖掉在城市的公寓房子，回老家或者在爱琴海、地中海边的小村庄买下一块带院子的房产，种种菜，晒晒太阳，安度晚年的时光，虽然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和国内没有办法比，但是自然环境和气候却是非常的宜人，三面环海，阳光充足，农作物丰富，没忍住畅想起退休生活了，哈哈，但是不得不说土耳其确实是很多欧洲人养老地的选

择之一，在地中海和爱琴海边有很多欧洲人聚居的村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相比欧洲更低廉的物价、原生态的农作物以及和善热心的土耳其人民，都吸引了大批欧洲人来土耳其定居过退休生活。地中海城市安塔利亚作为土耳其最南边的城市，类似于中国的海南岛，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非常多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居住，享受高纬度地区不可企及的地中海阳光。

除了其他的海边城市，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的财富，横跨亚欧大陆，四分之一的土耳其人口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湛蓝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城市里极为独特的存在，海峡两岸有许多20世纪初富有人家的雅邸别墅，在加拉太塔所在的佩拉和吉汉吉儿区域，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遗留下很多空着的房屋，很多改造成了酒店，还有不少影视明星和艺术家在这一片区域居住。有一次在一个海鲜餐厅吃饭，忽然觉得背后有一个说英文的声音似曾听过，回头一看竟然是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多亏当时看了《锵锵行天下》土耳其采访他的节目，才能识别出来，看起来他应该是接待来自其他国家的作家朋友，后来问了餐厅老板，老板说帕慕克先生是这里的常客，这个餐厅的名字是 *sur balik cihangir*，距离纯真博物馆仅步行距离，后来看完了《纯真博物馆》的书，还专门拿着书去盖了蝴蝶戳，免费参观了纯真博物馆。最初看帕慕克的第一本书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后来又看了《我脑海里的怪东西》，跟随着帕慕克先生的足迹，在这三本书里了解伊斯坦布尔的前世今生。更无须说从新城跨过金角湾到对面的历史老城区诸多的古希腊罗马奥斯曼古迹、圣索菲亚教堂、蓝色清真寺、古罗马竞技场，不一而足，能于年轻时候在这样的城市生活过，也是一份幸运。

土耳其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有新疆的一半那么大，但却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8000万左右，在欧洲也仅次于俄罗斯和德国。同时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军事力量排名全球前十，再加上连接中东和欧洲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土耳其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之前



二十多年的经济崛起，也让土耳其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它在疫情中对很多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获取了更多的话语权，然而伴随着美元潮汐，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果被收割，民生趋于困境，未来这个美丽的国度将会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希望土耳其人能够在重重的国际利益的迷雾中寻找到正确的联盟伙伴，再次让国家经济发展起来。

作者简介：张敏，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5 级学生，现就职于小米集团中东区域部。

## 摩 国 一 年

□ 高 媛



在摩尔多瓦的生活是惬意的，也是难忘的。

2018 年 8 月 28 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就在这一天，我告别父母亲朋，乘着俄航的飞机，13 小时后，平安抵达摩尔多瓦，开启了为期十个多月的“汉

教旅程”。

###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刚来摩尔多瓦的那几天，每天都早出晚归地穿梭在超市、商场和大市场，置办生活所需。摩国的商超与国内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大市场却是个特别的存在。这里能买能卖，格瓦斯、鲜花、胶鞋、葡萄干和叫卖声在这里碰撞、交融，摩国的烟火气似乎都汇聚于此。看到我们这些“稀有面孔”，此起彼伏的 Привет 把热情加满，让我们这几个异乡人不得不忘记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约定。

最喜欢的还是楼下的便利店，人很少，推着空车逛一个小时还嫌不够。享受“目不识丁”的感觉，和室友一起猜测每样东西的名字和用途，时不时用蹩脚的英语向当地人询问，总是能被耐心对待。唯独当我拿着两瓶 FINLANDIA 来结账的时候，被问“有没有十八岁”，我赶忙出示护照以证清白，收银老爷爷和我都笑得都很开心，我为什么开心我不说！

### 浪漫跟钱没多大关系

摩尔多瓦是一个人口不足四百万的欧洲小国，国土面积积极小，经济真的不发达。首都基希讷乌连地铁都没开通，整个城市只有几个像样的大超市，街道和楼房在复古和破落之间反复横跳，五月份空气中还时不时飘来阵阵怪味儿。可是从始至终，我对摩尔多瓦没有一刻失望过。摩国一年，让我看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

这里有清澈无比的蓝天，像棉花糖也像任何萌宠形状的云。随处可见的鲜花，在草地上，在老爷爷手中，在姑娘的裙摆上。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头戴绿帽子的帅小伙儿，手拿一本我看不懂的书，悠闲地度过他的下午，可能是一整天。我突然一阵感动，原来长椅不仅是给老年人的，年轻人也可以慢吞吞地享受生活。过马路时，旁边的老奶奶年过六旬的样子，身材有些臃肿，涂着红嘴唇，踩着高跟鞋，披着呢子大衣快速走过，浓重的香水味儿落在我身上。摩国的大街上有许多像这样穿着讲究的老年人，他们让我看到，美丽和胖瘦、年龄都没关系！

摩尔多瓦最不缺的就是节日。葡萄酒节，春花

节，城市日，圣诞节……一到节日就要放假，至少一天，没有上限。于是我们干脆入乡随俗，跑到大街上，钻进拥挤的人群，随着人流一起，摇晃着葡萄酒杯，品尝着这座葡萄酒王国的快乐。每每这种时候，总会有当地人热心地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圆圈舞”（也许有更专业的名字），于是放下红酒杯，一群人手拉着手，双脚随着音乐交替着点地，围着中心广场转啊转，开怀大笑，彼此祝福，这种时候不需要语言，快乐真的会传染。圣诞节就更不用说了，摩尔多瓦最盛大的节日，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春节。到处都是圣诞树、铃铛和礼品盒子。夜晚的节日气氛最浓，仪式感拉满，被装扮好的街道像是下一秒就要走出个圣诞老人。我想，摩国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是藏不住的。

### 大不了，没有从头再来

孔院举办的春节文艺演出是这一年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提前一个半月，各个节目都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中国传统舞蹈、歌曲、武术表演、书法、诗朗诵等应有尽有，大多节目都是由孔院老师指导，学生们独立完成的。演出这天到来时，所有孔院教师身着传统旗袍，化着精致的妆容，等待着大家的到来。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院的几个小不点儿，排练的时候就容易念错词，上了台一紧张全忘了可怎么办。好在害怕的并没有发生，孩子们在大舞台上反而更放得开，演出在小朋友们《大吉大利中国年》的优美歌声中拉开帷幕。

一切都顺利进行，直到武术表演时，几个小伙子完成一个高难度空中翻转动作时不慎落地，万幸没有受伤，几个人毫不犹豫地剩下的演出进行到底。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这几个武术演员在第一次动作失败后，没有感到尴尬或无所适从，紧接着又尝试了一次，动作仍不完美。坐在台下的我看得手心冒汗，可他们却没有丝毫的失望，而是带着问心无愧的笑容鞠躬下台的。

我联想到国内大大小小的演出和比赛总是“不允许失败”的，这背后是无数人不懈的坚持、无尽的汗水和集体荣誉感的加持，胜利之后的鲜花和掌声值得我们为之奉献无数个沉重的日日夜夜，谁也

不想面对失败后的捶胸顿足。毫无疑问，精英教育之下，完美和无可挑剔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可眼前的这一幕又何尝不精彩呢。

我又想到平时出门依赖防晒伞的我，生怕不小心晒黑了，就不美了。而摩国人民却以为打伞和戴口罩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摩国的男孩儿女孩儿从不畏惧阳光，在这里肥胖也美丽打败了“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好何谈管理人生”的身材焦虑。我想，这是文化差异，但又不仅是文化差异。今天，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收入焦虑……以“焦虑”为中心的紧张气氛正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扩散开来，可摩国一年教我看到更多的是放轻松，不要太紧绷！再试一次，不要害怕失败，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 火锅万岁

如果有人问历尽千帆，跋山涉水，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般会开玩笑地说：“火锅万岁！”对于不折不扣的“中国胃”来说，在肉蛋奶极大的满足和调味料极大的匮乏之间，我真的很难找到平衡点，但是火锅底料可以。我和室友三人非常默契地带了几十包火锅底料，而它们正是我们三人行李箱中最珍贵的东西。

摩国的食材相对国内来说有些单调，而且奶酪制品容易踩雷。蔬菜种类很少，酱油醋这些只有最大的超市才能买到，且价格昂贵。于是我跟室友们日常的温饱问题主要靠超市买来的面条，配上简单的自制卤子来解决。但每周五晚上，是放假的日子，也是吃火锅的大日子。涮火锅食材在摩国肯定是没有的，我们三人只好买来肉馅，自制肉丸子；再买来芝士香肠切成小段，充当一道荤菜；土豆片，西兰花，大白菜，勉强勉强算得上一顿大餐了。

锅里咕嘟咕嘟的红油翻滚着，我们几个也借机碰杯。喝酒聊天的过程就像是，每个人开开心心地把自已这些年积攒的小碎片拿到大家面前，诉说拥有了多少，失去了多少。哪一片值得哭一哭，哪一片让人哈哈大笑。有时候说着说着就都哭了。每个周五的夜晚我们都很珍惜，因为知道这样的经历以前没有过，以后再不会有。

我在中国等你

我在课堂上碰到许多小孩儿，他们每个都很不一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杨甜小帅哥，他对汉语很感兴趣，学习也很努力，我提到的事物他都要利用课下去查，但是每到回答问题的时候，他都磕磕巴巴，答不上来。每次每次，都是这样。直到学期结束也没有奇迹，他还是学得不好的那位。分别的时候我问他会继续学汉语吗，他说会，因为很喜欢中国电影。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林丽是最爱送我礼物的女孩儿，每个节日都不放过，有时候什么也不因为，就是要送我巧克力，虽然并不爱吃，我也总是小心装进口袋里。一开始她学得很慢，但她对汉语很感兴趣，梦想是到中国留学，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取得了很好看的成绩。临走时她要求加我微信，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摩国人民并不使用微信，但她还是坚持要加。直到现在，她的微信列表只有我一人，逢年过节或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子，她总是发来问候。忘不了分别前她连续抱了我三次，说无法想象以后都见不到我。我眼睛看别处，没让眼泪掉下来，说我在中国等你。

在摩国的工作总得来说是轻松愉快的。上一小时被学生气到想哭，下课就收到道歉卡片，根本气不起来。最让我欣慰的是，大部分小孩儿都是真正喜欢中国文化，对汉语感兴趣主动要求家长带他们来学习的，也许单纯的热爱比什么都重要。很幸运第一次做老师就遇见这群可爱的小孩儿，其实想想也是他们赚了（手动调皮）。

不开玩笑地说，摩国一年，于我而言，是快速成长的一年。这一年，我第一次踏上讲台，变成“大人”，回忆起来，仍有太多细枝末节需要漫长岁月去咀嚼、消化。不过，“成长”这件事也让我懂得，无论在哪儿，努力去生活，去体验，为自己留下更多值得回味的瞬间才值得。

作者简介：高媛，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级文秘方向）2013级学生，兰州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7级硕士，2018-2019年在摩尔多瓦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现为郑州市一八联合国际学校教师。

# 肩膀上的戏台

□ 张振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唱大戏，在我的记忆里都是安排在两个时节，年前冬闲时间和年后三月春闲时间。冬闲时间天气太寒，看戏的人少，三月万物复苏，满野的油菜花金灿灿的，经过一冬的麦苗懒洋洋地喝饱了春雨，绿油油的抖擞着，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铺成一地的绿地毯。这时候的农村大戏最热闹。

大的寺庙要举行庙会，庙会必有一台大戏撑门面，让在家里局促一冬天的人们走出家门，赶庙会，听大戏。东村西店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会净手净面，把自己的面容拾到的润红雪白，他们像春天的鸭子一样，一点好玩的事就会笑得嘎嘎响。当然，如果扭头往后一看有几个老汉或者小伙子，他们一定会把长到腰际的大辫子一甩，包在裤子里圆墩墩的屁股左右摇摆着猛跑起来，嘎嘎的笑声撒一路。

春天的庙会我们只能上午下学后绕弯去遛几

眼，最吸引眼球的是卖吃食的地方红烧猪尾巴油光光的颜色、在沸腾的锅里跳跃着的狗肉，泡在水里的五香蚕豆，还有缠绕在一起的大油条静静地躺在满是油腻的用藤条编成的小框里。当然我们是没钱买的，只能用眼睛解解馋。往人山人海的舞台上看见几眼，除非能找到一个高岗，否则什么也看不见，就是如此，听锣鼓家伙就可以辨别舞台上演的文戏武戏。文戏多是弦子咿咿呀呀的拉，武戏多是梆子鼓钹叮叮当地急促响个不停。下午还要去上学，有一个喊一声，其他的小伙伴肯定是撒丫子就往家跑。

“田家少闲月”，说是三月农闲，也是相对而言。白天大部分农人要给春小麦锄陇，要给牲畜薅草，要给果蔬疏花。白天的庙会热闹之处在于小商小贩的吆喝，锯盆的、担担的、镗露锅的、卖蒜的，低一声高一声直嗓子拐弯嗓子，此起彼伏，盖过戏台上的锣鼓家伙的声音。戏一般都不是重头戏，重头戏都安排在晚上演。

拂面的春风凉爽惬意，喝过汤（豫东吃晚饭称“喝汤”）之后，三五成群的戏迷们不顾白天的劳累，早早地聚集在戏台下等待戏台上锣鼓敲响。年轻人来的不早，他们一般是先在外围，有的钻进小棚子里推几排牌九，那些左顾右盼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小伙子一定是在等她心中的姑娘。白天的小商小贩大多数也都收摊在戏台下选个上好的位子等着过过瘾。

父亲是个戏迷，我年纪虽小，父亲晚上看戏大多数时间是会带上我的。他拉着我的手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认识不认识的都点头打个招呼，一直往靠近戏台的近处走，乡里乡亲看到有孩子，也会闪开一条缝让过去，有带孩子的家长这时候看到也会主动招呼过去，没有板凳，地上的一条粗大的横树干就是最好的座位，挤一挤坐下，往后看一下，影不影后边的人看戏，然后父亲会再次谦卑地对左右笑笑，表示感谢，并掏出烟卷来让一让，于是周围的都是熟人了，当然最主要都是戏迷，坐在一起说说谁看了白天的戏，唱的是哪一出，并讨论着主角白天不演，晚上肯定会很卖力，有说有笑，时不时用眼瞟瞟煤气灯下略显昏暗的戏台。

一鼓二锣三弦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铛！锵！急促的鼓点过后，只听锣“铛”的一声，很脆地停下，钹紧接着“锵”的一声悠悠远远。弦子咿咿呀呀的拉上了。这是大戏开始的前奏，也是静场的提醒。

父亲爱看的是“刘墉下南京”，豫东话“墉”念偏（piā）了就是“荣”，所以记忆里是“刘荣下南京”。但戏文却是父亲常和我念叨的，父亲说戏时引导我，清官难做，要做清官，这个思想到后来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戏有多好我不知道，反正挤来挤去的感觉我是知道了。一开始大家都还守秩序。等唱到热闹处，后面离得远的就想靠戏台近些，就从人缝里往前挤，前面的又不让，有些年轻男人前面如果有大姑娘小媳妇，他们更是上劲地往前挤，总想沾些好处，于是一拨一拨的像海浪一样，坐着的不得不站起来，以免被挤趴下，站着的是要想不被挤出去，就要想办法用腿往后杠，于是乎大喊的尖叫的骂人的哭嚎的乱成一锅粥。这时候父亲就会把我扛在肩头，随着形势进退。实在没办法，唱戏的班主也会把戏停下来，在戏台上用喇叭喊几嗓子“别挤了，再挤不唱了”，你别说还真管用，一会的功夫波浪起伏的人群就会静下来。因为谁也不敢因为自己耽搁所有人看戏，那是要惹众怒的，也是惹不起的。

看了多少场戏我不记得，父亲把我扛在肩头看戏的情景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其实我们都在演戏，我和父亲也是一场戏，有相聚也有分离，父亲的戏已经散了，我的戏还在上演，艰涩的生活因为父亲的肩膀扛起了我，无论何时我们都不会被挤散。父亲给我讲的戏文我慢慢地在参透。我告诫自己，要把自己的戏演好。

每当静下来时，我就想，戏台下是真实的生活，戏台上是诗和远方，而搭起我的戏台的就是父亲并不宽厚的肩膀。

作者简介：张振军，商丘师范学院（原商丘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87届毕业生，现任商丘市梁园区基础教育教研室副主任、中学语文教研员。

# 归 去 来 兮

## ——贡嘎徒步转山

□ 丁玉琳

归去来兮，浮世清欢淡如水；  
归去来兮，繁华落尽终归真。

贡嘎雪山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城南，是四川省最高的山，海拔7556米，故谓之“蜀山之王”，又名“岷雅贡嘎”。

藏语中的“岷雅”特指生活在贡嘎山区尤其是西坡的康巴族群，又称为“木雅人”，它也表示“木雅人”生活的地区。藏语中的“贡嘎”意为“最高的雪山”。

贡嘎雪山是藏地神山，巍峨险峻，非专业人士可攀登。所以大多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选择转山，用最原始的方式，亲近自然，感受藏地文化，以及雪山的神秘和神圣。

此次徒步路线为：玉龙西村——冷嘎措——子梅垭口——子梅村——巴王海——草科

一

29日，一行8人，从成都驱车前往泸定，小雨淅淅沥沥，途经雅安，有队友出现感冒症状，进退十分纠结，而另一名队员孤灯，接到紧急电话，家有变故，急需返回。在雅安两子河服务区，随车向导联系的车辆，五分钟之后到达，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孤灯送回成都。

孤灯，登顶珠穆朗玛峰商丘第一人，为人亲和率真，此次贡嘎转山，得以同行，真乃整个团队的幸事。然而，世事难料。孤灯的突然离队，令全体队员的心情降到了低谷。

约11点到达泸定安全驿站，检查登记妥当，天空稍放晴。在二郎山隧道内穿行，忽明忽暗，似是无休无止。大渡河的水平静如镜，铁索桥寂静无声。

因为吃了半片晕车药，一路上昏昏沉沉，不觉到了康定城，在一家小饭馆停车休整。要了一桌菜，以示腐败的日子结束。饭馆对面的格桑花开得正盛，五颜六色，迎风摇摆。

穿过二郎山，翻越折多山，逐渐深入川西腹地。

7点，被滞留在色乌绒，几番周折，关于车辆进入的问题一直没有协调好。雨还在下，队员们穿得单薄，手机信号时有时无。直到8点，玉龙西村协调来六辆小车来接，队员们转移装备，天已黑透。因为阴雨天气，道路一片漆黑，只有面包车的两束灯光把漆黑的夜钻出两个洞，路况相当恶劣，七拐八绕，上下颠簸，坐车的人不能多想，只能耐住脾气给年轻的藏族小伙提醒：天黑路滑，小心慢行！到达玉龙西村用了两个多小时，下车，寒风凛冽。此时海拔3700米左右。这家主人已经备好了晚餐。

玉龙西村是今晚寄宿的村子，它是隐藏在情歌



故乡康定的一方净土，背靠贡嘎雪山，据说那里有五彩的钙化池，缤纷如虹，宛若仙境，名为“泉华滩”。泉华滩绵延6500米，乳白色的泉水为最盛，俯瞰就像一条白色巨龙在莽莽群山间游走，所以先人为村子命名为“玉龙”就不言而喻了。

翌日，天微亮，起身。院子里，空气异常清冷，院外有驼铃声。洗漱之后，看见队友蹲坐在地上，她说，夜里没有睡好，头疼欲裂。我不免担心起来，第一天是最难适应的，希望早饭后能调整过来。

早饭是馒头、大饼，都是适合中原人口味的，米粥里加了奶酪，很香但是有些腻。为我们准备食宿的藏家女名字是巴桑，看起来温柔体贴，总是进来里间问我们吃得惯吗，早饭后，我们要整装出发，巴桑又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大壶酥油茶。

院子里来了一个小伙儿，看起来二十来岁，利索地招呼队员们开会。他自我介绍，名为“神医”，是这次徒步转山的向导。他一身得体的户外服饰，两颗小虎牙，笑起来异常天真无邪。

队员出发泉华滩，神医联系马帮和车队。出了巴桑家院子，稍稍上行，就是泉华滩入口。往返需2个小时左右。泉华滩，海拔约4000米，瑶池一般，临近美景，队员们状态越发良好，虽然下着小雨，拍照热情却无比高涨。

回到巴桑家，神医联系的马帮已经到位，稍作调整，开始向冷嘎措进发。这是此次贡嘎转山的第一营地。

冷嘎措位于贡嘎雪山的西南坡，海拔4500米，幽蓝的湖水像是蜀山之王流下的一滴泪，那里是亲近雪山的最佳位置，那里可以看到贡嘎雪山最美的日出和日落，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雪山倒影……

约11时，从玉龙西村出发，时而小雨，时而冰雹，时而飘雪，一阵“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恍惚，我忘记了我从哪里来，我那里又是什么季节。

海拔迅速上升，灌木丛生，队员战线略长，我随天津领队钥匙攀上了一个山坡，俯视山下，村子已经淹没在深山之中，马帮在蜿蜒的山路上叮叮当当，队友们三三两两散布在灌木丛里。

第一天，身体不易调适。远远听见手台里有队友高反，走不动了，要求骑马。领队以最快的速度协调。高海拔徒步，对自己身体必须了解和负责，

量力而行才好。

又跋上一个山坡，稍作歇息，又见可爱的蓝色龙胆和彩色的狼毒花，忍不住拍下照片，每次在身居高原的达瓦的朋友圈里看到这些野花时，我就觉得特别亲切。生活中，我不喜欢玫瑰和百合，却常常怀念高原上这些不动声色的美丽。

约2时许，雪纷飞，大如席。雪天赶路，脚步不觉加快，一个转弯，看见了马帮，马已拴好，装备已卸下。冷嘎措垭口到了，营地到了。

神医在搭天幕，灰导支金字塔，可是雪下得太大了，真是费了老劲了。我在旁边搭不上手，站在风雪里，一会儿冻透了。灰导忙活的间隙，指了指营地斜下方，说那就是冷嘎措。湖面被雪笼罩，与周围的灌木丛连成一片，我什么也看不见。

不知明天天气如何，如果雪一直不停，我们将与贡嘎雪山无缘相见。

## 二

帐外大雪纷飞，刚清除完，又积了一层；帐内严重缺氧，连火机都无法点燃。队友不断出现状况，头疼、呕吐、昏睡。领队、大智、狂奔，不断在队友间问询，供给食物，神医也不停测试着队友们的血压……

一夜无眠。

天空终于把雪面照亮了。我口渴难耐，不想给队友们再添乱，钻出帐篷，捏了一撮雪吃了下去，嗓子和胸口顿时舒服多了。

高海拔，低氧量，身体机能迅速自我调整和保护，极易引起口渴，万幸的是，我除了口渴没出现其他高原反应。不知道其他队员怎么样了。此刻，营地还是一片寂静。

环视营地，神医昨天搭的天幕已经被雪压塌、覆盖，只露着几个边角。周围都是缓坡，沿着突兀不平的雪面，向下走了一会儿，听见水流声。不知道踩到的是路还是灌木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溪流走去。我想喝水。

雪水清冽，冰凉刺骨，担心拉肚子，只喝了两小口，又扑了扑脑门，有了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向冷嘎措的方向搜寻，一片白雾蒙蒙，湖面像是被冰封，毫无生机。转身，我向贡嘎雪峰望去，连绵的贡嘎雪峰像一群奔腾的蜡象，分不清主峰和角

峰……

这样的天气，是进？是退？

约7时，队员们陆续走出帐篷，不知是谁，在帐外一个趔趄，差点晕倒。昨晚高反的几名队员情况还是不佳。

下撤，立即下撤！放弃原计划4700的第二个营地。天津领队钥匙和河南领队烟灰慎重商量之后，做出这样的决定。

收拾停当，已近9点。高原上收帐篷、打包，比徒步还要费力，因为免不了要一蹲一起，一个不小心就高反了。

经历一天一夜的辛劳，就这样吃了贡嘎雪山的闭门羹，不甘心的不止我一个。灰导最终列出一个方案，兵分两路，一路下撤，另一路原地等待，天气一旦放晴，就继续攀登冷嘎措垭口，至海拔4700米，与贡嘎雪峰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我评估了自己的状况，决定留下，同时随灰导留下的还有狂奔、小红、敏、大山，还有钥匙带领的几名天津队友。

神医是个藏族娃子，在读大学生，对高原气候了如指掌，他看了看浓密的云层，建议原地静候，静观其变。营地一侧有两个蒙古包，神医带领大家进入，先补给食物。他呢，不知从哪弄出一瓶啤酒，就着一桶泡面小酌起来。队友好生羡慕，他小虎牙一呲，说，当场测血压，谁的血压能达到他的水平就可以喝。结果，结果大伙就老老实实各自吃各自的干粮去了。

约10时许，突然有阳光散射下来，远近的雪面一片光亮，阳光驱赶着云雾，不一会儿连绵的贡嘎峰全部展露出来，大伙儿那个激动啊，直想蹦想大喊……神医说，面对雪山，不要指，不要大喊。嗯，是的，那里应该是住着神仙，不要让凡世的嘈杂扰醒了她的清梦。

我以为，既然天空放晴，那就可以启程上行了，领队们和神医商议后，最终决定要等到1点，高原气候说变就变，尤其是午后。

安全第一，那就继续等。雪山就在那里，接不接纳我们，要看天意。等待的当儿，捧着阳光拍了几张雪山和倒影。心情已不像早晨那般郁闷，队友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这就是雪山的神秘和神奇，

当她云开雾散之时，看见她的人就会心情开朗，笑容满面。

我在冷嘎措湖边徘徊，竟一时分不清云和雪山的真实所在，一会儿湖水里，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天上……

也就一眨眼的功夫，太阳收走了光线，天空阴暗起来，云雾先是白色，后变成灰色，紧接着风起云涌，大片的雪花倾泻而下。刚才看到的贡嘎雪峰，还有冷嘎措湖水中的倒影，像昙花一现，简直让人怀疑是幻觉。

雪如絮，把冷嘎措一层层包裹起来。我看看表，时值12点57分。我不禁慨叹，神医乃神算也。

下撤！已经没有遗憾。尽管，与贡嘎雪山仅有远远的一面。

### 三

大雪下得铺天盖地，睁不开眼。只有稍高的灌木丛伸出三三两两的枝叶，探头看着我们这一群不可思议的傻瓜，草甸变成了一张没有边际的白色地毯，蓝色龙胆和狼毒花全然没了踪迹。

所幸的是气温不算低，雪落在裸露的土面上，很快就融化掉了，这样，我们得以分辨山路的痕迹，不至于迷了方向。

踩着前面队友的脚印，在大雪中穿行，突然觉得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天气——空旷。安静。孤独。全都是极致的。

约两个小时后，下撤到山脚，有车来接。昨夜在4500米海拔的营地，一夜未眠，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蹦蹦车”，昏昏沉沉中摸到房间，换掉衣服。卸下的护膝和雪套瘫在地上，脏兮兮的，心想，再让疲乏的身体支撑一会儿，洗好了再休息吧。

我帮你洗吧，你很累了。刚下到一楼，一个漂亮的藏族女子起身向我跑来，对我说。

只觉得好面熟，心想藏族女子怎么都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热情善良。

收拾停当，回到二楼房间，蒙头大睡。醒来已近六点，感觉好饿，这才想起没吃午饭。下到一楼，去厨房找吃的。藏族女子迎来，我说明来意。她慌忙说，饭，这就好这就好。这时脑子突然一闪，这不是前天我们寄宿人家的巴桑嘛！我大概是过于疲惫，完全忘记了这是前天住过的巴桑家。

我说，你是巴桑？她笑吟吟点着头。我起床时没加衣服，巴桑问我冷吗，我说有点冷。她放下手中的活计，边上楼边说，你等我，我去给你拿我的大衣，是刚做的，可暖和。我一边说不用，一边撵着她上楼，到了楼上，巴桑已经拿出了她的大衣，绿色的，里层是羊毛，她不管不顾地披到我身上。

我又随她下楼，看她一个人忙活，我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她于是就问我，你知道青菜怎么做吗？我说我知道，咱有什么青菜？我来先准备。她指着墙根下一个长长的案板让我看，是芹菜和豆角。

她问我，芹菜怎么做？我说放一点肉，炒炒。她又问我豆角怎么做，我说用水煮一下，然后再炒炒。巴桑笑笑的边点头边说好。

芹菜有很大一个菜根，我向巴桑要了一把小刀，谁知笨手笨脚、冒充大厨的我，一下被小刀划破了手心。

准备好青菜，我到里间，火炉上的火锅已经咕咕冒着香气，我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对巴桑说，有什么事你叫我，我在这烤火，看着火锅。她又笑了。我把划破的手心举给她看，竟然向她撒了一个娇。

哎呦呦，这怎么办，怎么办？巴桑用满是藏味的普通话说，她笑眯眯的眼睛和小圆脸可真好看，看得我心里熨贴极了。

此时，我坐在里间的火炉旁，用手机打字。火锅咕嘟咕嘟冒着泡，巴桑不一会儿就进来一次，往锅里加菜，木耳、金针菇、芹菜，辣椒，每加一次，她都会问我现在加可以吗，我说行了，假装很懂的样子。我问她的名字和意思，她说她全名是巴桑嘎玛，借用的一个菩萨的名字……

我和巴桑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楼的厨房里越来越香，也越来越温暖。

#### 四

一夜无梦。七点起床，拉开窗帘，哎妈呀，巴桑的小院子，银装素裹，看样子是下了一夜的雪。

今天，正式离开巴桑家，乘车去子梅垭口，那里海拔4500米，是另一个近距离接近贡嘎雪山的绝佳角度。

路上，听队友讲，昨儿半夜，巴桑到大厅通铺给队员们盖被子，队友们着实被感动到了，尤其是邱杰，戏言在家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呢。

我们直后悔，离开时怎么就没想起来和巴桑合个影呢。直到晚上投宿子梅村后，还在念叨着巴桑的好。

旅行，就是这样——那些感动我们，温暖内心的，不止是那些风景，还有一些人。大山深处的朴实和纯真，像雪莲一样珍贵而美丽。我们遇到了，就会记一辈子。

远处的天空，被风划破几道缝隙，泄露出几小块儿瓦蓝。周围大团的云雾死死抱住群山，仍是不肯离去。约9时许，阳光伸出温暖的大手，轻轻一拨，挡在空中的那层云雾再也绷不住了，一下子碎了，四散而去，悬在空中，随风漂浮。

天晴了！晴了！

那天空可真蓝啊！蓝得没有一丝杂尘。此时，我想问，为什么只说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呢？事实上，世上万物，干净到极致，皆能摄人心魄，充满圣洁之感。

天晴了，这真是人品爆棚，上天恩赐，意外之喜。据说，很多人在这住了一个星期，都没等到一个晴天。

赶时间，赶在阳光明媚之时，赶到子梅垭口，以免老天一会儿来个大变脸，这是在冷噶措垭口见识过的。

“五菱神车”似乎不怎么给力，连续爬了几个弯道之后，“突突”几声就蔫了。队员全部下车，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个弯道，下一个弯道又熄火了，这次索性罢工，队员下车它也不走，那就推车。昨夜的雪在强烈的日光下已经融化，路面泥泞不堪，不一会儿就都开始大喘气，不过，这一点不影响大伙儿的心情，下车徒步，正好可以看看这神奇的风光。

远处是白雪皑皑的群山，日光照射下的山峦银光闪闪，近一点是松柏覆盖的山谷，松柏的树尖顶着积雪，一簇簇，一团团。天空和云朵自不必说了，只消看上一眼，那空灵之感，便会让你抛却世间的一切烦恼。

几经周折，终于到了子梅垭口。

贡嘎雪山就在正对面，连绵不断，横亘万里。有云雾在半山腰缠绕，仙境一般，近在眼前，又如远在天边。大约一个小时后，云雾开始从山谷中升



腾，这时，太阳也躲了起来，贡嘎雪山便顺势隐去了踪影。

不知为何，这一面，我竟再也没有了冷噤措那一面的深刻和欣喜。我知，这一面，是因为缺少了等待和付出。

而，世间的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五

女王艾尔萨拥有冰的魔法，她能创造雪的天堂，也可铸就冰的地狱……

掀开门帘，一阵眩晕，努力了几次，眼睛怎么都睁不开。藏家院子里满是积雪，白色的帐篷上又被白雪覆盖了厚厚一层，院外的山，远处的山，全是白亮亮的，高的低的，远的近的，也全没了层次，上下一白，白茫茫一片，世界变成了一个冰雪城堡……雪还在下。

此刻，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冰雪奇缘》里的艾尔萨和安娜，想起关于她们的魔咒和真爱。

子梅村藏家，昨晚就停了电，今早醒来依然停电中，七点被喊起床，屋里还黑乎乎的。那也得起床，从子梅村到草科，海拔从3400米下降到1000多米，有近20公里山路，必须赶早启程。

收拾停当，约8点半，带齐装备，出发。

走出子梅村，雪越发下得紧了，扑簌簌地落在帽檐上，视线雾蒙蒙的。和天津队员结伴，20几人的队伍有些分散，道路非常明显，我一个人走在队伍中间，并不急着赶路，反倒多了几分惬意。

世界真安静啊，连如此稠密的大片雪花落下来时，都轻悄悄的。纷飞的大雪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像是要下到天荒地老，而我，像是要走到天的尽头。在这样的路上，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行走，也可以思索，此时的思维是没有边际的，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你思考生活中所有解不开的命题，然后看着前方淡然一笑……

约10许，遇到一条河流，从左侧的山间，横穿山路，向着巴王海河谷奔流而下。无路可走，只有涉水而过，我的登山鞋已有近五年的寿命了，来前就担心它能否撑得下来，还特意买来胶水沿着开胶的鞋缝粘了一圈。蹚水过去，透水是一定的，只要鞋底不掉就算幸运了，事实证明，很幸运，紧接下来的数次蹚水，也证明很幸运。只是脚丫子在透

水后的鞋里越来越不舒服了。

不舒服的还有我的脖颈和肩膀，从今早出发，左侧肩膀就酸疼，连带左边脑门都是疼的，很是担心症状加重，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巴王海的河谷，水面越来越宽，水速减缓，水的颜色呈现出好看的蓝绿色。不多会儿，便有零星的枯木，或立或倒在河岸上，这是巴王海特有的景观。

巴王海，原名为“八望冰川”，她源于雪山向下延伸的贡布冰川。因该冰川终年被厚重的云雾所笼罩，很难见其真容，故被当地藏民称为八望冰川，意思是要回望八次才有可能见其一面，足见其独特珍稀。只是后来被误称作“巴王海”，而我更喜欢“八望冰川”这个名字，它蕴含着独特的期盼和向往之情，还有令人魂牵梦绕的凄美之景，如此这般，“八望冰川”才配的上这深山峡谷中的海子如梦如幻的气质。

一个转弯，视野突然开阔，水面静谧，水色澄净，有长满水草的沼泽湿地散布在海面上，若是晴天，想必一定是岸芷汀兰，沙鸥翔集。

一只黄脖颈蓝尾巴的小鸟蹲坐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羽毛被风吹得有些零乱，我走近看它，它竟一动不动，我与它对视片刻，它竟还是毫无惧怕之意。好吧，小家伙，我认输，我走，这里毕竟是你的地盘。

头疼不知什么时候好了，大自然的治愈效果是强大的，尤其是这不停变换的高原之景。

此时，随着海拔的下降，我已从冬季走到了秋季，从大雪纷飞走到了秋雨绵绵。

路，却不好走了。巴王海海拔3200，而今天下撤的草科是1060，如此陡峭的海拔落差要在接下来的路程里达成，要如何办呢？难不成要滚下去？

想滚下去也没那么容易，因为灌木丛生，山路狭窄，狭窄的山路上都是摩托车和马帮踩下的深沟，深沟里都是淤泥，淤泥里都是马粪……特么想滚，滚得下去吗？

路上有从草科停车场上行去巴王海的旅客，看见反向下行的我，再看看我那登山鞋和雪套上黑紫色的淤泥，小声猜测上面的路，说是一定不好走，呃，没错，很难走！我用两条腿两根杖，换了好几种走

路姿势，最终还是滑了个仰八叉，还有一个狗啃泥。

值得一提的是，从巴王海到草科的摩托车司机着实厉害，一个藏族小伙，一辆摩托车，后面驮着两个旅客，来回穿行在这般山路上，一路上竟也没有遇到一辆滑倒的。所以，哪位爱好耍摩托车的大哥，若找不到对手，就来草科和巴王海路段，随便找个藏族小伙挑战一下，保证你输得心服口服。

言归正传。一路阴雨，伴着一路泥泞。约3时许，天空稍稍放亮，一个回转身，看见右上方的天空有雪山的影子，在灰暗的背景下，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再看，又像是海市蜃楼。一眨眼，天空又变成了一片灰蒙蒙，什么也没有了。

在泥粪混合的泥泞中又蹭了一会儿，草科停车场到了。此过程又让我想起了去年从垭口倒穿稻城亚丁的经历——从地狱到天堂，再重回人间。“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灵魂逍遥之后的回归，总免不了几分怅然和无奈。

一切恢复正常。手机的响声里除了有家人和朋友的挂念和问候，还有两则新闻。一是冷嘎措垭口营地，在我们下撤后的那一晚，有一名徒步爱好者不幸罹难。大雪纷飞的黑夜，他独自一人在帐篷里一睡不醒。二是，折多山被大雪封路，许多车辆和人员被困，需要救援。而我们在此经过，只早了一天……

在从草科去往成都的路上，天津领队打来电话。他和几名队员已经下撤到草科。他们是在玉龙西村和我们兵分两路的。我们乘车去子梅垭口，他们攀登那玛峰。那玛峰是贡嘎雪山卫峰之一，海拔5588米。可是，因为雪太大，难以登顶，只好放弃。据说，前往的队友，因心情郁结，当晚在草科醉酒……

梦一场，醉一场，每一场都是情结。

山一程，水一程，每一程都是人生。

愿珍重！

作者简介：丁玉琳，商丘师范学院政治系（现法学院）1999届毕业生，商丘市梁园区文联副主席，书画院院长，《梁园文艺》主编。

## 犹 忆 当 年 神 农 架

□ 王 琰



### 第一天 神农庙

2018年夏天，没有疫情，还能在暑假带着娃到处逛荡。七个人组团，去神农架。下了火车，又坐六小时大巴，盘山公路颠簸起伏，公路外是悬崖，坐车上往下看更觉陡峭，下车时候腿都是软的，一半吓的一半颠的。

第一站去的彩虹桥，亮点是小林同学在桥上表情，战战兢兢地往前走，腰都不敢伸直，脚下虎虎生风，矛盾的和谐。从桥上往下看，下面人如蚂蚁大小，海拔应该很高了，云雾缭绕中，叹为奇观。

出彩虹桥行两公里山路，到燕子洞。燕子洞是一个乌漆摸黑的地方，进洞温度有十度左右，洞壁上有水渗出，偶有滴答声，和掠过的燕子鸣叫呼应。游客有用手机照明的，燕子飞得快，听见鸣叫，才知道已经飞过。来回约二百米，出来牙都冻凉了，估计我们也打扰了栖息的燕子，本来去看看有没有燕窝，现在看来，想多了，此燕窝非彼燕窝！

有山有水的巴人部落，和中原的山比较像，不同的是温度，在这里温度低得不敢下水嬉戏，所以石上长青苔，水清浅，绕石而下，蔚为奇观。

出大门时候看到沿途摆着很多特产吃食，可以免费品尝，有些味道还可以，价格比外边高两三倍，所以尝的多买的少，脸皮足够厚的时候，就是心理素质够好，压根不去看卖家的脸色，也许他们也习

以为常。其实景区人聚集，真品平价应该是好生意，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非要宰一刀，上当多了，景区东西不能买就是常识。有些人往往自己认为很聪明。

神农坛祭拜时候，一路上那个一米九的帅哥导游介绍了很多当地植物。黄连、车前子、铁树、五味子、彼岸花、眼睛树、戴草……很多都是见闻名已久，第一次见本尊。值得一提的是偶遇一株千年古树，凄风冷雨争风夺日防人类，活千年也是不容易的事，寿则多辱，想来植物也如此！树下看到凤尾蝶，难得不怕人，距离近的去拍了特写。

神农坛山神与山鬼并存，山神是闭着眼睛的，暗猜山神慈悲不忍看见众生皆苦，所以闭上眼睛。爬台阶数百，以示对神的敬畏之心，上香下跪只是膜拜的形式，只要心中有神，众神就与你同在。历经千年，神们早就不拘形式了吧！



下山的台阶依旧漫长，有走之形步者，瞬间带歪了一行下台阶的人，不过确实舒服多了！看着走的距离长了，其实是一样的，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忽略了真理！

在下山路上被一只小松鼠吸引了目光，小林同学先发现惊呼，它的毛与树干颜色接近，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成人对美的感受往往没有儿童敏锐。

### 第二天 神农顶

8月16号走神农顶一线，最觉震撼的是神秘谷和神农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间之大欢喜莫过如此，时间仿佛停滞了，唯有满眼的绿色被无限放大，这样的地方，理当受到膜拜！

下车感觉到风的凛冽，海拔应该近三千米了，雾气弥漫在身边，从手指缝穿过，随风又散去，远

处看是仙气飘渺，如果不是周边游人穿梭，应该就是仙境了。空气质量极好，洗涤身心！



神秘谷观景台，远处群山层叠，水墨画渲染一般，云雾水一般随风飘起，往下看是悬崖，一眼天堂，一眼地狱。风大，能感觉到撕扯后仰，不能久站，转弯去了登山顶的路。路两边有杜鹃花树，可惜不是春天。往前走是箭竹生长的地方，木栈道两旁都是，视野极好，一眼看到顶，可惜时间不太够，没走到顶峰。

神农顶上看到卖东西的小贩穿羽绒服，再看看自己的短袖，瞬间从夏季过到冬季了。我们用坚强的意志对抗寒风，登上了华中第一哨。登高望远，美感直击灵魂，神农架植被覆盖率高，入眼是深深浅浅的绿，太阳透过云层照到树上，宛如油画铺在山间，层次鲜明，色泽浓郁。

小林同学看到卖牦牛肉的，尝的时候拿了小手指甲那么大的两片，过一会给我一片暖热的牛肉干，觉得这份心意可以温暖整个冬季了。对比后买了一份炕小土豆，小林同学端着让同伴们一人吃一两个，热气腾腾的咬一口，驱散了寒意，而后同行七人在神农顶留下了全程唯一一张集体照，弥足珍贵。

站在高处，环顾四周，山巍峨、树苍翠、风冷冽、云聚散、啸声扬、回音希，人只是其中渺小的一枚，我来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 第三天 大九湖

8月17号，乘无轨小火车前往大九湖，一路上小雨淅淅沥沥，到地方反而停了，我穿的是溯溪鞋，每走一步水浸入脚底，凉意直达鼻梁，感觉步步生莲！

大九湖是湿地公园，湖的面积都不太大，名字起的气派一点，大都是脑补起来的。看点是远处的群山，云雾缭绕，太阳在云的掩映下，树木植被一块浅绿一条深绿，阴晴同在的立体气候，平原地带是看不到的。近处的沼泽地里，杂草丛生，点缀稀疏花朵，中间有牌子曰：草丛毒蛇出没！我这怕蛇的人，自觉地走在栈道中间，极少到草丛拍照，少拍了很多好的照片。

一大湖和我校春明湖大小差不多，直接忽略不计，从二大湖开始走起，到五大湖结束，后面四大湖全靠想象补充，有雨下，人稍疲惫，没坚持走完最后四大湖。中间沼泽，杂草，小块树木，湖水，天鹅，帆船……还见到了传说中的跑跑猪，觅食沼泽间，行动迟缓，一看就是家养的。

路边有卖当地特产的老人，炕的土豆，烤的玉米，煮的红薯，旱黄瓜，糍粑之类，小林同学想吃酸辣土豆粉，娃子，这个土豆粉全国都有啊，你跑到大九湖来吃为嘛！最后商量一下，吃了个糍粑……话说也不是当地的特产。

五大湖边上风景稍不同，改木栈道为柏油路，路边紫色花穗不知名野花，远远望去，犹如薰衣草。紧跟着是鹿苑，鹿可以和孩子零距离接触，喂食玉米，几头鹿一起抢食孩子手里玉米粒，吓的娃娃们惊叫连连，鹿大都吃的溜光浑圆肥硕健壮，大抵是跑不快的，驯养的久了，鹿估计也忘了自己祖上是怎么生活的。

五大湖边上有双桅帆船，白帆在碧水上很醒目，可惜桅杆上挂了两串玉米，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水鸟变换队形飞过，起落不定，倒是鸟的乐园。



回去又坐小火车，有美女导游一路引导，看见鹿的几率是多大？神农架的特产功用？沼泽地的花期几许？几大湖的传说是什么……还给大家介绍了不要脸的树，杜仲，没有皮可以活。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杜仲木做的筷子，不发霉。下车咨询了帅哥导游，他迟疑了一下，说全国都想买，杜仲树就那么多，小哥的话说的无比真诚，懂了。

路边遇到烤玉米的当地女士，黧黑壮硕，叼着烟卷，熏得眯一只眼睛和大家说话，一边翻玉米，一边吐烟圈，煞是帅气。排队买几个玉米，回到车上分给大家尝一尝，热气腾腾的咬一口，烫牙齿。疲惫时候，吃点东西是莫大的享受。

驱车去板壁岩，近两个小时路程，下车发现很冷，不到十度，雾气中，十米左右雌雄不分，如果自己开车，不如在九大湖多呆一会。跟着导游上山，看看板壁岩，快速走到前面，增加运动量，路边随处可见“草丛有毒蛇”的字样，脚步又迟疑下来。

导游一路走一路不动声色地软广告，杜仲产品、一抹灵、当地的野生植物……可惜太冷，应答者寥寥。瞬间到了山下，有人问结束了吗？结束了。意犹未尽。瑟瑟发抖地上车，抱着娃取暖。

吃饭的时候，有一道菜是魔芋，除了辣没有别的味道，不好好做，糟蹋食材，本来是宣传土特产的好时机，尝了以后没了购买欲望，减肥这个标签也不行了。

#### 第四天 归途

神农架归来，一路上惊心动魄，在山与水之外，看到另外一个商丘，三天没见，变得有点陌生了。

早餐是在火车站内吃的，外边下雨，大家都不愿意出去，看着卖相不错的食物，味道却寡淡无奇。邻桌是两个穿青布长衫的女尼，要了素包和粥，进食前单手作揖，对食物感恩，念过才小口小口地进食，敬仰之心顿生。

雨刷刷地一直下，仿佛要洗净这一切的蒙尘，车里坐着闲聊或者小睡、发呆，间杂孩子的嬉戏，这临时密闭的空间有点小桃源的感觉。打破这一切的是火车没到站停了，铁轨冲坏了，抢修中，猜测顿起，接着商丘的各类水淹视频也出现了，雨下的

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买了车上最后一盒方便面，都没舍得吃，留给了小林，小子何能？一路上得大家守护，言传身教，受益颇多。想起买了馊汁酒，喝酒充饥，同路长者有趣者众多，找各种酒器，茶杯，茶杯盖子，吃过的饼干盒子也用了，每个人都喝了一点，引一车厢人垂涎。若论消遣时间，调侃心情，我只服在座的诸位。话题很广泛，关心粮食和土地，聊聊生计与民情……

四个小时后火车终于开动，虽然速度堪比散步，毕竟走着，走着就有希望！下火车，发现雨下的宛如不断线的珠子，公交车上挤满了人，但是没司机，出租车更是芳人无踪。偶尔挤到一家奶茶店门脸下，缩着肚子防止被雨淋到，老板娘来一嗓子：别挡着店门口。我赶紧往边上躲一躲。果然，灾难面前才见本性。

路人打水漂一样腾挪躲闪走在水浅地方，撑把伞犹如行走的莲，最后，还是决定了要回去，家门在望而不得入，抓心挠肝的。心一横，走就走吧，最高兴的莫过于小林同学，理直气壮的趟着水，玩得尽兴，从火车站到家一小时路程异常欢脱，颇有大家跟我走的势头。

我拖着行李箱，开始水多地方还提一提，后来气力不足干脆拉着水中漂，宛如行船，也就是这样吧！回头率很高，没有办法，如果不是同行长者等待鼓励，送伞，我和小林应该半路就放弃了。

回到家，一片漆黑，停电，倒头睡下，一枕黑甜到天亮。

今年，苦不得出，回忆度日，共享之。

作者简介：王琰，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随 想

□ 刘乡音

枯黄的叶 滔天的浪

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我望了又望

转身 只剩一地鸡毛

井底的蛙 囚禁的鸟

孤零零地走向死亡的战场

我忘了又忘

回首 只觉得自己渺小

在这寂寥的雨巷

于石阶之上

逆着落日低沉的光

眺望港口霓虹

看雨落个不止

看溪面一片烟

看薄雾笼罩了仲夏那个身影

你是否也和我一样

享受着片刻的梦幻

在这寂寥的雨巷

于凌晨两点

为你弹奏一曲肖邦

看月亮成为太白的勋章

慢慢 熄灭心口的那道月光

我饮下这杯月光

静静 抚平心底的忧伤

星空的顶端有宇宙

暗夜的尽头是黎明

想着——

和撑着油纸伞的你

赏一场日出

找回心底的那抹暖阳

从此 便不会再有彷徨

作者简介：刘乡音，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20 级学生



## ● 学术论坛 ●

## 论王泽题画诗

□ 陈功文



在清代嘉道文坛上，王泽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王泽（1759—1842），字润生，号子卿，安徽芜湖人。嘉庆六年辛酉（1801）进士，官至徐州知府。曾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清代著名画家，工画山水，精篆刻，笔墨古厚，遒劲洒脱。著有印作集《吮庵印草》二册，诗集《观斋集》十六卷等。

作为一名山水画家，王泽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清人蒋宝龄评价其绘画成就云：“子卿山水，余不多见，仅从吴玉松侍御处见其一帧，笔墨古厚，得廉州、思翁神髓，绝去町畦，卓然高手。陈云伯大令言可与左田尚书相埒，洵非虚语。”<sup>[1]126</sup> 蒋宝龄称其绘画得廉州（王鉴）、思翁（董其昌）神髓，为卓然高手。可见其绘画成就非寻常人可比。王泽

曾师从当时著名文人画家黄钺（字左田）。黄钺擅长绘画，其诗画通融，以画为诗。据《履园丛话》记载，黄钺“山水喜宗北苑”，其山水画“随笔点染，变化莫测，皆成绝妙”<sup>[2]207</sup>。黄钺不仅作画，而且还著有《二十四画品》，以诗论画，丰富了古代绘画理论，是研究中国画史的宝贵材料。作为师生，黄钺“与王子卿泽尤为契合，比邻而居，诗文书画时相往还。尝有句云：‘与子若米茗，一日缺不可。晨起意傍徨，相见乃帖妥。’师生至契，可谓艺林增色。”<sup>[1]125</sup> 李浚之也称王泽“与黄左田尚书，师生而兼姻戚，最相契合，绘有《合作联吟图》”<sup>[3]385</sup>。

王泽也是一位诗人，其生平所作诗收于《观斋集》中。虽是一位画家，但王泽的诗歌成就可圈可点。清人陈用光为《观斋集》作序称：“子卿诗之于宫保，如苏门之晁、张，读者当自得之。”<sup>[4]635</sup> 罗振玉也评价其诗云：“泽诗格律凝练，清而能腴，侯云松序称其性情真挚，故发为诗，振清华而不溷，蹊幽险而如夷；郭麐题诗有‘近日诗人如束笋，一夕风霜等朝菌，看君风格晚更高，肯逐春华与同尽’句，其倾倒如此。”<sup>[5]1321</sup> 王泽诗歌题材多样，众体兼备，内容丰富，风格，艺术成就高超，充分体现了清代嘉道时期的诗歌特色。

《观斋集》所收诗凡 906 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涉及题画诗、唱和诗、送别诗、山水纪游诗、

咏怀诗、写景咏物诗、歌行体叙事诗等。由于王泽是一名文人画家，不仅擅长作画，而且创作了大量题画诗。据统计，其《观斋集》中有213首题画诗，占其诗歌总数五分之一偏上。其题画诗或直接以“题画”命名，或另撰题目。就体裁而言，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歌行体，甚至还有少量的六绝，可谓各体兼备，丰富多样。就内容而言，其题画诗多从生活着手，内容涉及论画言理、山水风光、人物、花鸟、唱和等方面，题材可谓广泛。在创作时，王泽或就论画言理，或抒情寄慨，或描摹意境，或品评人物，均能阐发艺术旨趣，反映了清代嘉道年间文人题画诗的文化内容，代表了此时文人题画诗的创作水平，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 一、论画言理

#### （一）评论画作

作为一名文人画家，王泽既能作画，也懂得鉴赏，擅长论画，故其对别人作画之技法、风格，时时给予评价，最典型的莫过于《汤天池铁画歌》（卷一）：

绘画之事先考工，两汉石刻推文翁。图写圣贤类古拙，略具大意开群蒙。从来金石固一理，范铸当更艰磨砿。汤生技也近乎道，十三科具炉锤中。述者谓明作者圣，此事创见真豪雄。侔形象物出新意，造化在手天无功。我闻汤生得异授，太乙下视烘苍穹。遂令煨灶发光怪，役使群动生灵空。拔钉泥里皴有法，斧劈大小兼能通。文苏潇洒妙竹石，筌窠琐细工鱼虫。蛭蠕冉冉欲起蛰，夏击叶叶皆含风。乃知能事贵独绝，丹青易落纸易裂。蠹鱼不蚀鼠不啮，吁嗟汤生寿如铁。

汤天池，本名汤鹏，清江苏溧水人，侨寓芜湖，发明铁画技艺。据民国二年《芜湖县志》卷十五载：汤鹏“创意为铁画，施之灯幢，曲折匠心，颇得六法之妙。”<sup>[6]</sup>民国八年《芜湖县志》卷五十九《杂识·诗》载梁同书《铁画歌》之序称：“汤鹏，字天池，芜湖铁工也。能锻铁作画，兰竹草虫，无不入妙，尤工山水。大幅积岁月乃成，世罕得之，流传者径尺小景耳。以木范之，若屏障，或合四面以成一灯，亦名铁灯。炉锤之巧，前代所未有也。汤亡，

其法不传，今间有效之者，已失其真矣。”<sup>[7]</sup>汤鹏幼年在芜湖学习锻造，后发明铁画技艺，以锤代笔，以铁当墨，创作出很多精美的铁画艺术品，被奉为芜湖铁画之鼻祖。汤天池铁画受到了后世广泛赞誉，很多文人墨客对其铁画赞誉不绝。王泽之师黄钺也曾写诗称扬汤天池的铁画：“材美工聚物有尤，汤鹏之技古莫俦。”<sup>[8][110]</sup>对汤鹏铁画技艺与价值给予了高度赞扬。受老师影响，王泽也作诗高度赞扬汤天池的画技，认为汤天池作铁画，“技也近乎道”，显然是认为汤天池领悟到了作铁画的真谛，所以能胸罗万象，造化在手，故其所作铁画“侔形象物出新意”。随后，王泽不遗余力地描述了汤天池作铁画的技艺：“拔钉泥里皴有法，斧劈大小兼能通。文苏潇洒妙竹石，筌窠琐细工鱼虫。蛭蠕冉冉欲起蛰，夏击叶叶皆含风。”汤天池作铁画皴染得法，捶打皆通。画中竹、石皆得文与可、苏东坡画技之精妙，虫、鱼皆得黄筌、黄居寀父子画作之精工。虫豸缓缓欲动，枝叶婆娑含风，栩栩如生，情态逼真。诗的最后四句，不仅指出了汤天池之铁画易于长久保存，非纸画所能比；而且再一次高度概括了汤天池铁画的不朽价值。全诗叙议结合，娓娓道来，评画论技，生动形象。

王泽有一部分题画诗，善于将所评之画作与其他名画作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反映出诗人对画技之评价。如《黄季知（足民）大明湖图》（卷十）：

名齐杭颖有斯湖，游水飞云极望殊。自有鹊华秋色幅，不期明瑟见新图。

想见淋漓点笔时，全湖风景摄来奇。济南名士如相遇，莫谓风沦月倚辞。

黄足民，黄钺之子，也是王泽之婿。黄足民受其父之熏陶，能书善画，尤精花卉。其所画之大明湖，为济南著名名胜之一，风景秀丽，有“固江北之独胜”<sup>[9]</sup>之誉。此地湖光浩渺，山色遥连，景色宜人，堪悦心目。王泽为黄足民《大明湖图》所题第一首诗，并未直接对黄足民画作进行评价，而是先盛赞名齐杭州、颍州西湖，风景“极望殊”的大明湖，然后引出历史上有关大明湖的名画——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诗人认为，自从赵孟頫绘济南风景为

《鹊华秋色图》后，世人不愿再想看见其他有关大明湖的画作。显然，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让后人叹为观止。第二首诗，诗人才致力于评论黄足民之画，他认为：观黄足民之画，可以想见其作画时，淋漓点笔，便让大明湖美景尽收眼底，足见其绘画技艺之奇。如此奇图，若让济南名士看到，当不会再夸尹孝逸“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sup>[10]</sup>之句了。不难看出，诗人评画，起先并未直接就画论画，而是将黄足民之画与赵孟頫的名画《鹊华秋色图》进行比较，通过世人“不期明瑟见新图”与济南名士“莫翊风沦月倚辞”，让欣赏者领悟到黄足民《大明湖图》与赵孟頫《鹊华秋色图》一样，完全称得上是描绘大明湖风景的上乘画作。

王泽不仅喜于为他人画作题诗进行评论，有时也为自己的画作题诗，进而论及画技。如《为蒋秋吟编修（诗）作画因题》（卷九）：“石田沈先生，作画如作书。大气自盘旋，老笔能展舒。有明雄一代，慧灯与南车。文董且敛衽，纷纷况其余。君精于六法，卷轴身共居。示我石翁幅，珍重如璠玕。胡为嗜痂癖，搜罗竟及予。把笔先震慑，出手翻踟蹰。请君碎此纸，借沈挂我庐。坐卧下三日，灵气或发摅。再为事皴染，就君质如何。”诗人为蒋秋吟作画后题诗，开篇称赞了明代画家沈周高超的画技，认为其绘画可以称雄有明一代，是明代以后绘画的慧炬与指南车，即使像文征明、董其昌这些大家也对其十分恭敬，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然后叙写蒋秋吟得沈周之画后，找到诗人替之作画。最后，诗人交代了他怎样为蒋秋吟作画的。此诗既评价了前人沈周画作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画法，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 （二）就画言理

1. 禅机妙理，体悟人生。王泽有部分题画诗，充满禅机妙理，表现了诗人对佛道、人生的理解。如《俞小山明府启桂松山访道图》（卷五）：“万松化作云气青，石室不许仙人扃。偶然游戏大自在，自有真我非寓形。……口哦五言大自在，结习未净诗根因。寻山幸有凌霄翮，境界清凉原不隔。梦耶非梦醒非醒，我亦罗浮未归客。”诗歌一、二两句，

刻画了一个充满禅趣的禅境，为下文书写禅理埋伏笔。三、四两句，接连用了“大自在”与“真我”两个佛教用语，阐明了即使偶然进入进退无碍、心离烦恼的“大自在”境界，也是真正的我，而非托体，意在表明对所访之道的虔诚。“口哦”两句，说明了在访道途中，因结习未尽之故，不自觉地吟诵与“大自在”相关的诗句。“大自在”的反复出现，让诗歌禅味十足。诗歌最后，诗人又浓墨重彩地提出：“梦耶非梦醒非醒，我亦罗浮未归客。”既富含禅意，又点出自己得心志，可谓是以诗明志，理由笔生。再如《蒲团拂尘图》（卷五）收有两首诗，第一首诗，诗人以颇富禅趣之语“空诸行识缘，还我光明性”开端，并认为此“是谓大智慧，得此真清净”。全诗不仅富含禅理，而且也表明了诗人对道家清净世界的向往。第二首诗，同样以颇富禅趣之语“心常有天游，脚不向尘插”开端。诗的后两句“世间可怜虫，为说无生法”，“无生法”为佛教用语，佛家认为生即是苦，若要永离一切苦，只有不生，故佛家主张“无生法”。诗人认为此是可怜虫，反映了他反对佛家“无生”之说。反对“无生”，其实就是主张“贵生”。《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道家以生命为贵，主张返朴归真，顺应自然。全诗富含理趣，表达了诗人向往清净的自然，追求生命境界的志向。

2. 体物写志，富含理趣。《观斋集》中部分题画诗，虽为论画，却含理趣，体现了诗人对所画之物的理解与感悟。如《过紫云山房听曹静斋汝渊弹琴归作听琴图以赠并题》（卷一）：“妙音满耳尚泠泠，非指非弦悟性灵。我亦于今得琴趣，请君试向笔端听。”此诗前两句抒写诗人聆听琴音的感受：诗人满耳听到的是清越超妙、高雅平和的琴音，但他却认为如此动听的琴音，与指法、琴弦无关，而是与弹琴者对音乐的妙悟以及对性灵的觉悟相关。这种无关于琴技、演奏就能妙悟琴音，古人称之为琴趣，且所谓之琴趣与陶渊明相关。《东林十八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陶潜传》云：“（陶潜）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扣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sup>[11]</sup>



陶渊明是否“性不解音”，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而文中所云“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则说明了陶渊明抚琴所追求的不是弦上之音。唐代李白在《赠临洛县令皓弟》中云：“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音。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sup>[12]</sup>李白认为，陶渊明抚奏无弦琴，看重的是“大音自成曲”，此与老子所云“大音希声”，有异曲同工之妙。《东林十八高贤传》所谓之琴趣，实则充满理趣，这是一种琴声难以表达的弦外之趣。这种琴音，当为天籟之音，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最上等音乐。由此可见，王泽称曹汝渊抚琴，“妙音满耳尚泠泠，非指非弦悟性灵”，显然是对曹汝渊的琴技给予很高评价。诗的后两句回归画作，点出诗人已经悟出蕴涵于其中的理趣，并在作画时将之表现出来，希望观者能够品味。

《为张船山吉士问陶画天半怀人图》（卷一）：“层云生处荡胸时，咳唾风中珠玉随。怪我笔端奇气少，画来毕竟不如诗。”关于诗与画关系问题，唐宋以来一直有争论，唐张彦远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sup>[13]</sup>宋张舜民认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sup>[14]</sup>金人元好问既承认“画与诗同宗”<sup>[15]229</sup>（《许道宁寒溪古木图》），又说“晚晴一赋画不成”<sup>[15]253</sup>（《泛舟大明湖》）。可见，在对诗与画关系的认识上，古人看法不一。学者钱钟书认为：“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他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sup>[16]</sup>由于诗与画各具特殊性，“诗是语言来写事描物，不受物质的限制，所以能更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它既能状物，又可细腻地描写人的感情。绘画则不同，它反映社会生活的物质手段是色彩和线条，就不如语言灵活了。绘画是视觉艺术，它必须把一切都化为可见的东西。这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sup>[17]</sup>正因为如此，王泽才有“画来毕竟不如诗”之感慨。这种感慨，反映了王泽对诗、画关系的理解，充满理趣。

3. 喻中寓理，形象生动。《观斋集》中有少数题画诗，善于通过巧妙地比喻，以达到说理之目的。如《课耕图》（卷十）其二：“种德从来似种苗，

心田方寸自培浇。”种苗需要在农田中用心耕作，种德需要在心田中用心培育。诗人以种苗喻种德，阐明种德需要用心耕耘心田的道理。诗句比喻贴切，形象生动，于浅显之中蕴涵深刻的道理。

## 二、抒情寄慨

王泽善于在题画诗中抒情寄慨。其题画诗中所蕴涵的情感是丰富的，主要表现为思乡归隐与送别怀人之情。

### （一）抒发浓烈的思乡归隐之情

王泽因常年在外做官、担任教职，萌生思乡之情在所难免。另外，由前文所述可知，王泽向往道家清静世界，向往神仙生活，不难发现其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则其时时萌生归隐之情，当不难理解。其题画诗常常因画卷之风景而触景怀乡，思乡归隐之情溢于言表。如《钱菽菴吉士人杰读书图》（卷七）：“蓬莱寓言耳，仙境在人间。清露新桐院，春风垂柳湾。补笏欢白发，散帙对青山。我亦家江上，何时打桨还。”再如《张孝廉公播诗舸图》（卷九）：“凉波渺无际，浮去一吴船。摇梦呕呀舻，催诗酩酊天。吟声飘雁外，闲性落鸥边。揽我江湖思，何时打桨旋。”二诗均是借写景而抒发怀乡之情的。王泽故乡芜湖是江南水乡，也是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诗人于眼前的山水之画而联想起故乡，进而萌生打桨还乡之愿望。再如《题画》（卷一）：“芦荻萧萧木叶飞，上矶紫蟹带霜肥。何时重理秋江棹，细数征鸿一一归。”秋天到了，芦荻萧疏，树叶纷飞，寒意逼人，此时上矶（故乡）的紫蟹正值鲜美肥硕之时，十分诱人，让人怀念。诗人急切地想回归故乡，泛舟江上，捕捞肥蟹，但返乡难定，归期难料，只能借一遍遍细数征鸿归来烘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也有部分题画诗所表达的思乡之情是委婉的。如《在轩梅屋图》（卷八）：“前湖亭子后湖菴（芜湖镜湖前有溪山好处亭，后有三昧菴、铁佛寺，梅最好），乱插横斜载酒堪。正是花时出门去，却从画里忆江南。”作者虽是凭借记忆描摹了故乡芜湖镜湖的风景，但画作中熟悉的风景情不自禁地引起诗人的乡思，此时见画如见故乡，思乡之情不言而喻。由于自己常年做官在外，年终梅花开放时节却

不能归去，只好借画作慰藉自己的思乡之情。

## （二）抒发深切的送别怀人之情

### 1. 送友归去，盼其早回

《题画送梁蓬山同年云五南归》（卷三）：

好江山处有斯人，十一年来交最真。浩落胸怀难束缚，肯将螺翠换红尘。

风雪燕山又一年，犯寒长路著吟鞭。扬州正及梅花发，笛里新腔让尔颠。

掉头归去敝裘宽，不怕崎岖行路难。一半柔情抛不得，有人忆远画消寒。

繇词吉语欲成痴，唐濬观人不我欺。一叶扁舟渡江易，明年来早慰相思。

梁云五，号蓬山，安徽当涂人，清嘉庆己巳科（1809）进士，擅书法。这是一组送别诗，凡四首。诗人采取铺陈的手法，先从十一年前二人相交写起，不仅道出了二人至真的情谊，也刻画了梁云五浩落胸怀。然后选取梁云五回扬州、掉头归去等场面描写，刻画了梁云五的性格特征。诗歌最后又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好友来年早回，以慰藉二人的相思之苦。全诗层层推进，融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为一体，情致深婉。诗人善于在叙述、描写中刻画情境，在情境之中描写景物，景有虚景，也有实景，虚实相间，景皆生情，既增强了情感的形象性，又加深了景物的感情色彩。

### 2. 送友归去，愿随友往

《题画送家竹屿南归》（卷五）：“著个林园白鹭洲，门前十月系归舟。明年我亦风帆落，认得君家江上楼。”王竹屿（1776—1834），名凤生，徽州婺源人。诗人送王凤生南归，希望王凤生在南归后能建造一处风景名胜，将来自己归隐时，也能识得去处，表达了兄弟之间的惜别之情。全诗直抒胸臆，语浅情深。再如《题画送陈因之明府受培还宣城》（卷五）其二：“清溪一水玉湾环，官阁鸣琴对好山。却愿天风吹我去，敬亭深处作云间。”陈受培，字董庵，一字因之，曾任宣城知县。敬亭，乃宣城名山敬亭山。诗人送陈受培回宣城，诗歌前两句极写宣城山水美景，以表达山水娱人之情。后两句以自愿弃官归隐敬亭山，远离尘世，寄情山水

作结，抒发了诗人甘愿追随好友而去的情谊。全诗语言精炼，情景交融，景中含情，意境浑整，意象绵渺。

### 3. 留别之际，劝慰好友

《观斋集》中还有一首题画留别诗。《题画留别周最峰上舍（德隆）》（卷一）：“别君归去莫相思，且醉丰台花万枝。五月到门瓜蔓水，是余江上识舟时。”周最峰，名德隆，是王泽同乡，安徽芜湖人，曾任安徽广德县训导，与王泽为好友。诗人题画赠诗留别周最峰，首先告诉他不要在自己离开后独自相思，可以去观赏丰台名花以慰相思。后两句分别化用了《宋史·河渠志一》“五月瓜实延蔓，谓之瓜蔓水”以及谢朓“天际识归舟”之句，意在告知周最峰，自己五月就会归来，请其不必相思。全诗用典贴切，语句风趣，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情谊。

### 4. 友人未归，深切思念

《观斋集》中，有不少题画诗是为了怀人而作的。王泽的怀人题画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中明确指出思念的对象，另一类并未指明所思的对象。不管是哪一类，诗中都表现出深切的思念之情。先看第一类，如《题画寄耕馀文学》（卷十五）：“青山已绿水拖蓝，我所思兮在汉南。几度识舟亭上望，写图便面当书函。”耕馀文学，即清代嘉道年间的许仁，字静夫，号耕馀，安徽歙县人，在芜湖经商。此诗当写于许仁某次离开芜湖，诗人盼其归来之际。此时春天已回归，青山已变绿，江水绿如蓝，但好友离去却一直未回。诗人为迎接好友归来，曾几度登上江边识舟亭，但每次都失望告终。不得已，诗人写图便面，当作书函，遥寄思念之情。便面，指折扇。这是一首在扇面上的题画诗。识舟亭之名，源自南齐诗人谢朓“天际识归舟”之句。识舟亭是芜湖著名的游览胜地，地处江滨。诗人借用识舟亭之典，表达了自己对好友许耕馀的殷切思念之情。此诗开头以起兴的手法引出思念对象，后两句点明了自己因思念而登亭远眺，不见友人归来，便又题扇远寄好友，以慰藉相思之苦。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浑朴自然，虽无华丽的辞藻，但发自肺腑的真情自

然流贯。

再看第二类，如《题画》（卷二）：

斑斑竹间雨，渺渺溪上波。怀人在天末，凉风秋若何。

山云淡已无，木叶疏欲脱。之子意如何，相思秋水阔。

这两首题画诗都未明确交代所思念的对象，只是借萧瑟的秋景来渲染对他人的深切思念。诗人所思念的对象，或是友人，或是恋人，但不管怎么说，其中所蕴含的相思之情都是绵长的。两首诗前两句都描写刻画了秋天的景物，后两句都是借物以起兴，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的思念之情。诗人善于通过环境、景物的渲染，表达其悠悠情思。诗歌情景交融，真切自然，在景物描写中渗透真挚的情感，在抒情议论中展现画面，情景交融，情韵醇厚。

### 三、描摹意境

#### （一）描摹自然风光，援画境入诗境

如《渡峰河》（卷一）：“远山一角雾尤含，清浅溪纹画可参。水鸟拍波舟泛泛，几丛疏柳似江南。”作者以画家的视角，运用了山水画中写意、勾勒的手法，描写景物从远处着笔，将远山、近景融为一体。作者选取了一组富有典型特征的景物：远山含雾，近水清浅，水鸟掠波，浮舟泛泛，几丛疏柳，随意勾画，一片清雅疏淡的湖光山色便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如画的江南。作者写景入妙，并由眼前的景物即景发兴，使得全诗情景交融，情由景生，发挥出无尽的诗意。这样的诗句，深得盛唐山水诗的神韵。再如《题画》（卷十一）：“枫染秋千树，芦吟风一汀。好山遮不住，露出数峰青。”此诗寥寥数笔，便将深秋山水风光渲染而出。诗人所描绘的是一幅省净明丽、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意境。虽然深秋枫染层林，秋风吹老了水边芦花，但深山辽阔，还是露出了几座山峰，苍翠迷人。全诗写景幽美，却也俏皮，充满了情趣。

王泽描摹自然风光的题画诗有时并非纯粹描绘自然风光，也涉及对人物的描写。如《题画》（卷二）：“山云犹恋山，好风吹不去。萦纡出山泉，潺潺夜达曙。眷言幽棲人，石室冥百虑。心琴内自抚，玉

水肥可饫。时与飞仙游，谈玄最深处。”此诗既描绘了深山的风景，也刻画了山中隐居之人，展现了一幅幽静的深山隐居图：山深而云不去，山泉潺潺，终日不歇。回顾山中的隐居之人，此时正在石室之中冥思苦想，修炼心性，自抚心弦，茶水可以疗饥，常与仙人云游深山，并在深山最深处论道。此诗语言平易、通俗，不显斧凿之痕。诗歌娓娓道来，浑然成篇，意境浑整。其中“心琴内自抚”平中见奇，与清幽的环境相映成趣。全诗有虚有实，虚实相间，蕴意幽邃，颇能启人逸思。

#### （二）题咏花草，情由境生

《观斋集》题花草画之诗，或描绘花草形态，或写其品格。所抒发的情感忽强忽弱，但皆因景抒情，情景交融。如组诗《题江坚甫明经（玉）花卉册十二首》（卷五）之十二《梅》：“从来花无此格，横斜乱插俱好。莫谓西湖处士，清诗可以压倒。”江玉，字子玉，号兼浦，安徽歙县人，嘉庆五年（1800）进士。著名文人黄钺弟子。江玉善画花鸟，“笔意清拔，傅色浓沉，于恽氏外别树一帜。”<sup>[18]</sup>王泽此诗针对江玉所画梅花进行评鉴赏析：诗的前两句着力称扬梅花的品格，议论、抒情味十足。后两句化用苏轼《和秦太虚梅花》“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之句。西湖处士指北宋诗人林逋，其人一生以鹤、梅为伴，有“梅妻鹤子”之称。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乃描写梅花之千古名句，为后人一直称颂，连苏东坡也曾夸林逋，称：“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书林逋诗后》）后来，苏东坡在读到秦观的《梅花》诗后，认为秦观此诗超过了林逋，故有“压倒”之句。王泽在为江玉《梅花图》题诗时，因画境有感而发，并化用苏轼之句，表明咏梅花的清诗也能超过林逋之诗，其用意是在赞美江玉画中之梅花。王泽此诗重议论、抒情，但议论、抒情皆因画境而生，情理交融。

再如此组诗之一《紫藤》：“天作绿云弥漫，檐垂紫玉玲珑。不必花时亦好，清荫可当凉蓬。”此诗前两句描写了紫藤叶、花铺在檐架上的形态，后两句进行议论，即使不是花期，紫藤也可当作凉

蓬，给人们遮阴。此诗虽以描写为主，但后两句议论之中蕴含了诗人赞美之情。王泽《观斋集》还有一首以“藤”为题的诗：“一架当门压，人衣翠欲侵。垂垂花预想，举举叶交森。疏雨生秋早，凉云覆午深。遥思当夏日，有此满庭阴。”（卷一《过周邕原上舍（德昭）寓斋所见各题一诗》之一《藤》）此诗前四句着重写门前架上之藤的形态，藤花垂落，藤叶上举，一片青翠茂盛的样子。七、八两句是由眼前之景而产生的联想。诗人因“疏雨生秋早，凉云覆午深”，而想到夏日满架的藤叶也会给庭院遮阴，带来凉爽。此诗与前《紫藤》诗在写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也重在描写景物，诗末见景生情，熨帖自然。

#### 四、品评人物

##### （一）品评学子形象

王泽题画诗中有一部分署名《读书图》的作品，主要描写了一群读书人，针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或学习情况进行了评价。这样的诗歌多为叙议结合，通过议论，表达出自己鲜明的观点。如《胡竹村孝廉培翠紫阳山堂读书图（并引）》（卷十）其一云：“朱子读书处，好山名紫阳。曾看旧时月，来谒大贤堂。（紫阳山堂有朱子所书“旧时山月”扁。）得识研经士，能令晦学彰。（君所著《仪礼宫室编目》《燕寝图考》《仪礼补疏》，能发前人所未发。）岩阿安久在，华国蔚文章。”胡培翠（1782—1849），字竹村，安徽绩溪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清代著名的礼学家，著有《仪礼正义》《燕寝考》《禘祫问答》等礼学专著。王泽此诗前有一段题序：“嘉庆庚午，予主讲紫阳时，得识竹村。胡君经学精研，文章瑰玮，是科果以乡举，入都连蹶礼闱，而著书益富。兹束装将归，乞为此图，予因念朱子曾读书于此，其后所到之地，皆颜曰‘紫阳山堂’。此图之作，亦绍述前贤意也。”由题序知，胡培翠在徽州紫阳书院读书时，王泽任紫阳书院山长。紫阳书院也曾经是朱熹读书的地方。王泽这首诗歌的前四句即介绍朱熹曾在紫阳书院读书及后世学子来此求学情况。后四句通过议论集中评价了胡培翠《仪礼》学研究成就及其《仪礼》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全诗夹叙夹议，叙述与议论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再如《张子白进士若采梅屋读书图》（卷一）：“张侯雅豪饮，倒甕无算爵。醉经亦如酒，万卷情慷托。虚堂道所集，冲漠忘六凿。抱书正经坐，人影瘦于鹤。寒香绕屋流，古雪满庭落。酝酿吐新诗，字字清可嚼。江南风有信，老树花定著。我欲问东家，沈夜动春酌。”张若采（1763—？），字谷漪，号子白，江苏松江府娄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这是一首五言古诗，诗歌前四句刻画出了张若采既善饮酒，又喜读经，嗜经如嗜酒的读书人形象。接下来四句，详细地描述了张若采独处寂静的空堂专心读书，达到了废寝忘食、影单形瘦的地步。又四句，先对张若采读书的环境进行描写，以不俗的环境来衬托其诗歌创作。最后四句展开议论。诗人相信张若采通过刻苦读书，定能学有所成，考中功名，并做好了为其庆祝的准备。全诗叙事、写景、议论相结合，含蓄蕴藉，自然贴切。人物描写形象生动。

##### 2. 品评隐者形象

《邵友园丈士燮荒江老屋图》（卷二）：“此生甘作五湖民，甫里疏慵栗里贫。卷轴纵横支散屋，江天空阔寄闲身。世间留得癯仙样，画社推为鼻祖人。白发青灯娱独夜，是能潇洒是清真。”据蒋宝龄撰《墨林今话》记载：“邵士燮，字友园，号范村，又号桑枣园丁，芜湖诸生。工诗，善分隶篆刻，尤嗜画。尝自写《荒江老屋图》以寄意，题者比之瓜畴居士。”<sup>[1]190</sup>此诗乃为邵士燮《荒江老屋图》画作而题。这是一首七言律诗，首联即点出邵士燮不愿为官，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的品格。其中“甫里疏慵栗里贫”一句，分别用到唐陆龟蒙与东晋陶渊明的典故。陆龟蒙（？—881），字鲁望，别号甫里先生，江苏吴县（甫里）人。有《甫里集》。其《南泾渔父》一诗有“予方任疏慵”句。栗里，地处江西九江市南陶村西。因陶渊明曾居住于此，且甘守清贫，故有“栗里贫”之说。颈联紧承首联，不仅指出了老屋的荒凉，江天的空阔，而且再一次点明了邵士燮淡泊名利的性格，并生动地刻画了一位隐者的形象。颔联“世间留得癯仙样”承接上联“江

天空阔寄闲身”而来，由于“寄闲身”，故而给世人留下隐居者的形象。后一句笔锋一转，指出了作为隐者的邵士燮画技高超。尾联又一次刻划了邵士燮甘守清贫，自得其乐的隐者形象。

### 结 语

“清代为画题诗之风尤盛，一幅好画，倘无题诗，当引为憾事。……到了晚清，很多诗人、画家，更是诗、书、画、印兼擅，于是无画不题诗已成风气”<sup>[19]</sup>。尽管诗与画“合之为双美，离之也可独行于世”，但在清代，“文人以画为史，意在传人，以诗文为史与以画为史相辅相成，成就了清代诗与画的新境界”<sup>[20]</sup>。清代的题画诗是中国古代题画诗的杰出代表，不仅涌现出众多的题画诗作者，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极具艺术价值的题画诗篇。在众多的题画诗作者中，王泽颇具特色，他既擅长作画，又善于在画作上题诗。其题画诗，无论是对画作内容作细致的描述，还是借画作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还是对画作主人公形象进行品评，都能做到诗画交融，传神肖貌。王泽题画诗继承了传统题画诗的优秀充分，体现了清代题画诗的时代特征，多从生活着手，多方面展现了清代嘉道年间的时代风貌。王泽题画诗艺术手法多样，语言清新自然含蓄，情景交融，意境浑融，刻划形象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陈功文，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参考文献：

- [1] 蒋宝龄. 墨林今话 [M]. 程青岳批注. 李保民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 钱泳. 履园丛话 [M]. 孟裴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3] 李浚之. 清画家诗史(己下) [M]. 周骏富辑. 清代传记丛刊(76). 台北: 明文书局印行, 1986.
- [4] 陈用光. 太乙舟文集 [M]. 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5] 罗振玉. 雪堂类稿戊 长物簿录(3)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6] 梁启让. 芜湖县志 [M]. 民国二年(1913)活字本.
- [7] 余谊密. 芜湖县志 [M]. 民国八年(1919)石印本.
- [8] 黄钺. 壹斋集 [M]. 陈育德, 凤文学校点.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 [9] 毛承霖. 历城县志 [M]. 民国十五年(1936)刻本.
- [10] 《酉阳杂俎》卷十二载: “历城房家园, 齐博陵君豹之山池, 其中杂树森竦, 泉石崇邃, 历中祗褻之胜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 公曰: ‘何为伤吾风条?’ 自后人不复敢折。公语参军尹孝逸曰: ‘昔季伦金谷山泉, 何必逾此?’ 孝逸对曰: ‘曾诣洛西, 游其故所, 彼此相方, 诚如明教。’ 孝逸常欲还邺, 词人暂宿于此, 逸为诗曰: ‘风沦历城水, 月倚华山树。’ 时人以此两句, 比谢灵运池塘十字也。”可见, 尹孝逸“风沦历城水, 月倚华山树”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禽”一样, 是描写济南(历城)风景中最为流行的诗句。
- [11] 佚名. 东林十八高贤传 [M].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 [12] 詹镛.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3)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1405.
- [13]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卷一 [M]. 丛书集成初编本.
- [14] 张舜民. 画墁集: 卷一 [M]. 丛书集成初编本.
- [15] 施国祁注. 麦朝枢校. 元遗山诗集笺注: 卷四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16] 钱钟书: 中国诗与中国画 [A]. 七缀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7.
- [17] 朱恩彬. 生活·心灵·艺术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 [18] 潘天寿. 中国绘画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247.
- [19] 刘继才. 中国题画诗发展史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 402.
- [20] 蓝士英. 乾嘉文人之精神象形——以赵怀玉题画诗为例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 章学诚与汪中交恶始末探析

□ 张富林



章学诚是清乾嘉时期重要的史学家、文史理论批评家，其一生以校讎文史、臧否学林为己任，对同时代的名贤多有批判。胡适曾深有感触地指出：“先生对于同时的三个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sup>[1]</sup>汪中是与章学诚并时的负有盛名的文学家与史学家，二人之间的争执与驳难成为了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二人因何而交恶，交恶又始于何时，章氏对汪中及其学术思想又是如何大加挞伐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既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二人之间争端的个中缘由，又能厘清二人学术内在理路的异同。笔者不揣谫陋，在开展相关阅读与研究过程中，对章、汪的交往时间、交恶因由，以及章氏对汪中及其重要著述《述学》的批评等内容加以梳理总结，以期揭橥二人交恶始末，明辨真伪。

## 一、章学诚与汪中交往考述

据文献可知，章学诚与汪中有过三次共事的经

历。第一次是两人就朱筠安徽学幕时，初识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冬。据胡适《章实斋年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条载：“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八日，与先生及邵晋涵、张凤翔、徐瀚、莫与俦等，联车十二乘，离京。……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sup>[2]</sup>另据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条记载：“冬，（汪中）谒郑赞善虎文于秀水。郑赞善《与朱学使筠书》云：‘汪秀才某携其所著访虎文于鸳水……’又云：‘闻沈使君颇有继见之愿，且云足下曾劝仍留故步，即文亦以此策为宜。汪生则以为所入脩脯菽水不给，用是谢去。今以无所遇而复就，不如其毋辞矣。’”<sup>[3]</sup>由此可见，是年冬，郑虎文应作书荐汪中于朱筠，且汪中宜有当涂之行，年谱于是年条目下标明“在当涂朱学使筠幕”<sup>[4]</sup>，可为明证。钱穆亦指出：“实斋、容甫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游皖。”<sup>[5]</sup>当代学者尚小明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中亦指出：“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朱筠出任安徽学政，章学诚应邀前往安徽太平校文。”<sup>[6]</sup>又云：“汪中一生大部分时候过着贫困生活，以游幕为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在安徽太平知府沈业富幕。次年冬，转入学政朱筠幕。”<sup>[7]</sup>综上可知，两人应于是年冬初次相会于安徽朱筠幕府。又据《章实斋年谱》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条记载：“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过会稽。秋，又在太平。……岁杪，先生又返回会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sup>[8]</sup>由此可见，章学诚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1772年)岁末离开太平,至此,章、汪两人的第一次共事时间宣告结束。

章、汪二人第二次短暂会面是在冯廷丞幕府。据《章实斋年谱》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条记载:“秋,与金友莲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钜浸,晓浮鸢脰湖,过嘉兴至杭州,应浙江乡试,不中。过会稽,抵宁波。……遂在道署度冬。”<sup>[9]</sup>而汪中于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年在冯廷丞幕任掌书记,《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条载:“秋在朱学使幕。……朱学使荐先君子于冯兵备廷丞。”<sup>[10]</sup>尚小明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中亦指出:“三十八年(1773)冬,朱筠卸任,恐汪中穷困以死,遂修书一封,荐其入浙江宁绍道台冯廷丞幕。”<sup>[11]</sup>《汪容甫年谱》三十九年甲午条又载:“冬,往宁波依冯兵备廷丞。”<sup>[12]</sup>乾隆四十年乙未条载:“冯兵备官宁绍台道,先君在幕府。寻调台湾道,先君以母病不能偕往。”<sup>[13]</sup>《章实斋年谱》乾隆四十年乙未条亦载道:“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sup>[14]</sup>因此,二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冬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春在冯廷丞幕有过短时交集。

章、汪二人第三次重逢是在武昌毕沅幕府。《章实斋年谱》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条记载:“今年有《与邵二云论学》一书,云:‘……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阳馆未成,制府(毕沅)即令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于仆计亦较便也。’”<sup>[15]</sup>章学诚应湖广总督毕沅之邀,到武昌继续主持编纂《史籍考》,由上可知,章学诚三月始抵武昌。另据《章实斋年谱》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条载:“是年八月,毕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被议,降补山东巡抚。……毕沅既去,先生亦离湖北。”<sup>[16]</sup>毕沅因受湖北邪教案牵连,降补山东巡抚,失去毕沅的佑护和支持,章学诚于是年亦离开湖北返回故里。《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条载:“是年,游武昌,时尚书开府湖北,礼延先君。”<sup>[17]</sup>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条载:“夏,自武昌归里。”<sup>[18]</sup>由上可知,汪中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游武昌,入毕沅幕,次年夏自武昌归里。综上,二人第三次重逢时间应该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至是年夏。

## 二、章学诚对汪中的批评及初始交恶

由上可知,章学诚与汪中曾有过三次共事的经历,二人因何而交恶,交恶又起于何时呢?最早见于章学诚对汪中的批评文字,是章、汪二人第三次在毕沅幕府共事前两年,章氏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给邵晋涵的一封信中写道:“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缁,身无体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惭,亦以慨也。”<sup>[19]</sup>章学诚对汪中“阴用其言,阳更其貌”的剿袭做法深恶痛绝,于此无情地进行了揭批。作为并时的史学家,章、汪二人的学术思想确有很多相类的地方,我们可以从章氏的《文史通义》《校讎通义》与汪中的著述比较中,不难发现,二人论述契合之处,可谓俯拾皆是。一些学者认为汪中的思想与章氏“造车合辙”,从而得出“汪氏之说得之章氏”之论,晚清学者谭献与近代史家刘咸炘均主此说。钱穆也表达过同样看法:“据此则容甫《述学》之所拟议,大体可见。其说与实斋《文史》《校讎》两通义所论,古者官师流变,政学分合,意见殆相近似。”<sup>[20]</sup>

清代乾嘉时期盛行考据学风,由此带来的诗赋骈言创作亦臻极工。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学诚在写给他的学生沈枫墀的一封信中指出:“比见今之杰者,多偏于学文,则诗赋骈言亦极其工。”<sup>[21]</sup>不仅与章学诚同僚的幕府同仁,诸如洪亮吉、汪中、邵晋涵、孙星衍、汪辉祖等人,而且包括像毕沅这样的幕主,均亦擅长辞章骈文创作。谢无量认为汪中与洪亮吉之骈文代表了清代骈文最高水平,无出其右,故其赞誉曰:“综观清代骈体,或无出汪、洪之右者。”<sup>[22]</sup>因此像汪中这样的骈文高手,往往会得到幕主的优待,江藩在《汪中》传中曾记载道:“毕尚书开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台铭》,甫脱稿,好事者争写传诵。其文章为人所重如此。”<sup>[23]</sup>而章学诚却极力反对趋时迎俗,他在《沈枫墀论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勉强为之,固已不若人矣;世人誉之,则沾沾自喜,世人毁之则戚戚以忧,而不知

天质之良，日已远矣。夫风气所在，毁誉随之，得失之非，岂有定哉！”<sup>[24]</sup>章氏为学坚持立言有本，力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提出考据、辞章与义理三者相结合的治学主张。他在《与朱少白论文》中说：“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偏废也。”<sup>[25]</sup>由此可以看出，章、汪二人在性格特征、学术理想与治学路径上存在很大不同。当代学人袁宪泼在《章学诚的〈诗〉学解释学建构》一文中指出“章学诚一生论学……反对追逐时风，走出一条异于时俗的学术路数。”<sup>[26]</sup>黎爱在比较了袁枚、章学诚与并时学人不同后认为：“与同时代人相比，袁、章之识高出旁人的地方更表现在不随风气为转移的独立精神，旁人追求时髦、倾轧争胜，他们却能坚守自我，窥学问之全貌。他们思想的高度也助成了人格的高度。”<sup>[27]</sup>为此，章氏对汪中这样以辞章骈言见长且媚俗趋时的学人颇有微词，其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秋冬时给儿子贻选的一封信中鄙视地说：“每见江湖游客，趋奉贵人，但探贵人意指所向，附会文饰，以博其欢，稍自好者，皆知鄙之。彼之附会文饰，岂必关于利害得失。人鄙之者，以谓巧令从人，不可以自立也。今人不解属辞，欲附会以饰色，岂不与彼一例，可不诫欤？”<sup>[28]</sup>

由上可知，虽然在第三次武昌会面之前，章、汪二人也有些争执与矛盾，但还没使两人走向交恶的地步。关于二人交恶的时间、地点及缘起，我们可以从乾隆五十六年（1791）章学诚写给朱筠次子朱少白的一封短信中一窥端倪，信中写道：

近见之于湖湘间，与之款谈，一妄人耳！文既逊于往日，言大而不知惭，切而按之，枵然空落而无所有。此人非不用功者也，有才无识，不善用其长，激以名心，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气多而志不逊也。……夫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许年之功力，不但无进，而反有逊者，傲与慢也。<sup>[29]</sup>

“近见之于湖湘间”，应是二人的第三次重逢，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两人相逢于毕沅的武昌幕府。较之前两次，这次重逢章学诚对汪中的态度

急转直下，代之而起的是谩骂批评，如直斥汪中为“妄人”，说他“有才无识”，名利心极重，文章“逊于往日”，学问更是“枵然空落而无所有”。二人交恶由此始，究其原因，应有以下两点：

其一，汪中性格上的“傲与慢”。造成章、汪二人交恶的关键因素就是汪中的傲慢态度，这也可以从同为两人好友的洪亮吉写给章学诚的一首诗中一探究竟。洪氏曾作《有入都者偶占五篇寄友》组诗，其中有《章进士学诚》一诗，诗中写道：

仪征有汪中，此事亦绝伦。藐视六合间，高论无一人。前者数百言，并致洪与孙。勸其肆才力，无徒嗜梁陈。我时感生言，一一以质君。君托左耳聋，高语亦不闻。（君与汪论最不合）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sup>[30]</sup>

这首诗是洪亮吉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带着友好的态度客观地来看待章、汪之间分歧的，认为两人不合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汪中“藐视六合间，高论无一人”，睥睨千古，傲视学人，这已充分暴露出汪中傲慢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二人的文章旨意与学术追求明显不同，“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章重在严谨，而汪崇尚情真，二人可谓大异其趣。

其二，汪中“有才无识”。章、汪第三次武昌会面时，章学诚业已五十三岁，而汪中四十七岁，两人的学术建构基本完成。对章学诚而言，尤其是武昌会面的前两年创获甚多，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跋戊申秋课》记载：“起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辞一十三篇。……性命之文，尽于《通义》一书，今秋所作，又得十篇，月编专卷。”<sup>[31]</sup>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姑孰夏课乙编小引》亦载：“起四月十二，讫五月初八，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sup>[32]</sup>由此可知，《文史通义》虽未最终完成，但写作也是臻至佳境，思考更加深入。就汪中而言，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一系列重要论文业已完成，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撰《述学》，并表示其志就在于《述学》一书。因此，武昌会面时，二人的学术造诣与前两次不可同日而语。在议论中，章氏认为汪中学问全不得要



领，立言不能宗本，真得是“有才无识”，“有才”是指汪中的辞章才能，“无识”是指汪中的学问没有根底，无本可宗。章氏在汪中去世后四年写的《立言有本》中亦云：“江都汪容甫，工辞章而优于辞命，苟善成之，则渊源非无所自。……无如其人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sup>[33]</sup>

正是因为武昌幕府的会面，汪氏的傲慢态度成了二人交恶的催化剂和导火索，最终导致章学诚对汪中的猛烈批评与无情直斥。诚如钱穆所云：“其后容甫客游武昌，实斋亦至，乃成隙末。……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于实斋者。”<sup>[34]</sup>

### 三、章学诚对汪中文集《述学》的批评

嘉庆三年（1798），即汪中去世后四年，章学诚又撰写《立言有本》《〈述学〉驳文》两篇学术论文，重点围绕汪中的文集《述学》展开集中批评，概其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章学诚认为汪中《述学》一书体例失当，文不对题，从而批评其立言无本。首先，章氏认为内篇部次篇目失当，其云：“汪氏之书，不过说部杂考之流，亦田氏之中驷，何以为内篇哉！”<sup>[35]</sup>换句话说，认为内篇内容立言无本，不能凸显学术要旨，不符合学术著作内篇的要求。章氏指出：“古人著书，凡内篇必立其言要旨，外杂诸篇，取与内篇之旨相为经纬，一书只如一篇，无泛分内外之例。”<sup>[36]</sup>章氏认为古人撰述各有所宗，立言必有所本，方为治学之正途。其次，章氏认为内篇初无类例，亦无次序。章氏指出：“所为内篇者，……其言有得有失，其考有是有非。大约杂举经传小说，辩别名诂义训，时尚是趋。初无类例，亦无次序。”<sup>[37]</sup>章氏指出汪氏内篇类例失当，编次混乱，著述宗旨晦而不彰。再次，章氏认为外篇文不对题。他指出：“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代毕制府《黄鹤楼记》等亦泛入，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sup>[38]</sup>章氏认为外篇内容与“述学”主旨文题不符，特别举出为毕沅制府所写《黄鹤楼》记，此文应为辞章一类，内容与“述学”旨意全然无涉，如风马牛不相及。当然，章氏之批评有待商榷之处：首先，《述

学》原本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学术著作，只是作者完成了其中的几卷，并非全部，刊行的《述学》，也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一部文集。其次，《述学》原非如章氏所说立言无本，相反，此书立言是有宗本的，汪中是想通过博考先秦古书，来探究三代学制兴废，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章氏对《述学》体例及立言无本的批评，有些牵强附会，究其原因，是由于章氏意气用事造成的。

其二，章学诚对《述学》中《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墨子序》及《释三九》等四篇文章的批评。

《释媒氏文》，是汪中对《周礼·媒氏》一文的解释。《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人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sup>[39]</sup>章氏与汪氏于此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奔”的理解上，“奔者不禁”意为仲春二月，男女私奔也是不禁止的，这里的“奔”，章氏以为汪氏理解为“淫奔”，从而大加挞伐。章氏不遗余力地指责道：“男女婚姻失时而即许淫奔，虽衰世犹无其法，而《周官》有此法乎？”“先王之政，婚姻以时，不闻淫奔以时也。且父母果知耻，则男女淫奔，耻已定矣。”<sup>[40]</sup>其实，在汪氏看来，这个“奔”也并非淫奔之意，而是通常学界所说的“不聘为奔”，于此并无邪念淫邪之意，而是政府允许的一种男女自由的约会行为。诚如汪氏所言：“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民，使及时嫁子娶妇也。”<sup>[41]</sup>由此看来，章氏对汪氏的批评存在着误解。

《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是汪氏讨论古代女子许嫁后而婿死，女子是从死还是守志，抑或是另外再嫁的问题。汪氏以开明的态度，以对古代妇女的极大同情出发，从《礼记·曾子问》中的有关记载来推测古人制作婚礼背后的礼意，从而提出了“女子许嫁而婿死从而死之与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烈女不事二夫不谓不聘二夫也”的主张，可以说，这些思想都具

有进步意义，却遭到章氏的激烈反对。章氏针对“改嫁凡四皆谓之礼”的说法批驳道：“则仍郑《注》误解，先儒多辨正之，汪必据郑误说以为确义，矫矣。”<sup>[42]</sup>章氏认为未婚守贞、笃志守节之人，亦是“出于天性”，是则“本人之心之所有”，“不可谓非礼文之所许也”；至于“于义无取，则尽有抚孤立后，昌大其宗，继绝举废”之人，其功劳亦大，也是“天理人情之所推允”，而汪氏“愤若不共戴天”，从而指责汪氏“自谓维世教，而不知有伤于名义”，“汪氏几丧心矣”，“充其所论，伯夷与盗跖无分也”<sup>[43]</sup>。其实，章学诚的妇女观中不乏进步的思想，他对古代妇女的命运也同样报以同情之心，并且对古代妇女也以极大地热情给予关注，但章学诚的标准就是要遵循礼的规定性，不能越礼，故章学诚疾呼曰：“盖文章虽曰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凛然名义纲常，何可诬也！”<sup>[44]</sup>因此章学诚对汪中女性观的批评，除了意气用事之外，主要的是出于卫道思想。诚如庞雯予所评：“小章学诚七岁的考据学家汪中则通过阐发古礼来批评束缚妇女的礼教观念。章学诚与清中期这两位持有进步妇女观的思想家均有过文字上的论战，并且都有涉及到女性问题，在论争中，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章氏无疑扮演的是一个保守、卫道的角色，他虽然也尊重妇女，赞赏妇女，但却未能脱离名教的框架给予女性价值以独立的肯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章学诚的妇女观有保守落后的一面。”<sup>[45]</sup>

章氏对《墨子序》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汪中“谓孔、墨初不甚异，墨子诬孔，孟子诬墨，等于诸子之相非”的观点，批评其“可谓好诞之至矣”<sup>[46]</sup>，认为汪中之论乃是黑白不分，颠倒是非。二是针对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的观点，指斥其“不其慎乎”？且批驳汪中“好为高论而不切事情，亦其惑也”。<sup>[47]</sup>

针对《释三九》中汪氏“次篇欲明古语不可执泥，而广引文法不可执者以见类例”的观点，章氏指责为“如才人作赋，好为敷张，其实不烦如此费也”，因为“若论古人文辞之妙，意会不可言传”<sup>[48]</sup>。当然汪氏与章氏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此问题的，汪氏

是从考据学的角度出发，讲究旁征博引，博采旁搜，加强分析说明的力道，是典型的考据学方法；而章氏高明有余，沉潜不足，从而反对汪氏的做法。

总之，作为并时的学者与史学家，章学诚与汪中有着相似的生活遭际，二人的学术主张不乏有共同之处，但同时其学术差异也显而易见。在第三次就武昌幕府共事过程中，二人由相知发展至交恶，均由二人的性情及学术观点不同而引起。章学诚对《述学》体例及其篇章的批评，有的是牵强附会，有的是意气用事，有的是出于卫道思想，其批评的合理性亦值得商榷。

作者简介：张富林，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 参考文献：

- [1][2][8][9][14][15][16] 胡适：《章实斋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第45页，第46-47页，第50页，第51页，第78页，第99页。
- [3][4][10][12][13][17][18]（清）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汪中《新编汪中集》（附录一），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8页，第8页，第15页，第15页，第15页，第34页，第36页。
- [5][20][3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6页，第486页，第486页。
- [6][7][11]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页，第170页，第170页。
- [19][21][24][25][28][29][31][32][33][35][36][37][38][40][42][43][44][46][47][48]（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第85页，第85页，第335-336页，第336页，第336页，第325页，第325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第57页，第57页，第57页，第58页，第58页，第58页。
- [32]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23页。
- [23]（清）汪中：《新编汪中集》（附录二），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7页。
- [26] 袁先泼：《章学诚的〈诗〉学解释学建构》，文艺评论，

2013年第6期，第99页。

[27] 黎爱：《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身份建构与文  
化关怀》，文艺评论，2021年第1期，第74页。

[30]（清）洪亮吉：《卷施阁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632页。

[39]（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732-733页。

[41]（清）汪中：《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  
年版，第373页。

[45] 庞雯予：《试论章学诚的妇女观及其内在矛盾》，妇  
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6期，第67页。

## ●学术动态●

### 我院三位教师获批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

2022年7月7日，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布了首批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立项名单，我院李可亭教授的《应天书院研究》、杨金华博士的《豫籍近代史家郭廷以传》贾文彪老师的《殷商文化起源及其兴衰研究》共三项项目成功获批。

该项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入挖掘河南文化底蕴，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河南软文化实力，推动现代化河南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我院三位老师在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项目中的成功立项，显示了我校教师在科研工作上的锐意进取和强劲实力，今后还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为学校 and 河南区域文化发展做出更多扎实有效的成果。

## 论陶渊明诗文的“清”美

□ 张甲子

论陶渊明诗风“清”，源出钟嵘《诗品》。尽管钟嵘对陶渊明整体评价不高，将其列入中品，但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却看得很透彻。后世继之，更加重视“清”美与陶渊明的多重意义。本文试以“清”为中心，剖析陶渊明诗文何以在汉魏六朝中自为一格，何以被后来的创作者逐步认同，何以被后世诗文评者集中论之，又如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读解链。今试言之，以就教于方家。

### 一、“清”的感性与理性

对于陶渊明，“清”美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是陶渊明创作时对“清”的感性偏爱，一方面是后世评者对陶渊明诗文之“清”的理性认同。

关于前者，先考察“清”在陶渊明诗文中的多次出现。陶渊明现存诗文百余篇，约1/4篇出现了“清”字，四言、五言至文、赋皆有。其用法及意义，大致可分八类：其一，“清”用于描写天气，如“气清”“清气”“清穆”“清阴”“清凉”“清飙”等，这是其时的惯常用语；其二，“清”用于描写山水，如“清浅”“清沂”“清壑”“清瑶”“清流”等，这在稍后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更常见；其三，“清”用于描写时间，如“清朝”“清晨”“清夜”等，与阮籍、嵇康多写夜晚清澈不同，陶渊明更喜晨光清爽；其四，“清”用于描写音乐，如乐器之“清



琴”“清瑟”，音声之“清吹”“清歌”“清谣”等，这与当时的音乐环境息息相关；其五，“清”用于描写名物，如酒之“清酤”“清酌”，庭院之“清池”，容貌之“清颜”等；其六，“清”用于描写玄言，如“清话”“清言”等；其七，“清”用于描写心思情绪，如乐之“清兴”“清远”，悲之“清哀”等；其八，“清”用于描写品行才华，如“清节”“清贫”“清操”“清蹈”“清尚”“清诲”等，可见陶渊明对清美风尚的认同。

关于后者，陶渊明展现出的“清”，是发自于内，而非强加在外。

一是“文体省净”。许学夷《诗源辩体》释“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故其长篇甚少”，毛先舒《诗辩坻》释“浔阳省静体，已非晋骨”，陶

渊明诗歌用辞之简，与时风颇有差异。龚鹏程释为：“陶渊明弃文就朴，放弃掉一切多余的修饰与无聊的废话，所以说他‘殆无常语’。把这些放弃了，文体自然省净。从伦理上说，此等文体之选择，即表现了作者删繁就简、捐华崇实的态度。”<sup>[1]</sup>

二是“笃意真古”。有论曰：“他和村民出游、闲谈、饮酒，都用极简约的白描来记录，语言洁净得就像清水中的白沙，纯净得像经过淘洗，没有任何杂质。陶诗语言的省净，至此臻于极致。它来自简朴生活，经过汗水的洗涤，是用纯朴的农夫般的感情浇灌出来的省净，是通过长期辛劳耕耘而得来的村夫子的语言，它干净明爽，就像溪边荠菜花那样的素朴可爱。”<sup>[2]</sup>蔡绦《西清诗话·渊明问来使诗》释为“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方东树《昭昧詹言》评为“陶公别是一种自然清深”，其有能影响到盛唐的“清韵”，说明陶渊明诗歌得用意之真。

三是“风华清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陶公四言诗，其清隽与嵇叔夜相似，而自然浑化处嵇所不逮也，当与曹氏父子四言诗分域，各造其极”；钟惺《古诗归》论“幽生于朴，清出于老，高本于厚，逸原于细，此陶诗也，读此等作，当自得之”；何溪汶《竹庄诗话》论“诗中不见斧斤，而磊落清壮，惟陶能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曾纮曰：“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内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都紧紧抓住了共同的核心，以“清”作为对陶渊明诗文的审美鉴定。

## 二、用辞之“清”

陶渊明诗文辞句很讲究，其“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sup>[3]</sup>既不用佶屈聱牙的古字，也不用尖新浮夸的新字，更不入尖巧轻倩语、经书板奥语、子史僻涩语、俚官鄙俚语、道学理语、游戏趣语及烂熟典故与寻常应付公家言等。陶渊明自有一套用字用辞的范围，据初步统计，其诗文中虚词数量极高，<sup>[4]</sup>实词若“田家语”的重复率亦高，虚实结合，用的“都是从前诗里不曾有

过的句法”，<sup>[5]</sup>陶渊明的偏好是很明显的。

素论陶渊明之遣词造句，多在“清拔”二字。阳休之编订《陶渊明集》十卷，欣赏陶诗“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乃高。”方岳《深学偶谈》亦言：“渊明诗有谓其词彩清拔，斯言得之。”在笔意“清拔”间，陶渊明从古诗拙朴中求得了新变。

一是有平淡气质。平者，取势不杂；淡者，遣意不繁。胡应麟《诗薮》：“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施山《漱芳阁丛钞》论之：“渊明为平淡之极品。”平淡易，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不易。

二是有古风气质，散而庄，瘦而腴。杨万里《诚斋诗话》论：“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乃五言之长；许学夷《诗源辨体》论：“陶靖节四言，章法虽本《风》《雅》，而语自己出，初不欲范古求工耳。然他人规规摹仿，而性情反窒。靖节无一语盗袭，而性情溢出矣。”乃四言之长。

三是有天成气质。《冷斋夜话》引苏轼言，“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无刻意之态、齷齪之态，其韵有味，但字不露。许学夷《诗源辨体》论：“靖节诗，初读之觉其平易，及其下笔，不得一语仿佛，乃是其才高趣远使然，初非琢磨所至也。”王圻《稗史》论之：“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漫叟诗话》论之：“诗中不见斧斤，而磊落清壮，惟陶能之。”这种似乎在意而又全不在意的笔触，实难仿效之。

陶渊明四言辞句之“清”，在于以短为长，取《三百篇》之自然清新，非凝重端庄。除《命子》一篇较长，共80句外，其他都比较简短，如《停云》《时运》《荣木》《归鸟》《赠长沙王公》皆32句，《答庞参军》《劝农》48句，《酬丁柴桑》只有14句。比之曹操，最短《善哉行》28句，最长《步出夏门行》64句；比之嵇康《代秋胡歌》84句，《赠兄秀才从军》144句；比之陆云《答孙显世诗》80句，《答兄平

原书》242句，可见汉魏时，四言因赋法铺陈，篇幅多冗重，陶渊明则多采比兴，将其轻简。

厉志《白华山人说诗》有论：

终汉魏六朝之世，善学《三百篇》者，以渊明为最。……渊明之于《三百篇》，非即而取之，但遥望之，无所喜也；望而不见，亦无所愠，此其所谓渊明之诗也。

“即而取之”是追求形似。如《答庞参军》“载弹载歌，爰得我娱”脱胎于《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一日不见，如何不思”援引《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变于《小雅·鹿鸣》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遥而望之”是追求神似，《命子》“前半叙述安雅，后半抒写邻淋漓，安雅为四古常格，其淋漓处笔腾墨飞，非汉魏以来所能疑似。”<sup>[6]</sup>《停云》各段以不同景物起兴，兴中有比，其温雅和平，与《三百篇》近，其流逸松脆，与《三百篇》远，成“柴桑之绝调”；<sup>[7]</sup>《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源自于《邶风·凯风》的“凯风自南，吹比棘心”之意，“清腴简远，别成一格”；<sup>[8]</sup>《归鸟》以鸟自喻，思致高远，“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使人心平累消。”<sup>[9]</sup>

陶渊明五言辞句之“清”，在于以简驭繁。西晋太康后，五言多求清丽，陶渊明则弃丽得朴。如《答庞参军》的同题之作：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其一）

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云胡以亲！

我求良友，实覩怀人；懽心孔洽，栋宇惟邻。

（其二）

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

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王事靡宁。

（其五）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来？

两诗皆词直意婉，语淡味腴，和粹之气，悠然流露，最耐玩味。四言《答庞参军》先叙房屋简陋，但有琴有书，每日出入，最挂念的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当年你远去他方，知心话再难当面讲，现在唯愿你良辰美景，一生安康。五言《答庞参军》诗意亦如此，家常语句絮絮不已，自有深情在其中，并不显啰嗦。

### 三、意象、意境之“清”

陶渊明诗文意象、意境之“清”，多出野田趣味，其选田家真景，不似都城繁华，更不似山水行旅。陈知柔《休斋诗话》论之：

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

“清”体现于物象之幽静、景色之老致、趣味之飘逸，看似随机，实则有意，皆是“渊明之生活或心灵的一种象喻”。<sup>[10]</sup>如“菊”：《和郭主簿》“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九日闲居》其二“秋菊盈园，而持纆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陶渊明写食菊、赏菊、赞菊，使“东篱菊”成了田园清景的代名词。“柳”：《归园田居》其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蜡日》“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拟古》其一“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以柳写家宅之安康。“桑麻”：《桃花源诗》“桑竹垂馥荫，菽稷随时艺”；《归园田居》其二“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四“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以桑麻写家常生活之状态。“禾苗”：《时运》“山涤馥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以农事

写人生。陶渊明对这类意象得心应手，运用时如庖丁用刀，游刃于虚，展现了和平渊静的静态之美。如《停云》：

霏霏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霏霏停云，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有评之：“每章都用情调相同的景物，与自己的心情对照、烘托，因而加强了诗情底色调和浓度。”<sup>[11]</sup>其清美，正在于有一种深深的安宁感，“在无争、无斗、淡泊、自然、平和的心境中，似乎一切都是静寂的。”<sup>[12]</sup>

意象的清音旷远，更在真事、真景。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论：“非古之耒耨植杖者，不能识此语之妙也。仆居中陶，稼穡是力。秋夏之交，稍旱得雨。雨余徐步，清风猎猎，禾黍竞秀，濯尘埃而泛新绿，乃悟渊明之句善体物也。”其清真之不可及处，是心之所至，笔亦至焉，心所不至，笔先至焉。其笔在方宅草屋、远村近烟、山雨朦胧、浊酒竹杖处；其心则是对纷繁世事的闲适之意，如《陶征君潜田居》“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整体上显出清切之美，构成了一幅幅田园清景图。

关于陶渊明构建的“清”境，后人多有比喻式的总结：

渊明若逸鹤任风，闲鸥忘海。（郑厚《艺圃折衷》）

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陶孙《诗评》）

陶诗似月到柳梢，风来水面。（陆时雍《古诗

镜》）

如天春气蔼，花流水落。（牟愿相《小澗草堂杂论诗》）

陶潜之作，如清澜白鸟，长林麋鹿。（朱萸培《松石轩诗评》）

陶靖节诗，如巫峡高秋，白云舒卷，木落水清，日寒山皎之中，长空曳练，萦郁纾回。望者但见素色澄明，以为一目可了，不知封岩蔽壑，参差断续，中多灵境。又如终南山色，远睹苍苍，若寻幽探密，则分野殊峰，阴晴异壑，往辄无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如画般清远，乃陶渊明之本色，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无论四季，陶渊明都能借有限之象表无限之境，借有形之物寓无形之情，以一个蓓蕾蕴蓄着绚烂芳菲的春信，以一张落叶预奏着弥天漫地的秋声。如《时运》写暮春，“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和郭主簿》写幽夏，“写景净，言情深，乃不负为幽人之作”；<sup>[13]</sup>《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写秋夜归家，尤其是“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两句，“景色如次，清湛无滓”，<sup>[14]</sup>一切皆以画境写心境，借刹那抓住了永恒，使仿佛在梦中或出神的瞬间所瞥见的大化之境，变成了近在咫尺的现实。

#### 四、自然、理感之“清”

有论之，“陶诗的美在于真，也就是自然。这同他的思想、生活和为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陶渊明爱的是自然，求的是自然。自然就是他最高的美学理想。”<sup>[15]</sup>因其天机潇洒，纯任自然，无论是辞“清”，还是意象之“清”、意境之“清”，陶渊明皆从自然处得来。故陶渊明之“清”不可模仿，有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之嫌。

陶诗独绝千古，在“自然”二字。……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谛，实费功夫。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

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酝酿之熟，火色俱融；涵养之纯，痕迹俱化。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有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故能兴象玲珑，气体超妙，高浑古淡，妙合自然，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也。此可以渐臻，而不可以强求。<sup>[16]</sup>

首先是情感自然，即真实，“渊明之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sup>[17]</sup>如《咏贫士》其二：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当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寓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情感有一说一，不伪装、不掩饰，感遇而为文词，略无斧凿之痕、烟火之气。叶梦得《玉涧杂书》：“陶渊明直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陶渊明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风流、非抗执，无事修饰，皆是天然之味。

其次是理感自然，即哲思。如《拟古》：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有“清韵”，指的是在比兴隐喻中，将“清”抽象化为人生的至高态度。叶燮《原诗》：“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诗家之方外，别有三昧也。”跳脱出了拟古诗的质实，能举重若轻，“未尝数数留意于外物，盖真实有得于心者，与徒事虚言者不同。”<sup>[18]</sup>

最后是质性自然，即自然主义之本体。自然不是外在的平淡，而是内在的质性，是抱朴守真、应物顺化、心性逍遥，“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sup>[19]</sup>如《归去来兮辞》，汪藻《信

州郑固道侍郎寓屋记》论之：“渊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园将芜为忧；其既归也，不以松菊犹存为喜；视物聚散，如浮云之过前，初未尝往来于胸中，盖知夫物我之皆寓也。”心中若非自然，笔下也不能为此之言。其文得素怀磊落，清气流行，字字囊中，但又字字尘外。

陶渊明诗文中的情感、理感、质性，不似玄言诗那般枯瘦，而能深入浅出地说清人生至理。如《形影神》之《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叶梦得《玉涧杂书》论之：“陶渊明作形影相赠与神释之诗，自谓世俗惑于惜生，故极陈形影苦，而释以神之自然。”比之其他诗作，《神释》讨论的是人生根本问题，通篇无体物之意象，却有微纤之理感，是为陶渊明人生观的总结。

综上所述，“清”美与陶渊明诗文的意义，呈现在多个方面，从遣词造句到立意成象，再到诗歌意境与哲思的互通，“清”是理解陶渊明诗歌艺术特质的关键点，是概括的最为确切精当之语，是应予以重视和研究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浊认知与中国文学形态的生成”（16YJCZH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甲子，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55页。

[2] 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 103 页。

[3] (明)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 6,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98 页。

[4] 魏耕原:《论陶渊明诗的散文美》,《文学遗产》2008 年第 6 期。

[5] 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第 571 页。

[6] (清)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 13,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第 396 页。

[7] (明)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 2,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第 103 页。

[8] (清) 沈德潜:《说诗碎语》, 第 199 页。

[9] (明) 钟惺:《古诗归》卷 9, 引自《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 170 页。

[10] 叶嘉莹:《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11] 黄仲尼:《陶渊明作品研究》, 台北: 帕米尔书店, 1965 年, 第 300 页。

[12] 朱良志:《生命清供: 国画背后的世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57-58 页。

[13] (明)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 4, 第 190 页。

[14] (清) 杨雍建:《诗境》卷 10, 引自金融鼎:《陶渊明集注新修》,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第 13 页。

[15] 袁行霈:《陶诗的自然美》,《陶渊明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 71 页。

[16] (清)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 1,《清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第 2341 页。

[17] (宋) 黄彻:《巩溪诗话》, 引自(清) 陶元藻《全浙诗话》,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第 17 页。

[18] (宋) 陈模:《怀古录》, 引自《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编, 第 116 页。

[19] 曹胜高:《陶渊明与东晋玄学之新变》,《中国文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

## ●学术动态●

### 我院张甲子博士获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2 年 8 月,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事务中心下发了 2022 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 我院张甲子老师《讖纬文本与汉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成功获批。

该项目以讖纬文本为切入点, 通过讖纬文本对神异物象的记载、对数理逻辑的运用、对思维模式的整合, 详切地勾勒出讖纬文本的知识体系, 分析其文本来源、学理演变和逻辑过程, 观察讖纬文本对中华学术史的改造过程和作用方式。

上述成绩的取得, 显示了我院教师在科研工作上的不懈努力, 也展示了人文学院对中青年教师的大力支持。

## ● 学子文苑 ●

徐渭的畸变人生及其女性书写的原型  
理论解析

## ——以《雌木兰》和《女状元》为中心

□ 张诗芳

徐渭将其创作的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总称为《四声猿》。清代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曾解释道：“盖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sup>[1]</sup> (P219)，由此认为《四声猿》充满悲怨的氛围。并且关于其主题，学界亦众说纷纭，有主题统一说或主题独立说的相关讨论，以及悲剧性或喜剧性等诸多问题的探讨<sup>[2]</sup> (P219-221)。本文主要以《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以下简称“《雌木兰》”“《女状元》”）两剧着手，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去了解徐渭，解读剧本，试图有不同发现。

## 一、徐渭本人的“阿尼玛”气质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所有的儿童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它激发儿童的想象力，激励他尝试通过改善自己的处境来消除内心的自卑感。个人处境的改善会缓和自卑感，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



为心理补偿。<sup>[3]</sup> (P8) 在徐渭的生命历程中，庶出身份以及入赘经历等，增添了其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但他一生勤奋刻苦，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文、戏曲、音乐等领域皆有较高造诣，在这些方面的追求使他获得一种补偿与超越。结合徐渭的生平经历，据其自著《畸谱》<sup>[1]</sup> (P170) 可知其家人概况及与之相关的几件大事：

渭生百日矣，先考卒。

十岁。苗宜人，渭嫡也。教爱渭世所未有也，渭百其身莫报也。然是年似夺生我者，乃记忆耳，不知是是年否。

十四岁。苗宜人卒。

二十岁。聘潘女。秋八月，潞卒于贵州。

二十一岁。夏六月，婚。

二十五岁。三月八日之巳，枚儿生。是年，兄淮卒。

二十六岁。妇潘死。

二十九岁。始幸迎母以养，买杭女胡，奉之劣。

三十二岁。潘友招，图继我耦。后先以三女，余三忤之。

三十九岁。入赘杭之王，劣甚，始被治而误。秋，绝之。至今恨不已。

四十岁。聘张。

四十一岁。取张。

四十二岁。冬，积生。

四十六岁。杀张下狱。

四十八岁。生母卒。

徐渭父亲徐鏞原配童氏，生二子，长子徐淮，次子徐潞，皆比徐渭年长二十来岁。童氏去世后，徐鏞娶继室苗氏，始终未育。徐鏞晚年又纳苗氏的“媵女”为妾，生下徐渭。徐渭生百日丧父，一直由嫡母苗氏照料和抚养，两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皆已成家。十岁时，生母被驱逐，直至十九年后方迎回。十四岁，苗氏离世后，依靠兄长生活。根据徐渭的人生经历，推测其儿时除了塾师或仆从外，很少与男性接触，其意识中具有一些“阿尼玛”气质。“阿尼玛”及与之相应的“阿尼姆斯”原型为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荣格的一大贡献就是对集体无意识的发现，尽管自提出之日起，此发现便备受争议，但丝毫不妨碍它在心理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荣格认为“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形式，作为一种心灵的虚象，已经先天地被他具备了。”<sup>[4] (P43)</sup>许多东西先天地存在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即原型，“人生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sup>[4] (P44)</sup>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有四种原型，包括：人格面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阴影以及自性。“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它也可以被称为顺从原型”<sup>[4] (P48)</sup>。阿尼玛与阿尼姆斯是相对于人格面具而言的，“正因为人格面具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荣格才把它称为精神的‘外部形象’，而把男性的阿尼玛和女性的阿尼姆斯称为‘内部形象’。阿尼玛原型是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阿尼姆斯原型则是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荣格又将其称为一个男人的潜意识朝女性性质和一个女人的潜意识朝男性性质人格化的过程。<sup>[5] (P324)</sup>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这倒不仅仅因为从生物学角度考察，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既分泌男性激素也分泌女性激素，更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人

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sup>[4] (P52-53)</sup>。

身份卑微的生母在徐渭十岁时被驱逐，但他从嫡母苗氏处得到许多呵护与母爱。嫡母苗氏“性绝敏，略知书，其持身严毅尊重，内外莫不敬惮。其描写俎醢，为世女师。其才略酬应，畜酿种植，出入筹策，驳辨禁持，则宗戚、子妇、宾客、塾师、老牙奴、悍奴婢靡不失气”<sup>[6] (P632)</sup>，可见苗氏治家有方，精明能干。苗氏自身无子，徐渭便成为她希望与情感的寄托，徐渭也对她心怀感恩。在苗氏病重时，“渭私磕头，不知血，请以身代，请医路。卜人语以讖语恶，不食三日”<sup>[1] (P172)</sup>。嘉靖十三年（1534），苗氏病逝，徐渭为她写作墓志铭“其保爱教训渭，则穷百变，致百物，散数百金，竭终身之心力，累百纸不能尽，渭粉百身莫报也。”<sup>[1] (P632)</sup>苗氏的慈爱与威严大概恰好符合徐渭“心中所携带着的永恒的女性心象”，而“阿尼玛原型的第一个投射对象差不多总是自己的母亲，在这之后，阿尼玛原型被投射到那些从正面或从反面唤起其情感的女人身上”<sup>[4] (P54)</sup>，在潜意识中为其勾勒出所爱之人的形象，情感上亦产生了好恶之别。妻子潘氏的贤淑与温良便是从正面唤起了徐渭的情感，借此角度大概也可解释徐渭为何将后娶的王氏评价为“劣甚”，以及与继室张氏不和而导致家庭悲剧，后两位女性或许不幸地与他的“阿尼玛心象”相冲突，因而最终结果总是对立与不满。

若将纳妾胡氏计入其中，徐渭一生经历了四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入赘潘家，潘家由潘氏的继母持掌家政，家庭关系复杂，徐渭身处其中充满难堪，但岳父潘克敬对其才华欣赏有加，潘氏待其更是敬重谨慎，体贴周到，“与渭正言，必择而后发，恐渭猜，蹈所讳”<sup>[6] (P634)</sup>，令徐渭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然而之后缔结的两次婚姻，王氏与张氏皆未能带给他所需要的关爱。在徐渭的情感历程中，甚至可以说自潘氏去世以后，他的“阿尼玛”原型再也未能找到从正面唤起情感的投射对象，其人格和谐无法得到平衡，他个人展现的只剩下男性气质，使得他无意识中更加软弱、敏感，以致于做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暴虐举动（杀妻和九次自杀），这些或许正是对内心软弱与敏感之情绪的掩饰与释放。

## 二、“雌木兰”与“女状元”的“阿尼姆斯”原型解读

《雌木兰》与《女状元》二剧有一个共性，主人公皆是出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而女扮男装，在文、武方面各自取得相应成就后，又重回闺阁，且喜得良缘。

中国古代内外有别的社会结构对两性素质提出了不同要求，《周易》将其哲学抽象为阴阳之德。具体来说，勇敢、严格、有智慧是男子应该具备的品德，柔顺、慈爱、贞洁是女子应该具备的品德。<sup>[7] (P326-327)</sup> 并且古代正统对于女子教育主要围绕塑造“孝姑、敬夫、教子、贞烈、纺绩”等事展开。不同于“男者学业于外，志于四方”，女子须习得“躬井臼织作之事”，若能够“明事父母舅姑之义”，即便无何才艺亦无妨<sup>[8]</sup>。女子受教育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家庭教育，内容大体涉及以下层次：一是“专重妇德之教”，只集中在妇德、妇职上，其他文化视为多余；二是“兼顾文化书算之教”，为提高女子相夫教子、治家理财的能力；三是“诗书经史之教”，有助于进一步地“见礼明透”；四是“偏重家学之教”，所涉领域更宽。四种层次只有士大夫官宦之家或至少是知识分子、较为宽裕的家庭才能实施。广大劳苦家庭大概只能传习一些诸如桑蚕、女红、烹调、家务等劳动技艺。<sup>[9] (P171-174)</sup> 而在徐渭的两部剧作中，花木兰与黄崇嘏都是相对幸运的，因为二人皆受到了较高层次的教育。

在《雌木兰》开篇，木兰自报家门，十七岁，有妹子木难和小兄弟咬儿尚未长大，且有介绍云：“俺小时节，一了有些小气力，又有些小聪明，就随着俺的爷，也读过书，学过些武艺”<sup>[1] (P44)</sup>。从这段开场白可知木兰在成长过程之中具备聪明灵慧的资质，不仅受到读书识字的良好教育，还“超出同时期的平均水平”<sup>[10]</sup>，这些便成就了木兰果敢、自信与独立的个人魅力，而远超于妇德、妇职之外的武艺教育亦激发和塑造了木兰意识中的“阿尼姆斯”原型。荣格提到，阿尼姆斯是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即女性精神的男性特征，它给女性提供男性特质，也提供一种指导她与男性交往的参照系<sup>[11] (P67)</sup>。正如上文提到男人通过与女人的不断接触而形成了

他的阿尼玛原型，女人也通过同男人的接触而形成了她的阿尼姆斯原型。这种异性特征保证了两性之间的协调和理解，因而女性在无意识深处十分顽强，具有男人通常在其外显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气质。<sup>[4] (P53)</sup> 而阿尼姆斯原型的第一个投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父亲。<sup>[4] (P54)</sup> 父亲花弧“好武能文，旧时也做一个有名的千夫长”<sup>[1] (P44)</sup>，“想当初搭箭追雕穿白羽”<sup>[1] (P45)</sup>，几句简单介绍亦能深切感受到木兰对父亲的敬重之情。与母亲的慈爱勤劳在子女成长中起到陶染感化之作用不同，年轻时的父亲给予了木兰勇气、胆魄、行动力和自信心以及作为家中长女对于责任的担当。

在下定替父从军的决心后，为尽可能地获得家人的同意，减缓家人的担忧情绪，她事先未作声张，瞒着父母置办所需。“也要略略的演习一二，才好把这要替的情由，告诉他们得知。他岂不知事出无奈，一定也不苦苦留俺。”<sup>[1] (P45)</sup> 尽显其独立自强且有主见的魄力。

（演刀介）

[哪吒令] 这刀呵！这多时不拈，俺则道不便。才提起一翻，也比旧一般。为何的手不酸，习惯了锦梭穿。越国女尚要白猿教，俺替爷军怎不捉青蛇炼，绕红裙一股霜转！

（演枪介）

[鹤踏枝] 打磨出苗叶鲜，栽排上绵木杆，抵多少月舞梨花，丈八蛇钻。等待得脚儿松，大步重那捻，直翻身戳倒黑山尖。

箭呵！这里演不得。也则把弓来拉一拉看，俺那机关和那绑子，比旧日如何。（拉弓介）

[寄生草] 指决儿薄，鞞靶儿圆。一拳头攥住黄蛇撻，一胶翎拔尽了乌雕扇，一胳膊挺做白猿健。长歌壮士入关来，那时方显天山箭。

俺这骑驴跨马，倒不生疏。可也要做个撒手登鞍的势儿。（跨马势）

[么] 绣两裆坐马衣，嵌珊瑚掉马鞭。这行装不是俺兵家办，则与他两条皮生捆出麒麟汗，万山中活捉个猢猻伴，一辔头平端了狐狸毡。到门庭才显出女多娇坐鞍鞞谁不道英雄汉！<sup>[1] (P45-46)</sup>

木兰换上装备，即刻便由“长女”自动转换成

“长子”之角色，若没有以上唱词和表演，仅凭木兰简单介绍一句说“学过些武艺”，完全没有说服力，如此通过“演刀”“演枪”“拉弓”“跨马”等一番演习之后，便让见者皆能认可她的真才实干，为下文轻易地说服父母同意她从军，以及成功生擒黑山贼头领豹子皮做了很好的铺垫。由于人生存在现实世界当中，男女两性都必须依据社会规定和期待的性别角色塑造自己的人格特征。如要求男性必须刚毅、勇敢、果断等，而要求女性则具备温柔、细腻、体贴等特点。“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分别是男性人格与女性人格中的补偿因素，而人格统一性的先天倾向使其在最大程度地追求完整性。在这番武艺演习之中，木兰意识中的“阿尼姆斯”原型也使其人格得到极大的统一与完整。

即便《女状元》中黄崇嘏不同于花木兰曾跟随父亲学习武艺，但生于仕宦之家，亦当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她“既工书画琴棋，兼治描鸾刺绣”<sup>[1] (P62)</sup>，并慷慨激昂地表示“若肯改妆一战，管倩取唾手魁名”<sup>[1] (P62)</sup>。

[江城子]依稀犹记姬和翁。珠在掌，恁怜依……生来错习女儿工。论才学，好攀龙，管挂挂名金榜领诸公。<sup>[1] (P62)</sup>

其父亲黄使君为先辈名臣，想必父亲对她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读书识字、诗书经史之教导。她也受到父亲潜移默化影响，父亲“居官清谨，宦囊萧然”<sup>[1] (P62)</sup>，因而有了黄崇嘏得官后审理案件时从容敏锐、明察秋毫的政治才能。“阿尼姆斯”原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女性与男性交往所获得的具体经验，早年父母在世时，黄崇嘏能常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由于父母早逝，她意识中所存在的“阿尼姆斯”原型还可能源于通过心理遗传所获得的有关男性的先天倾向或者无意识中曾有的对于男性的经验，因而，她能够主动而自觉发出“词源直取瞿唐倒”“归来自有金花帽簇”<sup>[1] (P64)</sup>等豪言壮语，以及骨子里所隐含的自信与豪情的男性气概，便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花木兰与黄崇嘏的性格中可谓兼备男性的特征与女性的独特气质，两者并不冲突，反而更加凸显了其刚柔相济的个人魅力。二人敢于打破常规，勇

于突破“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勇敢对抗社会与文化意义中建构起来的性别标准与固定角色，使人格得以完整。

### 三、徐渭畸变人生中的独特情感

徐渭着力关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人的自然属性，对人自身进行审视，他执着追求个人情性，促使中国戏剧文学在明代跨入人生意识觉醒层面<sup>[12] (P66)</sup>。“徐渭本是一个感情丰沛而外露的人，但一生坎坷，使他的感情更多地表现为愤激甚至尖刻，很少有机会表现出他内心世界中轻柔细密的成份”。<sup>[13] (P22)</sup>甚至徐渭自己也认为自己的狂傲与放浪只是表象，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相当复杂，“他对朋友非常真诚，对于人情十分眷恋。在其性格中，存在着柔媚和忠厚的成份。甚至，从我们的直觉来说，温厚才是他个性最底层的东西。只是自幼及长，他一直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迫，承受了太多的刺激，才形成狂傲放浪、以至是偏激急躁的性格。”<sup>[13] (P120-121)</sup>。从其写给嫡母苗氏和亡妻潘氏的祭文、悼亡诗中便可较为直观而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用情至深，皆用语朴实，但却最能戳动人心。徐渭在《雌木兰》与《女状元》两部剧中一些“家常自然”<sup>[6] (P1092)</sup>的细节描写，初读误觉为其不经意间地轻描淡写，但细品方知深意。

《雌木兰》剧中，木兰准备演习武艺，有一情节写其放了小脚，换上军衣。

且换上这衣服者！（换衣戴一军毡帽介）

[天下乐]穿起来怕不是从军一长官，行间正好瞒。紧条钩，厮趁这细褶子系刀环。软啾啾衬锁子甲，暖烘烘当夹被单，带回来又好脱与咬儿穿。<sup>[1] (P45)</sup>

在外出征十二年回来后，木兰回归故乡，换回女装，拜见爹娘后，又拜谢弟、妹。

（拜弟妹介）

[二煞]去时节只一丢，回时节长并肩，像如今都好替爷征战。妹子，高堂多谢你扶双老；兄弟，同辈应推你第一班。我离京时买不迭香和绢，送老妹，只一包儿花粉；帮贤弟，有两匣儿松烟。<sup>[1] (P56)</sup>

试穿军衣时还能想着“带回来又好脱与咬儿穿”，以及返家之际仍记着为弟、妹捎带礼物，都体现出木兰对弟、妹的细心周到，体贴和关怀。一

个孩子在家庭里排行的差别，在他（她）面对生活中的事件时，势必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或行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家庭中，就存在“长姐如母”的说法，木兰在父母年迈、弟妹尚幼的情况下，主动勇敢地承担替父从军的重任，彰显出身为长姐的器度与风范。

在木兰整理好行装，温习了武艺，充分准备之后才将替父从军一事告诉家人，家人得知木兰去意已决，且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后，只得答应。临别之际，“才叫小鬟买得几个热饽饽，你拿着路上也好嚼一嚼。有些针儿线儿，也安在你搭连里了。也预备着也好缝些破衣断甲！”<sup>[1](P47)</sup>此话虽未具体注明是木兰父亲还是母亲所说，但能从中读出子女即将远行时父母的担忧与惦念。看似极不起眼的几句嘱咐，最能见出家人的互相眷恋与关切之深情。

《女状元》中黄春桃做好了女扮男装赴京应试的决定之后，改名为黄崇嘏，乳母黄姑亦改作黄科，随其一同前往京城，留下黄姑儿子小二哥看家。临走之时，黄姑对小二哥的叮咛也彰显母亲对孩子的牵挂，是唯有家人之间才能自然流露的亲密而浓郁的情感。

（净向内云）小二！我如今陪姑娘城上看亲，有几日不回，你好生看守房子，日逐价打柴放牛，若没有米，便去问张大娘家借些吃，不要和小二汉那个短命终日去厮打。我回来时节，有了不得的果品饼，定带来哩，则怕你没口得吃，短命唉！<sup>[1](P63)</sup>

黄姑大概也能意识到女扮男装不符常情，不宜让过多的人得知实情，所以并未向儿子说明她与黄崇嘏外出的真实原由。她除了告诫儿子要恪守本分，为他安排每日的任务外，心中更为惦念儿子挨饿，担忧儿子与同伴厮打而误伤。黄姑的这些记挂并非多余，想来小二应当仍是一个总角小儿，因而承诺归来时给他带回好吃的果品点心，但又反复忧虑儿子一人在家出现意外。这一系列的举动尽显黄姑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无限怜爱，不尽挂念之情溢于言表。而作为乳母，黄姑对待崇嘏堪称尽心竭力、同甘共苦，由于还需顾虑儿子的生活，所以在剧中黄姑对崇嘏提出“只是俸禄与那抓来的东西，可要

和你平分”<sup>[1](P63)</sup>，这个私心是可以理解的。在崇嘏父母双亡后孤苦伶仃、茕茕孑立之时，黄姑依旧陪伴在其身边，与之相依为命，且支持她做出男扮女装的决定，并选择跟随前去，另外，在剧中第五出，当旁人对崇嘏贞节提出质疑时，黄姑又积极辩解与维护。撇开地位与等级观念，甚至可以说，黄姑在剧中充当了崇嘏唯一的亲人角色。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在创作时修改了前人作品中给定的花木兰与黄崇嘏原本的结局。据清代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媛典》第三百四十一卷《闺奇部列传》引《凤阳府志》载，木兰之事闻于朝廷，天子欲纳之宫中，木兰以死拒之，得谥号“孝烈”；《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七亦载有黄崇嘏则在女性身份暴露之后，辞去官职，回归临邛归隐，“竟莫知存亡焉”<sup>[14](P2925)</sup>。徐渭剧中写木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父母做主许配给王郎；崇嘏因深得周丞相欢心，在周丞相的劝说下仓促地嫁给了新中状元的周凤羽。相较于前人作品中的死亡与不得而终，徐渭为二人设定的结局则显得更为完满和可以令人接受的。

家庭的完整与婚姻的完满对于徐渭来讲，属于“缺失性体验”<sup>[15](P113)</sup>，“作家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失去家庭的幸福时，这种缺失叫他们痛苦，但也激发着他们的创造冲动。这种创造冲动往往促使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活动去努力挽回一个逝去的世界，或重新建设一个世界。”<sup>[15](P123-124)</sup>父母对孩子出于本能的关爱，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体贴，通过剧中这些片段的表现，字里行间皆透露出徐渭本人内心的诉求，他从家庭中得到的关怀和抚慰，远不能满足其内心的渴望，无法弥补其内心的空缺。童年生活中外部物质条件的匮乏或被剥夺，失去父亲或缺少母爱等等，都是导致成年后精神异常的主要情境。对诸如此类的童年期生活中的经历，借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创伤性情境”<sup>[16](P26-27)</sup>。徐渭无法改变的庶子出身，以及成年之后，又历经屡试不中、婚姻不谐、精神失常、杀妻入狱等变故，其生命历程里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皆在他的人格发展中刻下烙印。

大多相关研究认为徐渭在二剧中以木兰、春桃

换回女装，回归传统婚姻生活作为结尾，是女性不得不屈从于男权社会，依附于“三从四德”的道德纲常规范之束缚，削减了主人公自身形象的主体意识及独立完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封建专制达到顶峰之时，徐渭身处其中，必定经常见识到身边的女性为封建纲常所束缚。生母身为奴婢因地位卑微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嫡母因恪守闺范，虽常忍受“心未尝一日不痛念太君”<sup>[6] (P631)</sup>的相思之苦而不得与她的母亲见面，心思敏感而细腻的徐渭自然有深刻体会，而对她们极尽同情与理解。因而，剧中两位女性功成名就后获得婚姻、回归家庭的结局，又何尝不能视为徐渭故意为之呢？幸福的婚姻，完整的家庭是他一生追寻而不可得的美好生活，内心的缺失在他虚构的作品世界中获得完整的呈现，他愿意让主人公获得其乐融融的家庭与琴瑟调和的婚姻。

徐渭在剧中所体现出来的复杂而矛盾的妇女观念，意味着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会破坏人物的独立完整，造成剧作的局限性。正是因为他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悟，正是因为他自身也存在缺失和创伤，他才能体会并反思时代风气带给女性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缺失和创伤。徐渭便是用这种方式书写自己内心深处对于温情的渴求，我们亦能从中读到他心中的独特深情。

尽管徐渭将四部杂剧统归于《四声猿》之名下，但四剧非作于一时一地，不同的剧作应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论析，而非一味地将其拘泥或定格于统一的标尺之下。当然，任何作品在承认其某方面具有价值与意义的同时，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问题。徐渭必然具有时代与阶级局限性，首先，《女状元》中黄崇嘏得官后审理的三起案件之一的黄天知与夏葛争地基案，毛屠被夏葛收买诬陷黄天知使之无辜下狱。毛屠已死，崇嘏下令其妻代受拶指之刑，似有徐渭通过剧作一泄“毛氏迁屋之变”<sup>[1]173</sup>之愤恨的意图。另外，在剧中对于贞节观的强调，鉴于贞节观由来已久，且在宋明之后理学大盛，更加强调女性贞节，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剧中所写似乎亦无可厚非。

作者简介：张诗芳，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2010级学生，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陆军防化学院基础部语言与人文教研室讲师。

#### 参考文献：

- [1] (明)徐渭著，周中明校注. 四声猿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 杨正刚. 《四声猿》主题论 [J]. 宁夏社会科学. 2008年第6期.
- [3]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彭正梅、彭莉莉译. 儿童的人格教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4] (美)C.S. 霍尔、V.J. 诺德贝著，冯川译，陈维政校. 荣格心理学入门 [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5] (瑞士)卡尔·荣格著，刘国彬、杨德友译. 荣格自传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6] (明)徐渭. 徐渭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 王小健. 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8] (明)蓝鼎元. 女学 [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9] 曹大为.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0] 张雪. 木兰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 [D]. 天津：南开大学，2013.
- [11] (美)赫根汉著，冯增俊、何瑾译. 人格心理学 [M]. 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 [12] 廖奔. 万历剧坛三家论——徐渭、汤显祖、沈璟 [J]. 河北学刊，1995(01).
- [13] 骆玉明、贺圣遂. 徐文长评传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14] (宋)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5] 童庆炳. 现代心理美学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16] 徐挥. 艺术家人格的心理学分析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类义词“巫、覡、灵巫、祝”辨析订补<sup>※</sup>

□ 冯淑雅

### 一、以往学者的辨析成果简析

洪成玉先生的《古汉语常用同义词疏证》中把“巫、覡”构为一组同义词，且他认为：“古时以占卜、舞神为人祈祷求福、却灾、治病的人。但辨析起来，二者还是有差异，一是本义略有不同，虽“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而实际使用中则男女不别，且“巫”的使用频率高，“覡”的使用频率低；一是词义内涵不同，“巫”有医生义，“覡”只有巫覡一义。”<sup>[1]</sup>

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把“巫、覡、灵、祝、卜、史、医”构为一组词，且他认为：“‘巫、祝’等都是和巫术有关的以迷信活动为职业的人。‘巫’是从事巫术的人，他们常常企图通过神秘的仪式、舞蹈、祝祷、诅咒来取得各种自然力的化身（天地、鬼神）的欢心、降福，或者攘除它们所降的灾祸。……男巫被叫做覡。……灵（靈），《说文》‘巫也。以玉事神也，从王霪声，或从巫’。‘灵’与‘霪’同源，自天而降曰‘灵’，降神者亦曰‘灵’，所降之神亦曰‘灵’。称‘巫’为‘灵’多见于《楚辞》，如《九歌·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称‘巫’为‘灵’应是楚方言。”<sup>[2]</sup>

黄金贵先生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中把“巫、覡、灵”构为一组词，且他认为：“巫产生于史前期。商代的巫，通晓当时各种知识，参与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周代，巫风犹盛，但已转民间。以后经久不绝，形成巫教。‘巫’是巫人、巫事通称，特指女巫。‘覡’，特指男巫，使用较少。‘灵’是楚方言男女巫师专称，主要见于上古楚歌。”<sup>[3]</sup>

曾昭聪先生在《古汉语神祀类同义词研究》中把“巫、覡、祝、灵、医、史、卜”构为一组同义词，且他认为：“巫是以工具来表示可通天地四方之人，是男女巫师通称，覡指男巫；祝是祭祀时司礼之人，即男巫，用言语与鬼神沟通；灵是楚方言词，指巫师。”<sup>[4]</sup>



但以上几位学者对于词语的辨析多参考传世文献，对于出土文献的参考较少。我们利用出土文献的详实材料，或可为以往学者的发现进行例证或补充。通过对秦简的阅读，我们发现，只有《里耶秦简牍》《睡虎地秦墓竹简》《岳山秦牍》《放马滩秦简》中有“巫”“覡”“灵巫”“祝”的出现。

### 二、意义上的区别与补充

在出土文献中，“巫”的功用除了以占卜、舞神为人们祈祷求福、却灾、治病之外，也可能有“作祟”之用，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可见例证：

胙肉從東方來，外鬼為姓（胥），巫亦為姓（胥）。<sup>[5]</sup>（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160）（以下出土文献都使用简称，睡虎地秦墓竹简简称睡虎地，里耶秦简牍简称里耶，放马滩秦墓简牍简称放马滩，岳山秦牍简称岳山）

……巫為姓（胥）。（睡虎地·日乙162）

乾肉從東方來，把者精（青）色，巫為姓（胥）。



（睡虎地·日乙 166）

在未，赤肉從北方來，外鬼父棊（世）見而欲，巫為姓（眚），室鬼欲拘（拘）。（睡虎地秦·日乙 176）

“姓（眚）”在这里表示假借用法，表示灾、作祟之义，所以由此推之，“巫”还可有作祟之用。[睡虎地 72 貳中“戊己有疾，巫堪行，”刘乐贤先生推测“巫堪行”是某巫作祟之义。]“巫”在这些简文中并没有男女之分；而“覡”在简牍中大多只如三位先生辨析的那样，特指男巫，这点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可以找到例证：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棄。生子，男為見（覡），【女】為巫。（睡虎地·日甲 94 壹）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棄。生子，男為見（覡），女為巫。（睡虎地·日乙 94 壹）

曾昭聪先生认为祝是指祭祀时司礼之人，是男巫，这一点可在《放马滩》中找到例证，如：

女子为巫，男子为祝。（放馬灘·日甲 34）

这条简文中的“祝”应是指与女巫相对的一种男巫。

### 三、搭配上的区别

“巫”“覡”“灵”在简牍中出现时的搭配，相比而言，“巫”有较大的灵活性，除了常出现的“X為巫”搭配外，还可搭配不一样的内容，[此处是课堂上由赵岩老师提醒而知。]然而“覡”可搭配的内容较为单调，一般只见“男為見（覡）”；且简牍文献中亦有“灵巫”连用，却没有“巫覡”连用或是“灵覡”连用，如：

毋敢曰巫帝，曰巫。（里耶 8-461 正）（巫帝：群巫之长，大巫。）

弦望及五辰不可以興樂□。五丑不可以巫，啻（帝）以殺巫減（咸）。（睡虎地·日甲 27 貳）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为祟。（睡虎地·日甲 72 貳）

發中宵畏忌，室有靈巫，弗敬戒，逢山水。（放

馬灘·日乙 245）（灵巫：神巫）

卦類雜虛，熟為大祝、靈巫，畜生（牲）之。（放馬灘·日乙 250）（畜：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为“巫”。）

可与“巫”搭配的有“巫帝”“巫減（咸）”“巫堪行”“灵巫”，或是指群巫中的首领，或是指巫祝之神，由此可推测，“巫”也许不单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神。

### 四、使用频率和用法上的区别与补充

（一）《里耶秦简牍》中“巫”出现了 20 次，未见“覡”，《睡虎地》中“巫”出现了 18 次，“覡”仅见 2 次；《放马滩》中“巫”出现了 7 次，而未见“覡”，《岳山》中“巫”仅见 3 次，亦为见“覡”；且“灵巫”连用仅在《放马滩》中见过 2 次；由此观之，正如洪成玉和黄金贵先生所言，“巫”要比“覡”常用的多。

（二）在用法上，“巫”常用作名词，但在简牍中，也有名词活用作动词的用法，如：

弦望及五辰不可以興樂□。五丑不可以巫，啻（帝）以殺巫減（咸）。（睡虎地·日甲 27 貳）

巫咸乙巳死，勿以祠巫。巫龍：[龍：义同“忌”。宋华强认为“龍”当为“禁”，禁忌。《释战国秦汉简中表示禁忌义的“龙”》，《简帛》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丙申、丁酉、己丑、己亥、戊戌。（岳山·祠日壹）

第一例简文中的第一个“巫”，可以理解为名词活用做动词，表示巫祝、祈祷这种行为；第二例的中第三个“巫”，应亦是名词活用做动词，表示“祠巫”这种行为。

### 五、地域上的补充

王凤阳先生和黄金贵先生都认为“灵”是楚方言，是巫师之专称，多见于上古楚歌。但在《放马滩》就可见到“灵”之使用，如：

發中宵畏忌，室有靈巫，弗敬戒，逢山水。（放馬灘·日乙 245）

卦類雜虛，熟為大祝、靈巫，畜生（牲）之。（放馬灘·日乙 250）

这里的“灵巫”根据注释者可知是指神巫，是不分男女的巫师。而《放马滩》发现于甘肃省天水市，学者普遍认为，日书乙种的抄写年代大致在秦统一之后不久，甲种的抄写年代更在其后，由此可知，在地域上“灵”可能不止是楚方言，<sup>[9]</sup>它在秦国亦有使用，也可能是从周沿用下来的用法。

## 六、结语

“巫、覡、灵巫、祝”在意义、搭配、频率用法和使用地域等方面都可以辨析出不同之处，总的来说，“巫”还可以有“作祟”之用，使用频率较高，搭配也较为灵活，“巫”亦有表示巫神之义；相反，“覡”只有男巫之义，使用频率不高，搭配也较为单调；“灵”在秦国时亦有使用，可能不单单只是楚地方言；“祝”指祭祀司礼之人，但也可表示男巫。

作者简介：冯淑雅，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学生，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洪成玉. 古汉语常用同义词疏证 [M]. 北京：商务印书

馆, 2018. 06: 43.

[2] 王凤阳. 古辞辨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06: 473—474.

[3] 黄金贵.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05: 209—213.

[4] 曾昭聪著. 古汉语神祀类同义词研究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05: 211.

[5] 李晓东、黄晓芬认为“姓”是“祟”之假借《秦人鬼神观与殷周鬼神观之比较》，《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刘乐贤认为“为眚”就是“为祟”《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天津出版社1994年版。

[6] 睡虎地72贰中“戊己有疾，巫堪行，”刘乐贤先生推测“巫堪行”是某巫作祟之义。

[7] 此处是课堂上由赵岩老师提醒而知。

[8] 龍：义同“忌”。宋华强认为“龍”当为“禁”，禁忌。《释战国秦汉简中表示禁忌义的“龙”》，《简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9] 此处在课堂上由赵岩老师提醒而知。

## ●学术动态●

### 我院张长彬博士在国家一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我院教师张长彬博士《“代行体”戏剧刍议》一文发表于国家一级学术期刊《文艺研究》2022年第7期。

针对我国戏曲研究开创者王国维提出并影响学界深远的“代言体”观点，张长彬博士首次提出了“代行体”概念，指出我国宋前戏剧都是以“代行”方式即表演者扮演他者并代其发出动作、行为进行表演。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阐释“代行体”观点的学术价值：一、可以平息戏曲研究界长期争论的“真戏剧”问题，指出唐前戏剧已经属于真戏剧；二、可以把学术界隔离的宋金前“古剧”和元代以后“戏曲”有机统一起来；三、促进中西戏剧研究交互交流。

张长彬博士关于“代行体”的观点，拓展了戏剧史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必将促进相关问题更深入研究。



## “争千秋，不争一时”——刘绍唐与《传记文学》

□ 张欣怡 指导教师：杨金华

### 一、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的思想缘起

作为二十世纪享誉世界的著名主编，刘绍唐在台湾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一手创办的《传记文学》，在海内外学术界闻名遐迩，素有“民国史长城”、“民国史宝库”之誉。

#### （一）刘绍唐生平学思与民国史渊源

刘绍唐，辽宁锦州人，原名刘宗向，生于1921年10月，逝于2000年2月，享年八十岁。年幼移居山东时，曾与著名学者梁漱溟结下师生之谊。1937年抗战军兴，又遇父亲病逝，南京告急，随所在高中众师生一路逃亡，颠沛流离。直至1938年春，学校才在湖南复课，绍唐长期以校为家，并在课余担任“墙报”编辑，一跃成为校内的风云人物。1941年夏，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抗战胜利后，依志愿分发北大肄业。在北大图书馆兼职期间，刘绍唐对中国近代史与民国人物传记产生了浓厚兴趣。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彼时刘绍唐正为补修未完的几个学分在大学秘书处半工半读，不料却接到了“暂予停职”的通知。为求生活，刘绍唐怀揣憧憬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与一众青年“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sup>[1]</sup>，稍后便成了“志愿参军”。在政府颁布“渡江命令”后，刘绍唐开始以文字优势供职于“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担任随军记者，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一路南下。攻占武汉后，刘绍唐又被调至林彪所在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任宣传秘书工作。这段经历对其人生转向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

他在回忆中写道：“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

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对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sup>[2]</sup>

刘绍唐自小就有“做一个自由报人的理想”<sup>[3]</sup>。他曾在孩提时代便大胆地给一当时的名记者写信，述说自己的理想与规划，并与之探讨新闻自由，年岁稍大些后又亲自下场实践办报，拥有过不少读者，也曾引起某些野心家的注意，“我为了自己的理想曾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忍受了太多的误解，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可是，在‘新’社会里，我必须为‘革命’，而捐弃我的理想。”<sup>[4]</sup>刘绍唐坚信自己“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sup>[5]</sup>，但他的理想被粉碎了，他对革命实际的失望已“忍无可忍”。<sup>[6]</sup>

1950年夏，刘绍唐伺机窃取了两张“四野”高级干部的军用护照，故布北上迷阵，秘密由汉口出走，借道香港赴台，自言“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sup>[7]</sup>。由于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绍唐遂于斗室之中奋笔疾书，将一路所感汇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该书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3国、16种语言出版，并被联合国采为资料，一



时洛阳纸贵。

抵台后，刘绍唐获时任台湾当局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业师崔书琴赏识，暂住其府上，并以属员身份追随他工作过几年。崔书琴是国际公法专家，也是非正式的“国民外交部长”，在平津政学商各界胜友如云。每礼拜六下午，崔家总是宾客盈门，“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sup>[8]</sup>刘绍唐受其汲引、庇护，结识了许多党政军要、学术名流，崔书琴甚至以“保举人才”保举刘绍唐晋见蒋介石，绍唐因而得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在“党史会”工作期间，尤与蒋永敬、李云汉气谊相投，素有“党史会”“三老篡”之称。<sup>[9]</sup>

“党史会”的工作使刘绍唐对历史越发感兴趣。在那里，刘绍唐耳闻目睹了许多老一辈在军政舞台上驰骋过的要人，谈及某亲自主导或参与的历史事件。“当时师父（刘绍唐）认为，他们讲的内容，都是珍贵的历史材料，应该让它变成文字，保存下来，否则随着他们的故去，有关史料就都将湮没掉了。”<sup>[10]</sup>

（二）“传记文学”的传统缺失与胡适的助推

与此同时，绍唐意识到：中国尽管哲人辈出，却并没有悠久的“传记文学”传统。自《史记》而后传记可读者屈指可数，“主要的原因，都是假手他人，而且仿佛已形成一套公式：自幼而壮而老，立功立德立言，人人完美无缺，篇篇内容雷同。”<sup>[11]</sup>刘绍唐将之归纳为“为贤者所讳”与“为智者所讳”<sup>[12]</sup>。“中国人素有谦冲的美德，成不居功，自己写自己纵然非常忠实，也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传之讥。”此外，“写自己，难免要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更难免要涉及到同时代的人，褒贬论断，可能惹起许多无谓的纠纷。”<sup>[13]</sup>于是，历史上增了许多因这类顾虑而导致的弃笔与空白。一如刘绍唐所叹惋：“几千年来，正不知有多少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没有片纸只字遗留下来便撒手而去。自己生前不肯写，死后别人写不像，只有留待后世史家像沙里淘金、像雾里看花一样地去摸索探求。这对整个国家民族来说，真是一个重大而无法弥补的

损失。”<sup>[14]</sup>

然而“传记文学”的历史性空白，从未被人刻意遗忘。相反，在刘绍唐之前，已有许多文史学家都曾对此大声疾呼。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梁启超与胡适。梁启超首先为古老僵化的中国传记文学灌入第一抔活力，撰写了数十万言人物传记与传记理论，搭建起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的桥梁。胡适更一生竭力于推广传记文学，是近代学者中最早提出“传记文学”概念，并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的人。他对传记文学的倡导与推广，是自理论而实践、全面而深入的。胡适不仅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判了中国传统传记。同时倡导纪实求真，融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他还曾多次在校中公开演讲传记学的重要性，并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sup>[15]</sup>胡适亦以身示范，留下了《四十自述》《丁文江的传记》以及持续不断的日记供后人研究。

老校长胡适对传记文学的极力鼓动令刘绍唐萌生了创办一份刊物以开传记文学之风、保存近代史料的念头。刘绍唐是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与胡适私交甚笃，一向倾慕其文字与为人，坚执以弟子之礼。在萌发想要创办一份传记性刊物的意愿后，便趁春节特意上门拜访请教于胡适。未料胡适虽遗憾于过去三十年自己没能在单枪匹马提倡传记文学之外通过杂志来推动，对刘绍唐筹办《传记文学》的计划竟并不予以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sup>[16]</sup>

刘绍唐却并不因此觉得气馁，他认为胡适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历史家的考据，固然可以辨真伪，但过度注重考据形成考据癖，则就过犹不及了。有许多历史学者本可以从事史学的积极工作，但却为考据癖所误。考据之所以能成癖，因有其引人入胜之处，如剥笋，如淘金。一经发生兴趣，便不能跳出这个圈子。”<sup>[17]</sup>刘绍唐提出了两个“三不主义”作为约稿与刊载的原则（后详），并且坚信这两个“三不主义”原则可以使来稿“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毕竟“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sup>[18]</sup>

刘绍唐不愿同许多有才学真正能治史的朋友一样，陷入到考据癖中而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 （三）刘绍唐与《传记文学》的创办初心

刘绍唐因其自身的特殊经历，深感“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sup>[19]</sup>，直到若干年后香港回归，他还在大力呼吁：“历史不能听命于政治，在历史研究中绝不能是我无你、有你无我，两岸史学家应以承认历史事实、消除政治敌意，有修养、有度量、有宏观的视野，成立专门机构分别进行学术性的修史工作。让历史真相长久保持，不要把历史当成统治或统战工具。”<sup>[20]</sup>有鉴于此，刘绍唐力排众议，坚决摒弃“为贤者所讳”与“为智者所讳”的不良学术风气，积极响应胡适所提倡的“给史家找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宗旨，一手创办了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发刊词中，刘绍唐明言：“任何有关个人的活动记录与思想见解的材料，都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sup>[21]</sup>他始终坚信“只要与时代不脱节、足以反映时代或为时代作见证者人人可写”<sup>[22]</sup>，并且承诺“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绝不阿谀颂扬或恶意贬损，也绝不以内幕新闻或低级趣味相号召。”<sup>[23]</sup>一言以蔽之，《传记文学》不愿为达官显贵、王侯将相歌功颂德，惟愿“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sup>[24]</sup>。

## 二、《传记文学》创办经过

### （一）攘臂跳火坑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的政治风气还极为保守，纯粹的学术研究可说是屈指可数。曾经风靡一时的《自由中国》与《文学杂志》均被迫停办，时人甚以“文化沙漠”<sup>[25]</sup>谑称之。故刘绍唐为了《传记文学》的创刊问题向师友们求教时，虽则也有看好者，十有八九却都抱持观望态度甚至加以劝阻。除了担心稿源问题与读者是否接受之外，还在于社会对办杂志的人评价一向不高，且过去常有些人以手上刊物为谋私工具，更招反感，如“与人有仇，就劝人办杂志”这般言论，在当时即传为笑谈。<sup>[26]</sup>而刘绍唐那时厕身政治权力中心，又才能兼备，得一众显要赏识，目之所及，官运亨通！

据刘绍唐的大弟子苏澄基回忆：

有一天，师父与时任“中央”设考会副主委杨

家麟吃饭，又谈到这个问题，杨劝他在党部好好做，别三心二意想办杂志的事，并说起某巨公很欣赏他，某要人对他的印象很好，将来都一定会提拔他，会为他安排一个重要职位等的话，而师父的反应是：“我不要谁来提拔，谁说要提拔我，我都不领情。”趁着几杯老酒下肚，他带着酒意对杨家麟说：“杨先生，我刘某人祖上无德，没有能提拔别人，这已很没出息、很惭愧了，现在在我年过四十，还巴望谁来提拔我？我就是提拔自己。”<sup>[27]</sup>

凭着这样一股“不巴望谁来提拔”的意气，从1962年6月创刊，至2000年2月溘然长逝，刘绍唐夙兴夜寐，栉风沐雨，独立主编38年，凡453期，每期30万言，不仅从未出现过中断或脱稿，抑且专著出版不落下风。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前三十年，就总共出版“《传记文学丛书》244种，《民国史料丛书》22种（含《中国经济志》、《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和《江河修防纪要》等稀有材料），《传记文学集刊》4种，以及《民国人物小传》20册，含民国重要人物小传2000篇之多。”<sup>[28]</sup>

《传记文学》创刊于多家实力雄厚的杂志经营惨淡、破产收场之际，多年来始终在极端压抑的政治氛围中踽踽独行，又完全坚持不登广告、不拉资本，自负盈亏。难怪旅美史家唐德刚在《传记文学》创刊廿周年纪念时叹道：

在刘绍唐攘臂跳火坑之初，胡适还在打破锣，说怕他“难以为继”呢。想不到“刘传记”就有此魄力、毅力、精力，一“继”二十年，一期不脱；烂污不拆，愈搞愈有劲，居然在史学界搞出个“刘绍唐时代”来。胡适如泉下有知，也应自愧不如！<sup>[29]</sup>

### （二）得“道”者多助

事实上，该刊之所以风靡海内外，并非一蹴而就。创刊之后，首要面临的的就是稿源问题，而一个称职的主编，绝不能只会应酬式地吆喝：“大家有空帮忙写稿！”那必将收到许多缮稿或者互相吹捧的稿。为解决这个问题，刘绍唐在约稿前一定要先了解对方的背景与专长，预订适合发挥的题目，接着下苦功游说对方动笔。遇见不常写字的人，他也一定兢兢业业地帮忙找资料、配图片，以求唤醒执笔者的记忆。待到稿成，更不辞艰辛逐字逐句更改错别字，翻阅史料，修正核实文中所载历史事件

的人物、时间、地点等各处细节，有时改稿花费的精力远超写稿。不宁唯是，所刊文章还一定要符合《传记文学》“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的基调，同时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可读性，从而突破历史仅作为学术殿堂里专家研究题材的壁垒，使之成为一般人可享受的知识与学问。

待一切业已拿定主意，刘绍唐便充分利用自己这些年在业师崔书琴荫底下所积攒的人脉以及在“党史会”工作的便利，巧借东风：

在他（刘绍唐）的热诚邀约和游说下，许多曾经烜赫一时的党政军巨头和财经界领袖，成为《传记文学》的作者，而在某人文章登出后，若文中所记某件事涉及张三或李四，则又去请张三或李四写稿，细说原委，如此一路下来，某个历史事件各方说法都有，真相逐渐清晰呈现，杂志就很精彩可读了。<sup>[30]</sup>

此外，刘绍唐在新闻出版业同样交游广阔，尚在中学时代就与大名鼎鼎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结下了不解之缘。陈纪滢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的主编，刘绍唐常以各种笔名向其所在刊物投稿。后来刘绍唐抵台，服务于“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陈纪滢也任兼职委员，每周均有碰面。《传记文学》创刊伊始，陈纪滢给予了刘绍唐许多鼓励。他在回给刘绍唐的信中直言肯定刘的魄力与沉着，说：“这个‘文化战’，非您莫属！”<sup>[31]</sup>并且承诺：“只要您肯办，我没有别的能力帮忙，我只有以稿件相助，以报答您不弃的德意！”<sup>[32]</sup>兹值《传记文学》创刊廿周年纪念，陈还意犹未尽的谈及起初其为实践“以稿相助”的诺言，不料竟“藉《传记文学》出了好几本书”，诸如《白霜涌路》、《三十年代作家记》、《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等。<sup>[33]</sup>

如陈纪滢这般“藉《传记文学》出书”的在《传记文学》作者群里不胜枚举。稍长一辈的作家里较著名的有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他们都有书出版，尤其是杨步伟女士首先在《传记文学》上连载的《一个女人的自传》和《杂记赵家》，风行一时。《传记文学》中还有一套以“细说”为名的历史系列集刊，是史学家黎东方的名著。黎东方后来辑结《传记文学》上所刊发过的与自己从前所写的出了一套书，依序取名为《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

说明朝》、《细说清朝》与《细说民国》。这种以小说体活写历史的手法还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细说某某”为名的著作蔚然成风。

刘绍唐同时还向许多在现代史研究方面小有成就的学者邀稿，诸如早期的毛子水、吴相湘、沈云龙、邓嗣禹，稍后的李云汉、张朋园、唐德刚等，济济多士，都在《传记文学》上留下过滚滚辙迹。沈云龙与唐德刚更相继成为《传记文学》不同时期优质稿源的主力军，为“民国史长城”的夯建打造了强有力的地基。

所谓人情总有时，真诚的尊重与切实的利益却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失望。刘绍唐视《传记文学》如自己第二生命，对作者们更报以极大的热忱，不仅付诸完全的尊重，给以优厚的稿酬，且从不以恩人自居。他常说：“对于能写出长文章的人，我都是衷心钦佩的。”<sup>[34]</sup>三十八年来，刘绍唐以超过畅销书刊的付酬标准支付作者的稿酬与版税，且从不拖欠。这对于提高编辑、作者士气以及提升刊物素质无疑大有裨益。有执笔人如是慨叹：“我在香港鬻文二十一载，看尽了报刊老板们的市侩嘴脸，侈言‘找一百条狗难，找一百个作家易’者有之，压低克扣稿费者有之，对女作家性勒索者有之，十年不加薪不加稿费者有之，拖欠稿酬一走了事者有之，印五版书只付一版版税者比比皆是，然而绍唐先生却鹤立鸡群！”<sup>[35]</sup>

### （三）夯造“民国史长城”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刘绍唐不吝以最大的真诚创办《传记文学》，自然也收到了来自《传记文学》作者与读者群的鼎力支持。

许多政治家与其他行业的时代亲历者，“因为有了发表传记与回忆录的园地，均设法搜集资料或根据日记勤于写作，保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sup>[36]</sup>据不完全统计，《传记文学》涵盖了王云五、陶希圣、胡汉民、曹汝霖、蔡元培、黄兴、陈济棠、丁文江、于右任等众多政学名流的自传、评传、年谱、日记、回忆录与史事研究等，备受海内外学者推重，在学术文化界亦素有“民国史长城”“民国史宝库”之称，于过去六十年时间里一直与“国史馆”、“党史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鼎足而四、不分轩輊。

更令人惊喜的是,《传记文学》在海内外刮起了一股“传记风”与“传记热”。以传记、回忆录、人物轶事为主的刊物,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新旧传记书籍竞相出版,各报纸、副刊纷纷重视传记与回忆录等稿件,一般综合性、文艺性,甚至工商业的刊物,也跟风辟有“传记文学”专栏。甚至有香港某出版商不但将名字盗作“传记文学”,并且居然逐期盗印,不经意间开创了期刊被逐月盗印的先河。刘绍唐听闻后笑言,此正说明了《传记文学》在广大华文知识界备受欢迎。<sup>[37]</sup>

然而办刊路漫漫,永不会一帆风顺。当进入1980年代,文人办报的时代逐渐一去不复返,办杂志的也进入了夕阳黄昏。刘绍唐常自嘲自己是“手工业、自耕农、土法炼钢”<sup>[38]</sup>,并在给卜少夫的信中凄凉地说道:“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廿年了。”<sup>[39]</sup>“《读者文摘》卖唱片、卖录音带,现在又要拍电影,各种生意都做了;《星岛日报》卖家具、各种百货、冲印照片、旅行社、医药保健……兼营各种行当,不单是在卖报纸了。”<sup>[40]</sup>在社会开始走向极端工业化、资本化的途中,刘绍唐不可否认地受到了来自强力的威胁、压迫与掠夺。“许多作家在大报团的不惜工本,千方百计拢络之下,靠感情、友谊、敬业精神争取到的一点稿源……剩下一点骨头,都不让我们啃了。”<sup>[41]</sup>

尽管如此,这之后又过了十年,再五年,另三年,直至刘绍唐病逝,《传记文学》始终屹立于众刊物之林。想来一直支撑他的,也唯有其于《野史二十年》中所难得吐露的信念:

我们以“争千秋,不争一时”而自勉,绝不愿在文字上多所表白。……我们认为一个刊物未来的生命,比它的辉煌历史更为重要,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信条。……我们深信只要传记文学风气一开,何患没有来者、何患没有替人!<sup>[42]</sup>

### 三、《传记文学》创刊理念评析

之所以在惊风骇浪中屹立不倒,甚至开创出一个“传记文学时代”,私以为其原因不仅在乎时局与制度因素,更在乎创刊理念及主事者个人谋略。

#### (一) 抓住时代契机

20世纪60年代,两岸关系发生巨变。政府于1960年以后暂时放弃对台“武力解放”政策,很

大程度上给予了台湾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而台湾在历经两次“八二三炮战”之后,绝大多数民众均已明白“反攻大陆”的不切实际。亲身经历一九四九大变局的国民党政要与文化精英,对于书写个人经历之时代,变得迫在眉睫。时人分析《传记文学》成功连锁缘由时便指出:

“政府”迁台,“国”步艰难,外交变化,经济发达,而“国”力日趋充实;凡此种种现象,亦即各项事实,自然引起思索激发研讨。传记文学之文篇、丛书、丛刊等,均直接或间接,有关上列各项现象。易言之,传记文学之成功,亦是时代之产品。<sup>[43]</sup>

历经世变,世人皆有回顾来路的动机,更愿于零星记录中去寻求过去的实况。《传记文学》牢牢抓住这种时代性的契机,由小及大,逐步走向辉煌。秉持着“真理愈辩愈明,史事愈说愈清楚”<sup>[44]</sup>的理念,《传记文学》不断扩大篇幅,开设“难忘的人”、“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史事与人物”、“每月人物座谈会”等各种形形色色的专栏,普遍应用口述历史,不断发掘与补充各类史料的完整性;又从史料充斥、诸说并存的民国史中,梳理出“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初建”、“西山会议”、“北伐统一”、“八二三炮战”等近三十项重大史事专题资料<sup>[45]</sup>,既为治史者提供材料,也为读者答疑解惑。如此多方掌握动态与静态之史事,终使《传记文学》从创刊初期的“私家传记回忆录”渐次成长为“民国史长城”。

#### (二) 两个“三不主义”

就文稿取舍而言,《传记文学》一向采用严格标准,在内容编辑上奉行“三不主义”,即“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sup>[46]</sup>

刘绍唐由衷认同胡适对冒名或用化名乱写东西,致彼此以不实之事互相攻讦的顾虑,所以要求来稿一律使用真名,若发表后有人看出错误来,也好及时修正,或是发表不同的意见。如此一来,虽不能完全确保稿件真实无虞,至少将顾虑减到最低,从而奠定了读者对《传记文学》学术价值的充分认可与信赖。而“不刊登当事人健在(回忆录、自传

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则因觉此类文章内容空泛,千篇一律,有互捧之嫌,史料价值不足,只好一律退稿,刘绍唐自言为此还开罪了许多朋友。

“不炒冷饭”,即坚持首发,即便选登旧文亦说明缘始,示读者以真诚。刘绍唐援引刘半农的《赛金花》为例,声称许多港台刊物不辨出处、重复刊登,致使读者们看了似曾相识,而又摸不着头脑,某些年轻读者甚至误以为刘半农尚在人世,简直贻笑大方。<sup>[47]</sup>

为了保持杂志的纯粹性,刘绍唐在期刊经营上也坚持“三不主义”,即“绝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到处去兜揽广告”、“绝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到处要钱、要补助、要津贴”和“不利用任何关系或人情推销刊物”<sup>[48]</sup>。迫不得已之下,刘绍唐曾长时期游走于钱囊羞涩中,尽管他一再强调“本刊非至绝对必须,……实不愿增加读者负担”<sup>[49]</sup>,但最终仍受制于台湾纸荒,数次面临《传记文学》濒于停刊的境遇,在70年代不得已将价格先后上调6次,频率有时高至隔月一调,困顿如斯。

这两个看似“消极”的“三不主义”,实际上反为《传记文学》带来了积极的效应。刘绍唐在内容编辑上坚守“三不”,充分保证了《传记文学》的质量,使之成为“民国史宝库”;在期刊经营上的“三不”,又赋予《传记文学》以独立性、学术性和民主性,一定程度上避免受控于资本,不致沦为“御用”刊物,还保留下来大量珍贵的独家史料,纵被学人调侃为“野史馆”<sup>[50]</sup>,亦可见其悠然自在,完美维护了一份“民间刊物”的独立尊严与自主性。

从另一个层面言之,这也区别了《传记文学》与其他许多刊物有根本上之不同,即每一期都体现了主编的基本构想,倾注了他全副的精神与时间,不离其所坚持的信念、标准和价值观。正如其在答复新闻记者访谈时表示:“一个好的编辑,决不会沉醉于过去的辉煌,必定把全副精神,贯注在未来的三期之中。有这样的努力和规划,才能把一个杂志办好。”<sup>[51]</sup>《传记文学》的成功,得益于内容优质与经营妥善两方面,两个“三不主义”使《传记文学》从宣扬文化的刊物逐渐成为规划清晰、远景明确的明星企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迎来一个璀璨辉煌的“传记文学时代”!

### (三) 春秋之笔,不拘门户

刘绍唐在《传记文学》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认为传记文学的作者,将不受身份年龄以及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倒不一定只是居高位享高龄或所谓一代完人,才有资格来写自己。凡是在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无论成功失败都可以写;凡是有特殊贡献有特殊体验的更可以写。”<sup>[52]</sup>

截至到1982年6月,《传记文学》总计二百四十一号,文章约六千六百余篇,作者约一千二百余人。职业属性上,学术工作者约占15%,教育工作者占8%,职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占11%,外交工作者占14%,军事工作者占7%,司法工作者占5%,医学工作者占3%,工商业者占8%,工业及其他专业者占11%,民意代表占16%,其他占2%。有作者一人身具数种属性者,仅就其主要者择其一,不重复统计。<sup>[53]</sup>

由此可见,《传记文学》的撰稿人遍及社会各阶层,非少数知识分子可包办。何况,以上仅为《传记文学》前二十年的数据统计,此后数年时局全开,大陆史料纷涌来台,随着两岸交流日趋频繁,崭新的局面又在不断开创。

而我们看《传记文学》,里边不仅有党政军要,也有如杜月笙等所谓的“三教九流”。作者沈云龙更直接发表书简,反驳冯文关于《传记文学》不宜刊发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焯‘陈望道小传’等变节投降者小传的观点,认为《传记文学》之“民国人物小传”栏的诸位执笔者对温宗尧、汪兆铭等近代已故变节投降者的描述是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秉春秋之笔,以昭炯戒<sup>[54]</sup>。此后《传记文学》更陆续刊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大陆政要的小传,不宣传任何系统思想,也不抱持丝毫门户偏见,所写所刊,只求历史真相。

刘绍唐认为“治史应存厚道,更要公道”<sup>[55]</sup>,非如此,写出来的文章定会流于武断或偏见,故向来只论问题之是非,而不作人身攻击。至于史实是否完全准确,一如黄季陆先生所说:“任何著书,主观的成分总是免不了的,……但姑不论其主观正确与否,只要公开出来,研究的人自然有个评断。”<sup>[56]</sup>

### (四) 一肩担负半壁江山

昔年唐德刚曾因《传记文学》发行量与其所搜



集大陆《文史资料》卷数同，感慨刘绍唐“一人而敌一国”，意即刘绍唐凭一己之力担负起了近代史料搜集的半壁江山，此话不胫而走。许多人在惊叹刘绍唐辉煌“战绩”之余，也对他平生学思展开了深入的思考，意图从绍唐本身分析《传记文学》的成功连锁缘由。

内行人都知道“刘社长”白手起家创办《传记文学》的故事。吴相湘在《传记文学》创刊廿周年纪念的贺函中忆称：

兄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当时兄寓和平东路二段菜场对面一陋巷中，每逢天雨就是满街泥泞。那时物质条件又差，每期杂志兄不但要坐而编，还要起而行，真不知费尽几许辛苦！<sup>[57]</sup>

众所周知，文稿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份杂志得以长期立足的根本。为了保持《传记文学》长久的生命力，刘绍唐四处奔走，成为沈云龙口中的“债主”<sup>[58]</sup>，而无论付检、排校、印刷、出版、发行，均一身肩负，他的口头禅，永远是“杂志尚未出版”<sup>[59]</sup>，甚至一度因驾汽车午夜行驶误撞电杆而碰掉门牙，后为了解大陆情况更时常亲往香港访问，四十年如一日。正如其所言：“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历史是人类经验的累积”，“我创办《传记文学》这个刊物，就是基于这种信念而来的”。<sup>[60]</sup>《传记文学》之刊载所重者，惟在一个“真”字。“《传记文学》二十年来的基本工作，就是想持续地保存真实史料与抢救被扭曲或行将被消灭的史料。我们把一切撰稿人的文字都视为史料的一种，我们永远不会先有结论，也永远不会先有‘框框’，只希望让史料自己说话”。<sup>[61]</sup>

为了这个“真”，刘绍唐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某些敏感性文章登出来后必会引起反弹，给《传记文学》带来不必要的政治干扰和压力，仍以治史者的客观襟怀，我行我素。

据漆高儒回忆，刘绍唐曾“慨叹白色恐怖的存在，有两次不敢在家过年，躲在朋友家中藏身，原来是‘警总’在找碴，要传人问话。”<sup>[62]</sup>郭冠英说的更为直白，他笑谈某日与刘绍唐、梁光明一起喝酒，梁酒意上头，对刘绍唐大为恭维，说《传记

文学》竟能在夹缝中生存并提供了最多的历史，实在难得，郭冠英妙语连珠，一句总结：“梁兄哥，你的意思就是说刘社长能活到今天实在难得？”梁君大笑，“对！”<sup>[63]</sup>

事实上，台湾处于白色恐怖时代时刘绍唐便已十分巧妙地打破禁忌，引入了不少大陆方面的珍贵资料，因此被视为“左”，说他是“为匪张目”；后来可以左了，刘绍唐又“自我设限”，不为尊者讳，刊出《陈洁如回忆录》，对正史三缄其口的蒋陈关系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并且直言：“写史者、读史者皆装聋作哑，久而久之，谎言便成了历史，这是治史者的耻辱，是全国学术界的耻辱……历史不是一人一家的，也不是永远可以消灭的。”<sup>[64]</sup>

唐德刚指出：“没有艰苦卓绝的打烂仗精神，在此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一事无成也。”而刘绍唐生性就是个“克难专家、打烂仗的好手”<sup>[65]</sup>，只要认定一理想，看准了方向，便是终日睡在铅字房里，也要闯出一片天地。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后，虽退居幕后，但仅从杂志上许多他所写的按语、导读、介绍或编前、编后等的短文里，也足见其用功之深与见解之精辟。他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拥有高超的判断文章好坏的能力，并懂得以适当的文章适应国家民族的需要。

其中有两点，一是“既有眼光，又勤奋过人”。

师父能在各方来稿，众说纷纭当中，独具慧眼看出那些文章所述属实，持论公正，能引发读者兴趣与共鸣而登出来。他又夜以继日，埋首书海之中，精挑细选，拣出许多珍贵的材料，有时单独发表，有时因与作者来稿所述某一历史事件相关，而予配套刊登，登出之前，必将该史料来路始末，交代清楚。……也会为一则史料出处、或对来稿所记某件事时间发生疑问，而竟通宵达旦，查考典籍，结果只为增补三两句话，或只改正五七个字。<sup>[66]</sup>

另一则是“高人一等的编辑功力”。

师父创办《传记文学》之初，除定下了选稿原则和“为文学开生路，为史家找材料”的主旨之外，还把杂志的蕴涵定为“批毛（泽东）”、“扬胡（适）”、“反共”、“保蒋（中正）”，后来再加上个“捧张（学良）”。他之所以有这项秉持，主要是基于从创刊开始到一九八七年的二十五年之中，尚处于

戒严时期，那是文字工作者动辄得咎的年代，也是他审阅文稿最耗心血的年代。他一面每期要拿出新内容和好文章，来满足读者胃口，一面又得对诸多敏感问题或禁忌，在文字和编辑技巧上，灵活的腾挪趋避，以免触犯某方面而引来“关切”，甚至惹出麻烦；他常常是突破一点，又没有太突破，其间轻重的拿捏，是灵犀一点，自存于方寸，不是旁人轻易可学得。<sup>[67]</sup>

由此可见，刘绍唐虽胸怀曲直，有书生意气，却也绝非不知变通的腐儒。他知晓如何恰当地运用才华，既达到妥善保存史料的目的，又巧妙避开特殊时局下莫须有之麻烦。然其于《传记文学》之基本信念，却未曾有丝毫退却，令人慨叹惊险之余，更添几分敬意。

绍唐有文人之雅，亦具豪士之风。他爽朗好客，好饮酒，朋友遍天下；关爱后辈，周到细腻，徒弟遍天下。据苏澄基回忆，刘绍唐“是标准的北方人性格，浪漫狂爽，热情奔放，加上他读书多，腹笥广，学识渊博又通达世情，故能结交各方俊彦和绩学之士，来为《传记文学》写稿”<sup>[68]</sup>。撇开苏澄基对刘绍唐的“师父”滤镜不言，单论绍唐交游之广，便罕有能及，无论是学术界、教育界、文化出版与新闻传播界，还是政商圈子，到处都有“刘传记”的朋友。不仅如此，刘绍唐每次出去开会或应酬，不论什么场合，几乎总有人喊他“师父”。时有王蓝一打油诗流行，道：“天上的星辰，恒河的沙，刘绍唐的徒弟，袁擘九的她。”<sup>[69]</sup>以袁擘九收的干女儿与刘绍唐的徒弟人数并列，极言其多。刘绍唐也写了副对联自娱：“何功何德何能，岂敢当师父；无权无拳无勇，怎能收徒弟。”横批：“人之患。”<sup>[70]</sup>

梁实秋曾赞徐志摩如“一团和气，使四座尽欢”，同样的话放刘绍唐身上，也颇为恰当。这位标准的北方人虽与各方来往酬酢众多，但其饮酒之态度却绝非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尊重对方，酒品极佳，凡与之交过杯的朋友都认为绍唐“是诚实的酒友，而非狡猾的酒徒”<sup>[71]</sup>。得遇两、三好友小酌一番，则意态闲适，娓娓不倦；碰到豪饮的大场面，则议论纵横，酣畅淋漓！更妙的是，刘绍唐知识渊博，坐拥书城，其位于信义路《传记文学》编辑部中的藏书有如一家图书馆，因此便是讲起历史掌故或笑话

来，也能援引古今，荤素并陈，常教举座捧腹，尽兴而归。<sup>[72]</sup>

毋庸讳言，绍唐交友之广与“酒”有着相当关联，但其朋友圈子中滴酒不沾的，也大有人在，只是与他做了朋友，能喝上几杯再好不过，倘若更进一步，既能喝酒，又有点学问，喜欢历史且会写几篇文章的，那简直可以引为知己了<sup>[73]</sup>。对年轻一辈的作家，刘绍唐总是十分体谅并且爱护他们，道今日还有年轻人从事写作而非投身科技实属不易，不仅介绍他们相互认识，并且不吝将之引荐给他的老朋友们。而他自己却守着《传记文学》，一晃四十年，直至病逝。

“刘传记”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网罗了一众人才，无论是《传记文学》前期的初出茅庐，还是后期的立稳脚跟，都上了一道可靠坚固的保险。得益于这道双重保险，不仅消除了稿源顾虑，多少旁人难求的稿件、难寻的资料，在《传记文学》上也几乎每期都有刊登，常给读者以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黎东方便在《传记文学》成功创刊廿周年时感慨道：

这二十年住在台、港、欧美，以文笔著称的知名之士，包括若干位立了功与立了德的贤者，不曾被绍唐邀请到《传记文学》发表几篇大作的，可谓极少。<sup>[74]</sup>

毋庸置疑，《传记文学》能有“民国史长城”、“民国史宝库”之名，与其所涵盖的纷繁众多难得且珍贵的回忆、秘闻史料不可分割，更别提《传记文学》中初次曝光的照片与墨迹了，单从民国史人物照片来看，其数量之最，恐便足以傲视寰宇。而这其中又有多少，若非刘绍唐去不辞辛劳、诚心诚意地恳求与寻找，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钻研与编辑，怕连问世都无比艰难，又将给后世的治史者们带来多大的遗憾呢？

许多年前，刘绍唐在《传记文学》发刊词中这般构想：

远的不必说，设想近二十年来如有一本传记文学的期刊，出版到现在，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开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sup>[75]</sup>

后来在谈到传记文学丛书与丛刊时又强调：

传记文学是我国学术界公认最缺乏而最不发达的一门学问。《传记文学》杂志的创刊，就是希望以持续不断的努力，来开垦与耕耘这块表面荒芜而蕴藏丰富的园地。<sup>[76]</sup>

二十年过去，又一个二十年，《传记文学》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许多麻烦与困扰，但刘绍唐始终以全副精力投注于《传记文学》，即便是生命后期，体力日衰，他仍秉着精益求精、决不懈怠的态度，直到最后一刻油尽灯枯，才不得已放弃翼护了大半辈子的《传记文学》，撒手人寰。

刘绍唐晚年一度困恼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接办《传记文学》，因病逝世之后，他的夫人王爱生也同友人抱怨道：

他就是应酬太多，过于劳累，又无法安心养病，才走得那么快。他走得并不心甘情愿。因为他原本想在传记文学四十周年宣布退休，陪我去走走玩玩，过些赏心乐意的日子。如今这样走了，他岂能甘心。<sup>[77]</sup>

王爱生承继刘绍唐的遗愿，要让《传记文学》永续营业，但终究因为身体原因，在勉力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经过慎重考虑，将所有《传记文学》刊物、书籍、光盘全部转让给了老报人成舍我的女儿，成嘉玲、成露茜两姊妹。王爱生期待她们能给《传记文学》以新生，带领《传记文学》步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sup>[78]</sup>

### 结语

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说：“做学问要想有较高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这是努力途径的起点。”<sup>[79]</sup>苏澄基称师父的离世不啻为“学海星沉，而流风遗韵，百世犹新”<sup>[80]</sup>。试观绍唐一生，非有“推传记文学之风，存民国史料之真”的大志，非有“百折不挠，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非有“原则坚定，日新月异”的计划版图，都不可在近乎荒芜的疆土上开辟出灿烂辉煌的《传记文学》。

而我们今日治史，受益于前人与不断更新开放的大数据，材料甚丰，虽不愁砖瓦，但缺匠人，尤其是如刘绍唐般有恒心毅力修筑“长城”、“宝库”的匠人。当今青年，读书多为谋生，为争取高一等的社会地位，甘于“坐冷板凳”清贫治史的人甚少。或也有为社会服务的想法，可若问及长远的具体目

标与志向，则少有人能明确作答。一旦离开学校，投身社会，难免不为环境所影响，无自立之余地，更别说在史学上取得什么令人惊艳的深远成就。

关于名利权位与学术研究间存在的冲突，前辈大家的教诲已多矣。严耕望亦曾特开一专题探讨“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他谆谆告诫后世学人：要勿为外务所扰，一心力，专心治学，沉下心，戒去浮躁，同时开阔胸襟，包容异见，持中庸之道，不过分拘泥，而是随宜变化，如此，方能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sup>[81]</sup>

作者简介：张欣怡，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2018级学生

### 参考文献：

- [1]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6.
- [2]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228.
- [3]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228.
- [4]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228.
- [5]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1.
- [6]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229.
- [7] 刘绍唐. 红色中国的叛徒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244.
- [8] 邓嗣禹. 北大舌耕回忆录 [J]. 中文报刊资料（中国文史类），1988（8-9）：页码不详.
- [9] 关国焯. <传记文学>之父刘绍唐先生的一生 [J]. 台北：传记文学，2000，76（5）：49.
- [10] 苏澄基. 流风遗韵，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传记文学，2000，76（6）：50.
- [11] 刘绍唐. 我们的想法与作法 [J]. 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12] 刘绍唐. 我们的想法与作法 [J]. 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13] 刘绍唐. 我们的想法与作法 [J]. 台北：传记文

- 学,1962,1(1):4.
- [14] 刘绍唐.我们的想法与作法[J].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15] 胡适.四十自述·自序[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312.
- [16]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1.
- [17]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1.
- [18]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1.
- [19] 漆高儒.忆传记绍唐兄——相见最早,相知恨晚[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3):23.
- [20] 刘绍唐.从一国两制看一国两史[J].台北:传记文学,1997,71(1):14.
- [21] 刘绍唐.我们的想法与作法[J].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22] 刘绍唐.我们的想法与作法[J].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23] 刘绍唐.我们的想法与作法[J].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24] 刘绍唐.我们的想法与作法[J].台北:传记文学,1962,1(1):4.
- [25] 方东美.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但有凋谢无死亡’的罗志希先生[J].台北:传记文学,1977,30(1):23.
- [26] 苏澄基.流风遗韵,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6):50.
- [27] 苏澄基.流风遗韵,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6):50.
- [28] 张昌华.“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和他的〈传记文学〉[J].人物,2010:44.
- [29] 唐德刚.“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22.
- [30] 苏澄基.流风遗韵,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6):50.
- [31] 陈纪滢.为“近代史”发光[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7.
- [32] 陈纪滢.为“近代史”发光[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7.
- [33] 陈纪滢.为“近代史”发光[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8.
- [34] 胡志伟.以一人而敌一国[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4):页码不详.
- [35] 胡志伟.以一人而敌一国[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4):页码不详.
- [36]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4.
- [37]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3.
- [38] 卜少夫.由手工业迈向企业化[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1.
- [39] 卜少夫.由手工业迈向企业化[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1.
- [40] 卜少夫.由手工业迈向企业化[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1-32.
- [41] 卜少夫.由手工业迈向企业化[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31.
- [42] 刘绍唐.野史二十年[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
- [43] 浦薛凤.展望与回顾[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44.
- [44] 刘绍唐.编辑后记[J].台北:传记文学,1977,30(2):78.
- [45] 苏澄基.流风遗韵,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J].台北:传记文学,2000,76(6):51.
- [46]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3.
- [47]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学,1982,41(1):163.
- [48] 刘绍唐.漫谈传记文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J].台北:传记文

- 学, 1982, 41(1):163.
- [49] 刘绍唐. 编辑后记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73, 22(4):64.
- [50] 沈云龙. <野史馆>与<后野史亭>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17.
- [51] 赖景瑚. 由成长、茁壮、到发扬光大: 持续投稿<传记文学>十余年的回顾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30.
- [52] 刘绍唐. 我们的想法与作法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62, 1(1):4.
- [53] 蒋永敬. 传记文学二十年来的作者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50.
- [54] 关国焯. 民国人物小传: 史学家沈云龙先生生平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8, 52(2):133.
- [55] 钟延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刘绍唐、唐德刚先生追思座谈会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10, 96(1):20.
- [56] 刘绍唐. 漫谈传记文学: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168.
- [57] 吴相湘. 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43.
- [58] 沈云龙. <野史馆>与<后野史亭>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17.
- [59] 卜少夫. 一代完人, 意犹未尽: 哀悼一位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笃实奉献者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3):18.
- [60] 刘绍唐. 漫谈传记文学: “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记录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162.
- [61] 刘绍唐. 野史二十年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16.
- [62] 漆高儒. 忆传记绍唐兄——相见最早, 相知恨晚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3):24.
- [63] 郭冠英. “史失求诸野”——贺传记三十周年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92, 61(1): 页码不详.
- [64] 郭冠英. “史失求诸野”——贺传记三十周年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92, 61(1): 页码不详.
- [65] 唐德刚. 两千年传统私修·一百年现代企业: 庆祝<传记文学>出版三十周年献言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92, 61(1): 页码不详.
- [66]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2.
- [67]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3.
- [68]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3.
- [69]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5.
- [70]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5.
- [71] 卜少夫. 一代完人, 意犹未尽: 哀悼一位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笃实奉献者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3):18.
- [72]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4.
- [73]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4.
- [74] 黎东方. 二十年辛苦不寻常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82, 41(1):35.
- [75] 刘绍唐. 我们的想法与作法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62, 1(1):4.
- [76] 刘绍唐. 关于传记文学丛书与丛刊 [J]. 台北: 传记文学, 1967, 10(1):51.
- [77] 吴崇兰, 周谷, 悼念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3):31.
- [78] 陶恒生. 纪念从未谋面的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1, 78(2):17.
- [79] 严耕望. 治史三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94.
- [80] 苏澄基. 流风遗韵, 百世犹新——追悼师父刘绍唐先生 [J]. 台北: 传记文学, 2000, 76(6):56.
- [81] 严耕望. 治史三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06.

# ● 艺术空间 ●



李林书法作品（一）



张新根摄影作品（一）



张新根摄影作品（二）



张新根摄影作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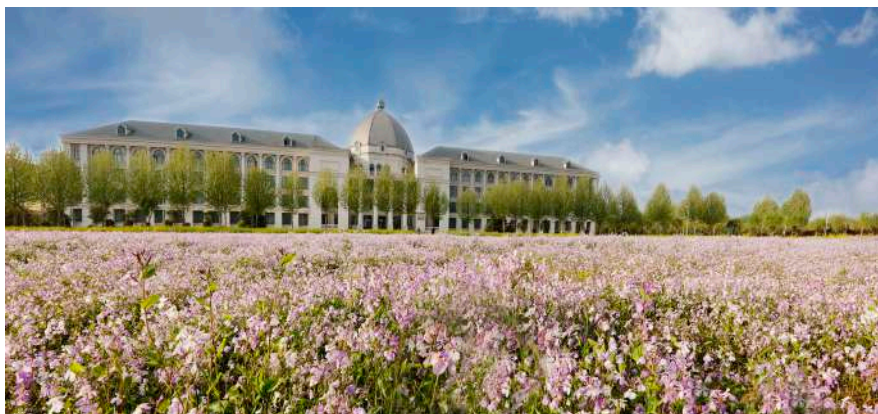
李林书法作品（二）



张新根摄影作品（四）



张新根摄影作品（五）



张新根摄影作品（六）



任梦洁摄影作品（一）



任梦洁摄影作品（二）



任梦洁摄影作品（三）



史永焯摄影作品（一）



史永焯摄影作品（三）



史永焯摄影作品（二）



史永焯摄影作品（四）

志道 弘毅  
乐知 笃行

应天文化季刊

(2022年创刊)

2022年秋之卷 (总第3期)

总 编 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副 主 编：冯志伟 李卫军  
卢忠雷  
执行副主编：常丽洁 李瑞华  
本期编辑：孙 佳 于志刚

主管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编辑出版：《应天文化季刊》编辑部  
E-mail: ytwbjk@126.com  
联系地址：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55号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